

托洛茨基 流亡生涯

[法] 让·范·埃热努尔 著
张敏渠 译

TUO LUO CI JI LIU WANG SHENG YA

上海三联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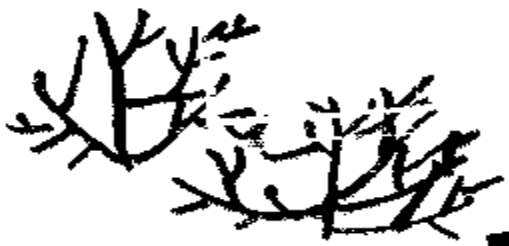


TUO LUO CI JI LIU WANG SHENG YA

托洛茨基流亡生涯

〔法〕让·范·埃热努尔著

张敏梁译 上海三联书店





3. 托洛茨基的妻子娜塔丽娅于1929年
抵达土耳其时的留影



4. 托洛茨基的女儿齐娜于1931年留影



5. 托洛茨基和儿子廖瓦在圣帕莱留影，
摄于1933年8月



6. 鲁道夫·克勒门特、托洛茨基、伊万·克雷博、让娜·马丹、
萨拉·雅各布和让·范·埃热努尔在圣帕莱合影。

摄于1933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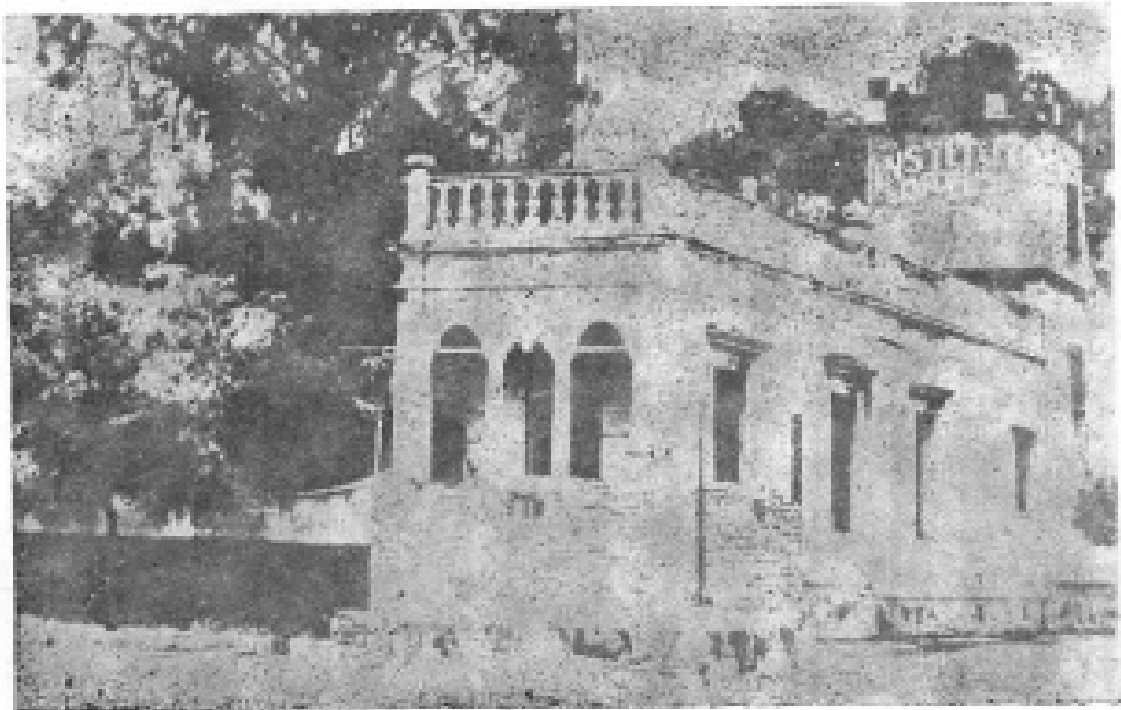
7. 在巴比仲的凯尔莫尼克别墅。



8. 托洛茨基在科约阿坎镇隆德雷斯街
的住宅庭院中留影，
摄于1937年1月



9. 托洛茨基与里维拉谈话时留影。



10. 托洛茨基在科约阿坎镇维也纳街的住所，
他从1939年5月起迁居那里，直到去世



11. 谢瓦、玛格丽特·罗斯麦、娜塔丽娅、
阿尔弗雷德·罗斯麦和托洛茨基(坐在
石阶上的)合影, 摄于1939年8月



12. 本书作者让·范·埃热努尔跟托洛茨基出席
杜威委员会



1. 本书作者让·范·埃热努尔摄于1933年春在
土耳其普林吉坡岛



2. 托洛茨基赴哥本哈根途经法国马赛时留影，
摄于1932年11月21日



托洛茨基摄于1929年抵达土耳其海岛时

译者的话

托洛茨基这个名字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许并不陌生，可是真正了解托洛茨基生平的人却很少。因为在我国介绍托洛茨基生平的译著可谓凤毛麟角。解放前，中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刘仁静曾根据英译本转译了托洛茨基在1929年写的自传《我的生平》，可惜只译了一半，直到80年代初，国内才第一次出版了《我的生平》全译本。可是这部自传只写到1929年被放逐国外为止。从1929年到1940年是个空白，而1978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了《托洛茨基流亡生涯》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因此我们把它译成中文本以飨读者。该书的作者是托洛茨基的秘书让·范·埃热努尔。他是法国人，同托洛茨基一起生活了7年。作者以回忆录的形式详细描述了托洛茨基坎坷曲折的流亡生涯。文笔细腻生动，情节真实可信，几乎再现了托洛茨基的当年形象。此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也是一部值得一读的报告文学。但该书对托洛茨基遇害的经过只是一笔带过。为了让读者能具体地了解托洛茨基最终遭到

的悲惨结局，我们根据美国著名学者伊萨克·多伊彻著的托洛茨基传记第三卷《被放逐的预言家 1929年—1940年的托洛茨基》一书有关章节编译了《托洛茨基之死》一章附在本文后面，谨供参考。

托洛茨基是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20世纪的伟人，也有人说他是革命叛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人们对历史人物评价也常常会发生转变。现在布哈林等人的冤案已获平反昭雪，看来托洛茨基的问题也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据报道，为纪念托洛茨基诞辰110周年，苏联和墨西哥已联合摄制了以托洛茨基流亡生涯为主要故事情节的传记影片《希望》。可见，人们对托洛茨基的观念正在逐步转变。

毫无疑问，列夫·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期间曾经是个叱咤风云、威震四海的领袖人物。世人把他的名字与列宁的名字并列，把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称作“列宁——托洛茨基的党”。在建国初期，托洛茨基出任了第一任外交部长，肩负着外交谈判的重任，在国内战争期间，托洛茨基又担任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列宁称誉托洛茨基是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托洛茨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为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列宁逝世后，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托洛茨基成了党内斗争的失败者，于1929年1月被逐出苏联，沦为浪迹天涯的政治流亡者。托洛茨基最初被放逐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附近的一个海岛上。1933年侨居法国，两年中一直受到法国警方的严密监视。他由于受到强大的政治压力，只得移居挪威暂且栖身，1年以后又遭挪威当局的无理拘禁。托洛茨基为了寻觅一个长久安身之地，最后在大洋彼岸墨西哥城安家落户，在那里度过了将近4年，但仍不能逃

脱达摩克里斯剑的惩治，终于在1940年8月20日遇刺身亡，尸骨被埋葬在异国他乡。更可悲的是，谋杀案的内幕至今尚未完全揭晓，真正的凶手尚未曝光。但人们有理由相信，弄清历史真相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读者可以在这本书中看到，作者笔下的托洛茨基是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与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兴趣广泛，喜欢骑马、打猎、捕鱼、饲养小动物。他广交朋友，不仅结识许多世界名流，而且乐于和普通工人交往。他不讲究吃穿，不追求豪华。他似乎有使不完的精力，不知疲倦地工作学习。他一生写下的书信文稿，其数量之丰足与列宁媲美。他知识渊博，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早在1933年6月，就预言：“法西斯德国发动战争将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历史已经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他具有高度的自制力，遇事不惊，沉着冷静，经得起挫折和失败。尽管他身处逆境，精神上肉体上经受了极大痛苦，可是并未动摇他对革命前途的信心。他告诫人们对十月革命的评价不能根据短时间的成败得失作出判断，而应该具有远大的历史眼光才能看清十月革命的深远意义。当然在托洛茨基身上也同样存在着明显的短处和弱点。他过分自负，称雄好胜，喜欢训斥人，脾气变幻无常，尤其对身边的人要求过严，使人难以接受。他不屑于做日常琐细之事，过多地依赖秘书，表现出一种贵族的气派，在私生活方面也不够检点。托洛茨基本质上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不符合国际形势发展的趋势，因此他的实践不能不遭到一系列的失败。

为了适应国内读者的欣赏习惯，译者对书名和章节标题都作了适当修改，并在忠实原文的前提下尽可能使译文生动流畅，增强其可读性。书末附有人名索引，便于读者查考。此

书的翻译出版得到出版社编辑部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才得以在较短时间内与广大读者见面，实属幸事。对此我深表感谢。

张敏樑

1988年11月于华东师范大学

前 言

从1932年10月至1939年11月，我在列夫·托洛茨基身边生活了7年。其间仅有几次短暂的分离。我成为他的政治组织的成员之后，担任了他的秘书、译员和警卫。本书既不是一部那个时期的政治史，也不是托洛茨基的生平传记。确切地说，这是一部回忆录，它希望真实地再现托洛茨基在其流亡岁月中生活工作的情景和氛围。

书中，我力图不再赘述那些众所周知的事情，除非为了叙事的需要。所以我要求读者应大致了解当年的历史背景。在这部回忆录中常常插入一些只有我知道而又不愿意忘却的细节，因而读者在阅读时要掌握分寸，不要让这些细节喧宾夺主。我希望有朝一日，某位学者在知道了我过去的那段经历以及那些档案以后，能从这些不多的资料中弄清某个事实或识别出某个文件。

在托洛茨基死后发表的关于托洛茨基生平的著作中，甚至在那些对他怀有善意的人写的文章里都存在着为数不少的

材料上的错误。我在本书的附录中对其中的一些错误作了纠正。在正文中我也往往对出版物中我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已加以纠正。此书中我所详尽阐述的多数是些鲜为人知或被严重歪曲的插曲或事件。那些常见的谬误往往是由于粗心大意造成的。或是由于愚蠢造成的。另外，斯大林分子长时期来对托洛茨基所进行的大量的诽谤，也不可避免地要刻下它们的痕迹。而托洛茨基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似乎注定要引起一场奇妙的纠葛。面对这一切情况，我以为最好的回答就是使自己的记叙尽可能地准确和具体。

我清楚地知道记忆的局限性，因此不认为在我的记述中不会发生错误。不过我保存着跟随托洛茨基时期的一些笔记，后来我又掌管过他的档案库，对这些档案材料都亲自作过整理，并曾对许多事情一再地进行核实。我认为把这些回忆同评论托洛茨基的为人、评价他的思想和他的个性结合起来的做法并不可取，可以另外写一本专著来做这件事。

这个档案库，单是1929年到1940年大约就有2.2万多一份文件。其他的文件将来一定会重见天日。在这些文件中，约有4000封是托洛茨基的亲笔信，不论从数量上还是文体上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通讯员。所有这些材料还有待于开发利用。

迄今为止，所有关于托洛茨基的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对托洛茨基不是竭力诅咒就是无比的尊奉。对这些著作需要进行批判性的研究：研究作品中所反映的政治思想及其内在联系，研究作品中所引用的论据和那些没有说透的假设，研究这些作品的前景及其变化。同时还需要对这些著作进行文学上的评论，看一看作品的风格和写作手法，从而使人们看到作者的个性。这也是一些有待于人们去做的工作。

以前我常常跟别人说起我跟托洛茨基一起生活的一些情景，可是我往往发现，对方从谈话中得出的结论跟我的原意有很大出入。可见，语言的表达程度是有限的。在这本书里，我试图字斟句酌，力求准确，但我不抱幻想。书中肯定还会有引起误解之处，因为叙述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可能像描写一件东西那样简单。这种信息的传达对作者来说是一种再现的过程，而对读者来说有时还会走样。因为，我是用我的母语——法语写成原稿，然后再把它译成英文的，所以我还要请读者对此加以谅解。

我要说明的就是这些。

目 录

译者的话	1
前 言	1
第一章 流亡在土耳其海岛	1
第二章 侨居法国	45
第三章 在挪威的困境	75
第四章 最后的旅程——墨西哥	100
跋	139
附 录 托洛茨基之死	140
人名索引	155

第一章

流亡在土耳其海岛

我是1932年10月20日到达土耳其普林吉坡岛的，当时才20岁，刚刚结束了9年的法国学校生活，对社会产生了一种无法抑制的厌恶情绪。

我从15岁起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虽说最初还带着些卢梭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色彩，但在大萧条的年代中，我就更直接更积极地参预了政治活动。1932年春天，我被吸收为法国的托派集团——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一个成员。那时，联盟的人数很少，真正参加活动的还凑不满20人，连会员证也没有。联盟的各项活动我都参加了。当时的主要活动仅限于参加讨论，上街出售联盟的《真理》周刊(La Verite)，或是在傍晚带着周刊到工人们下班途经的地铁车站去叫卖，或是在星期日早晨到工人住宅区去推销。晚上，我们经常到马路上去张贴标语，却常常遭到警察的没收。原因是我们没钱在标语上贴上印花税。我是联盟中第一个既没有先参加共产党，也未曾参加共青团的盟员。在那里我认识的所有成员都是被共产党开除出来的人。

该联盟于1930年创立后，有过一段动乱的经历。1932年联盟的领导权分别为两个派别所掌握：一派是以雷蒙·莫利

: 1 :

尼尔和皮埃尔·弗朗克为首；另一派的首领是皮埃尔·纳维尔和热拉尔·罗森塔尔。前者得到了托洛茨基的支持因而占了上风。莫利尼尔和纳维尔两人性格和气质上的差异，是造成他们之间长期冲突的根源。1930年在这个新成立的组织内突然爆发了一场危及其生存的内讧，只是在托洛茨基施加压力后，才使内讧得以平息。我参加联盟时，两派在政治上并无实质性的分歧，因此，党内生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但是莫利尼尔和纳维尔之间的对抗气氛在以后的岁月中却一直笼罩着党内的生活。

法国的托派集团是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自1923年起，托洛茨基就批评共产国际的领导背叛革命的行径。即使他在1929年被斯大林逐出俄国之后，他的目标仍然是要把共产国际拉回到革命轨道上来，而不是要另建一个与之敌对的组织。托洛茨基分子虽然都被正式开除出党组织，但他们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反对派，叫做左翼反对派。当时，这个反对派虽在党外，但坚信自己有朝一日会重返共产国际的行列。托洛茨基曾断言：“我们的思想将会成为你们的思想，并将写入共产国际的纲领。”

1932年间，托洛茨基派与斯大林派之间论战焦点是德国形势。当时，希特勒的权势日益膨胀，而拥有几百万张选票的两大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却处于分裂状态，无所作为。德国共产党听从斯大林的命令，拒绝和社会党采取联合行动，认为他们同纳粹党人是一丘之貉。1932年初，斯大林获得了一个深刻的发现，宣称纳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是一对“孪生子”。社会党人实际上是“社会法西斯主义分子”，德国共产党就是依据这种理论来开展活动的。1931年7月一家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宣称“德国共产党必须把全部力量

投入到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中去”。来自希特勒的威胁被大大地忽视了。有几次，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竟然宣称，纳粹主义运动已濒临瓦解的边缘。对此，托洛茨基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警告，他在许多文章和小册子里谴责了德国共产党的这种愚蠢政策，字里行间充满着智慧和热情，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些作品熠熠生辉，是他流亡期间所发表的最精彩的文章。

1932年7月，德国的形势急剧变化，日趋右倾。为了替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政策辩解，法国共产党于7月27日在巴黎的比利埃召开了群众大会。比利埃是个宽敞的公共舞厅，位于圣米夏莱大街的尽头。那里可容纳数千人，常常被作为政治集会的场所。联盟决定去旁听这次大会，并打算再次向群众解释社会党和共产党应该结成反对希特勒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大厅里挤满了人。我们大约有20来个人挤在人群中间。有一两个被指定的共产党人登台发言，他们一再重弹社会民主党是德国主要敌人的老调。我们听了，再也按捺不住了。雷蒙·莫利尼尔大声说：“我们要求发言5分钟。”于是他陈述了德国局势的严重性和建立反希特勒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但他的话并没能说多少。有一位法共领导人，是迫害托派成员的老手，皮埃尔·塞马尔做了个手势，那些早已站在我们周围的打手们立刻围拢来，抓起椅子劈头盖脸地向我们砸来。结果好些人受伤，我也被打得头破血流，多亏有朋友们解救。

6月间，莫利尼尔就问我是否愿意赴普林吉坡岛去担任托洛茨基的秘书。当时需要物色的是一位懂俄语的人，而我正适合这一点，因为我曾通过自学掌握了俄语。我的动身被拖延了一段时间，直到1932年10月13日才离开马赛，登上了“拉马丁”号客轮，途中停靠了那不勒斯港和皮雷埃夫斯港，

于10月20日早晨靠上了伊斯坦布尔。事后我才知道，当时在岛上的皮埃尔·弗朗克那天到码头来接我，由于我性太急，船一靠岸就匆匆忙忙地走下了板桥，结果使他扑了个空。我没有离开码头，随即就雇了一条小船直驶普林吉坡岛。到达时已接近中午时分。我随身只带着一只提箱，来到寓所大门前，我把一张便条交给驻守在那里的土耳其警察。不一会，扬·弗兰克尔出来迎接我。当我俩在客厅里寒暄时，托洛茨基穿着一套白色亚麻布西服从书房里走下楼来。他对扬说：“他看上去像奥托。”那是指奥托·许斯勒。当时他正住在这座寓所里。他长得与我一样金发碧眼，皮肤白皙。但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因为我俩在身材和长相上相距甚远。

托洛茨基当年52岁，他那引人注目的外貌我早从照片上就熟悉了。嫁给莫利尼尔的让娜·马丹在1929年第一次见到托洛茨基时就说：“您看上去跟照片上一样。”托洛茨基回答道：“那可就不妙了，这就像一件家具似的。”其实，托洛茨基远不是一件家具，他那活泼好动的举止和生动有力的演说，犹如磁铁般地立刻将人吸在他的周围。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他那宽阔的前额，虽没有秃顶也是够高的，其次是他的一双深邃的蓝眼睛，凝聚着力量和信心。（以后在他逗留法国期间，为了安全，也为了减少警卫，他外出旅行时不得不改名换姓，乔装打扮。他剃去了山羊胡子，把头发先梳向一边，然后分开。可每当他想离开住处混入公共场所时，我仍是担心：“这根本没有用，过路人一眼就会认出他来。他的眼神是无法改变的。”）当托洛茨基开口说话时，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嘴，无论是说俄语还是说外语，他声音清晰，词意准确。他最讨厌别人说话随随便便，含糊不清。因而他对自己的要求也特别严格。只有当他用俄语同娜塔丽娅交谈时，有时才会说得很快，很随便，甚

至成为窃窃私语。当他在书房同客人谈话时，他的手总是先搁在办公桌的边沿，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做出各种手势，似乎想用它来帮助嘴更好地表达他的思想。他的整个仪态显得庄重而带有几分骄矜。他身材中等偏高，胸背宽厚，但肌肉并不发达，而腿与其胸部相比就显得细长了。后来在墨西哥，有一天开玩笑时，他跟我比身高。结果，他正好比我矮1英寸，他是5英尺10英寸，我是5英尺11英寸。

1920年秋，一位英国的女雕塑家克拉尔·谢里丹（她是温斯顿·丘吉尔的表妹）去莫斯科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塑头像。后来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托洛茨基曾向我指出他的脸部如何不匀称。他张开嘴唇，咬拢牙齿，向我显示他的下颔是歪的”。但这缺陷并不明显。谢里丹还写道，“托洛茨基鼻梁也有些歪，看上去似乎曾经断裂过”。她在塑像时曾要求托洛茨基摘下他的夹鼻眼镜，因为那玩意儿妨碍了她的工作。可是，“托洛茨基不愿意拿下。他说没有眼镜，他会感到茫然一片。他脱下眼镜似乎有一种肉体上的痛苦。这似乎是它已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失去它，就会完全改变他的个性。很遗憾，这副眼镜相当程度地损害了他那标准的头像”。在我与托洛茨基相处的全部岁月里，我至多只有两三次看到他不戴眼镜。因为他极少在别人面前脱下眼镜，除去娜塔丽娅。他不戴眼镜，他的眼睛显得很小时，近乎闭拢。

我在普林吉坡岛第一次见到托洛茨基时，从他的外表上丝毫看不出他此时此刻正在经受各种磨难痕迹。这苦难的历程是1923年开始的。那时，在俄共党内，他第一个起来同斯大林展开斗争。4年之后，他被开除出党，并被剥夺了一切正式职务。1928年初，斯大林把他放逐到阿拉木图。它是苏联中亚东部地区哈萨克的首府，离莫斯科约2000英里。陪伴托洛

茨基的是他的第二个妻子娜塔丽娅和他们 22 岁的长子廖瓦。他们的次子谢尔盖是位工程师。他没有被卷入政治漩涡，继续留在俄罗斯西部过着自己的生活。在阿拉木图虽然受到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 (G.P.U.)] 的严密监视，但托洛茨基仍有一定的自由。他收到大批邮件并常常外出打猎。托洛茨基有一次告诉我，他在阿拉木图期间曾和廖瓦研究过标有通向中国边境路线的地图，要是朝中国方向逃跑，大约要走 160 英里的路程。

1928 年底，斯大林认为再不能让托洛茨基留在阿拉木图了。但如果处决托洛茨基，那会遭到一部分政治局委员的反对，并可能激怒一批年轻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以致可能会滋生出刺杀斯大林的念头。而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看来倒是一条出路。为此斯大林犹豫再三。那辆载着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及廖瓦的火车从阿拉木图返回俄国西部，为了等候当局的命令，火车在途中滞留了 12 个昼夜。终于斯大林打定了主意，将托洛茨基流放到伊斯坦布尔。斯大林也许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一旦到了国外，托洛茨基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既无朋友，又无钱财，如果他在外国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他将会在俄国人民的心目中信誉扫地。

1929 年 2 月 12 日，托洛茨基偕同娜塔丽娅和廖瓦从敖德萨抵达伊斯坦布尔。他们最初住在苏联领事馆内，发现在这儿的处境很尴尬，既是客人又是囚犯。这样的安排只持续了大约 3 个星期。3 月 5 日，他们离开了使馆，在贝拉大街托卡丽扬旅馆住了几天。3 月 6 日，托洛茨基给巴黎的一位律师莫里斯·帕兹发了份电报：“已获自由，暂住旅社，在找住所，此致敬礼。列夫。”电文开头的話暴露了托洛茨基在苏联使馆时的感受。不久，这些新流亡者搬进了一套备有家具的公寓，

这是廖瓦找到的。它在伊斯坦布尔郊外波孟蒂地区伊泽巴夏大街29号。4月底，他们在普林吉坡岛上的伊泽巴夏别墅定居下来了。（由于街道和别墅有着相同的名称，这一点使一些作者产生了误会。那个别墅跟我后来看到的寓所一样，座落在岛的北面，但更靠近码头。1931年3月1日，这座伊泽巴夏别墅被大火烧毁了，托洛茨基就搬到了岛上一家叫萨伏伊的小旅馆里住了大约4个星期。到3月底他离开普林吉坡岛，搬到了卡迪欧小镇的郊外，一个叫莫达的海滨地区，住在希法街22号，直到1932年1月才回到普林吉坡岛的另一处住所，即是我在10月份到达时他们所住的那座别墅。

我到达后，发现来自布拉格的扬·弗兰克尔、来自巴黎的皮埃尔·弗朗克和来自莱比锡的奥托·许斯勒也住在这座别墅里，另有一位俄文打字员叫玛丽雅·伊利尼什娜·彼夫斯涅尔。她在伊斯坦布尔有一套公寓。她每天早出晚归，遇到天气不好，就在萨伏伊旅馆过夜。弗兰克尔是1930年4月15日来到岛上的，自1931年2月18日廖瓦离开后，他就成了托洛茨基的主要秘书。廖瓦是到柏林去继续攻读他的工程专业，并参加一些革命的政治活动。1932年5月到这里的许斯勒，是德国托派组织的领导成员。1932年7月15日到达的弗朗克，是法国托派组织的领导人之一。他俩来到普林吉坡岛，不是作为秘书，而是作为访问者，但他们的拜访成为逗留，因为有很多工作要做。实际上，这里的工作人员与客人之间差别是不明显的。至于我，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接替了弗兰克尔的位子。这里唯一无所事事的就是托洛茨基的外孙弗谢沃罗德，爱称谢瓦，他生于1926年。他和他母亲齐娜伊达，简称齐娜（托洛茨基前妻所生的长女）于1930年底离开俄国，1931年1月8日到达普林吉坡岛同家人团聚的。1931年10月22日，齐

娜随同廖瓦到柏林去就医，而把谢瓦留在土耳其的小岛跟随外祖父母一起生活。

普林吉坡岛是马尔马拉海一个小群岛中最大的一个海岛。这个群岛包括4个有人居住的大岛和5个荒无人烟的小岛。在有人居住的岛中，以普林吉坡岛离伊斯坦布尔最远，大约有20海哩。那时，从贝拉桥乘小船划到普林吉坡岛码头，大约需花一个半小时，这中间包括在其他岛上停留的时间。

普林吉坡岛方圆约8英里，当时大部分地方无人居住。居民们都集中在东北角靠近码头的村子里，这里简直像个小镇。星星点点的别墅都座落在岛屿北面的海滩上，越往西，住房就越稀少，直到岛的西南部，就无人居住了。由于人们从岛上迁住大陆，因此岛上的空地急剧增多。岛的制高点约为海拔600英尺，而且附近有个希腊正教修道院。岛上苍松翠柏，复盖成荫，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松树的芳香。这里的泥土呈微红色。大海和天空时刻变幻着迷人的色彩，每当黎明和黄昏，苍天和大海被染成紫红色。这种壮丽的美景，在其他地方是难得一见的。

普林吉坡岛东面几英里处便是亚洲的海岸。在其西北方那遥远的地方就是一望无际的欧洲海岸。位于群岛西北部的哈尔基岛，离普林吉坡岛最近大约只有1海里，是个有人居住的小岛。马尔马拉海及其岛屿、亚洲的海岸、普林吉坡岛上的植被和天空，这一切构成了世界上最美的风景区。1973年，我重游了普林吉坡岛。岛上耸起了许多建筑物。记得在1932年，在亚洲海岸上只有一个卡塔尔村，而现在却是高楼林立，已成为伊斯坦布尔市的郊区。美丽的马尔马拉海现在被污染了，一家水泥厂不断向天空喷着浓浓的黑烟，黑烟从亚洲大陆一直飘到普林吉坡岛的上空，

1932年，普林吉坡岛上的居民主要是希腊人，但行政治安管理权却掌握在土耳其人手里。群岛中的各个岛屿都有希腊和土耳其两种语言的名称。土耳其人把普林吉坡岛叫作“布伊卡达岛”，或叫“大岛”，又称“王子岛”。因为这儿曾是拜占庭皇帝放逐失宠王太子的地方。这些王子通常是被刺瞎了双眼后再送到这里来的。

托洛茨基居住的别墅座落在北面的海滨。从这儿到码头只需步行15分钟，周围的房子并不多。这别墅建于四五十年前，结构牢固，显然是伊斯坦布尔某一位达官贵人的夏宫。房子建在一个长方形的花园的中间，它把花园隔成两半，前院临街，后院濒海。花园四周用石块垒起了7英尺高的围墙。这所别墅可通往一头走不通的索卡迪街，沿着这条街可通向大海。人们一进小铁门就可发现，右边有一间小屋，常有4至6名土耳其警察驻守在那里；左边是一条通往内宅的小径。花园虽然无人精心照管，但花木茂盛。下午蜥蜴爬在墙上沐浴着阳光。穿过内宅便可遥望大海，后花园的地势急转直下，坡度很大，在茂密的草木丛中有一条蜿蜒的小路可通到花园尽头的小门，这里有一个专为这所住宅建造的私人码头，码头是用巨石砌成的，十分坚固。

这是一座3层楼的住宅。底层，门厅之后就是一间很宽敞的大客厅，朝着大海一面装着一些大玻璃窗和玻璃门，这个大客厅还兼做餐厅。大门口左侧，有一间房子作为警卫室。不过，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这房间是皮埃尔·弗朗克和奥托·许斯勒两人住的，右侧就是厨房。二楼，中间有一条很宽的走廊，它的尽头有一个可以眺望大海的阳台，走廊两边安放书架，里面塞满了各种书籍和文件。走廊的左侧是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的卧室及盥洗室。在右侧，第一间是作为扬·弗兰克尔和

我的卧室兼书房。隔壁一间是被我们称为机要房的小办公室。打字员玛丽雅·伊利尼什娜就在这儿工作。最后一间是托洛茨基的书房，两边都开窗，既宽敞又明亮。第三层是顶楼。那里存放着旧的报纸和杂志。另一间是供厨师睡觉的房间。这幢房子没有装电话。如要打电话，就得走10分钟路到萨伏伊旅馆去。整幢房子的摆设十分简单。与其说我们是来这里生活，还不如说是在这里临时扎营。全部墙壁都被刷成白色，所有房间都宽敞、干燥、光线充足。

待我安顿下来以后，很快就同这里的人融为了一体。我最初学会的一项重要活动是捕鱼。在后花园附近的码头边，有两只渔船，船身长16英尺，其中一只船还装有马达。一个名叫哈拉兰波斯的希腊渔民，负责看管渔船和渔具。他年轻、单纯豪爽、心地善良。我们常是凌晨4点半，天还没有亮就出发。托洛茨基总是从后院的小路上匆匆赶来。娜塔丽娅偶尔也参加到我们这支捕鱼队来。每次出海，除有1名土耳其警察跟随之外，还要带上一两名秘书。哈拉兰波斯早已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我们一到码头，就立即登船起航。不久东方泛白，晨曦初露。我们就开始撒网捕鱼。我们在哈拉兰波斯的监督和指导下，根据不同的季节和鱼种，运用各种不同的技巧。这种活有时把我们累得精疲力尽。那时马尔马拉海有捕不完的鱼，我们总是满载而归。每次捕鱼，最多的是红鲷鱼和一种我们叫巴拉莫的大鱼，它的形状和颜色类似鲑鱼，但比鲑鱼大得多。当然也有其他的鱼。在平时的伙食中，我们虽然常常吃鱼，但我们对捕鱼还是兴趣盎然。我们还把其中一部分鱼送给岛上的医院。

有时，哈拉兰波斯在傍晚去海边放置捕虾篓，到第二天上午，我们就去把篓取回来。有一天，我们一下捕到了30多只

大龙虾,托洛茨基高兴极了,让我们把虾摊放在餐厅的地板上晾干。有时我们也在黄昏时刻去海边放置饵线。鲨鱼要在夜间才会上钩,一次当我们拉起饵线时,一条7英尺长的巨鲨浮出水面,我们只好把它当场击毙。

我来此之前,这里曾发生过一些有关捕鱼的有趣事件。这些都成为这个家庭茶余饭后谈论的话题。有一天,定期来普林吉坡岛担任秘书工作的让娜·马丹,陪伴托洛茨基去打鱼,满满的一网鱼被拉上了甲板。那位好心肠的让娜·马丹瞧着这些可怜的小生命在甲板上挣扎喘息,她立刻用双手一捧一捧地把鱼抛回海里。不用说,托洛茨基对这种义举是不会赞赏的。另一件事是,一次出海打鱼,船到很远的雅洛瓦附近,突然马达发生了故障,他们无奈只好上东海岸扎营,头顶星空,在海滩上度过了一个夜晚。

有时,我们也去打猎,乘着小船,渡到东海岸卡达尔附近。我们把船拖上海滩,让哈拉兰波斯照管,然后就牵着狗穿过一片荒芜的灌木丛。在这儿,兔子难得一见,鹌鹑几乎成了我们唯一的猎物。托洛茨基的枪法迅速而准确,不过他花在打猎上的时间却远远少于捕鱼,因为他的打猎收获实在不大,常把打猎活动变成散步。这时他会不停地问起家里工作的情况。比如,某封信你回答了吗?等等。可是他在捕鱼时,就不是这样了,他也经常谈些打猎的故事。举个例子,有个农民在西伯利亚打狼,他一边飞快地跑了大半圈,一边拉出绳球上涂着油脂的绳子,这样狼就无法逃脱了。托洛茨基还谈起列宁的打猎故事。列宁每次出去打猎,总要拉上季诺维也夫作伴,而季诺维也夫却不喜欢这项活动,他经常躲进干草堆里,列宁抓住季诺维也夫的靴子,把他从草堆拖了出来。我们有时也在东海岸海滩上野餐。这样一天下来,我的皮肤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

娜塔丽娅按照俄国的方法在我身上涂上一些酸奶酪来治我的灼伤。

我们一大早就外出捕鱼或打猎，回到家里已经是8点了，我们就匆匆吃了简单的早餐，只有茶和奶酪。娜塔丽娅把茶烧开给我们每个人满满地斟上一杯。要是饮料太烫，托洛茨基就按照俄国人的习惯，把它倒在茶托里，然后就拿着茶托喝。我这个刚从法国来的人，最初见到这种做法觉得很怪。

早餐以后，玛丽雅·伊利尼什娜也来到了。托洛茨基就开始用俄语口述，玛丽雅坐在打字机旁便开始工作。玛丽雅所在的那间机要室有一扇门是通往托洛茨基书房的，托洛茨基就在书房和机要室之间来回走动，以一种非常洪亮的声音，不停地口述着。这种工作方式一直要持续到吃午饭的时候。即使我在自己的寝室里，也能听到他那条理清晰的语句和抑扬顿挫的语调，由此可以想象当他向群众演讲时，在那个还没有音响设施的年代里，他会发出多么有力的声音。

当用其他语种写信时，托洛茨基就坐在书桌旁口述。他的法语掌握得相当好，只是在虚拟语态和连词的运用上还有些困难。他的口语也较流利，不过有时他讲法语的语调有些偏高，而讲俄语时似乎并不这样。他把法语中的 *u* 几乎发成了 *ee*，而把法语中不发音的 *e* 变成了 *ay*。他还能用德语口述，据我判断，他的德语书面表达能力比法语还好，发音也是如此。1933年，斯沃贝克和沙赫曼两人先后来岛访问，那时托洛茨基用英语写信还要向他们请教。后来，他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到了墨西哥，他又学会了西班牙语，而且达到了可以阅读和交谈的程度。

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的著作可分为3类：通信、论文或时事小册以及专著。这种分类法也不是绝对的。有时一封信，加

上一个标题,就成了一篇论文或一本小册子,例如,《下一步怎么办?》甚至可看作是一部专著。不过,托洛茨基大部分著作仍可按上述分类。

所以会有这么多通信,主要是世界各地有许多托派组织。托派组织大约在 30 个国家里进行活动,而且各国的组织常常还分裂为两三个派别,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彼此进行着尖锐的斗争。一旦托洛茨基认为自己对这场特殊的斗争已经掌握了足够情报,他就会亲自进行调停。这种调解事情在他信件中占了很大比重。在普林吉坡岛,他对我和皮埃尔·弗朗克是用法语口述,而对奥托·许斯勒或扬·弗兰克尔则用德语口述。他需要用俄语写信时,就找打字员玛丽雅口述,他每隔两三天就用俄语向玛丽雅口述一封长信,发给远在柏林的儿子廖瓦。这些信件都被分类归档,存放在机要室里。

托洛茨基的论文都是针对当前时事而写的。他很少同时写作两篇文章。原先也许是一篇短评,后来却成了一本小册子或一本小书。托洛茨基的全部文章,除了少数几篇后来在困难情况下写成的短文外,都是用俄语口述的。其中很多文章在《反对派通报》上发表。这些文章经过翻译后又在世界各地的托派报刊上转载。有时为了挣钱也写些一般性的文章寄给德国(希特勒上台前的)或美国的“资产阶级”刊物。

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有《我的生平》、《俄国革命史》、《被背叛了的革命》、《论列宁》以及《斯大林伪造学派》。他写这些书,有的化几个月,有的化几年,有几部是同时进行的。

在我来到普林吉坡岛以前,法国已经有不少人在翻译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了,把俄文译成法文。莫里斯·帕里雅宁翻译了《我的生平》一书,但是他的经过修饰的译文和所作的脚注却引起了争议。后来情况有所好转。1932 年春天,雷蒙·

莫利尼尔派遣帕里雅宁到普林吉坡岛住了3个星期。其间，托洛茨基对帕里雅宁作了解释，他希望别人在翻译他的著作时要做到准确和简洁，不要添枝加叶。然后，他又委托帕里雅宁把《俄国革命史》译成法文。我相信，帕里雅宁在土耳其的这段日子里，就在托洛茨基的督促下，译完了此书的部分章节。我到达的时候，第二卷的校样正在校对，托洛茨基仍然觉得帕里雅宁的译文显得累赘。于是我的头一件任务就是和皮埃尔·弗朗克一起删去译者任意加上的华而不实的词藻。以后我也参预翻译托洛茨基的文章。开始时，我到他的书房里把我的译文念给他听，他就对照着俄语原文看。不过几星期以后，他就放弃了这种实践。

上午的工作要到下午1点钟或不到1点才结束，随后大家吃中饭。中饭时间从不超过半小时。平时我们只喝开水，只有到了11月7日，这天既是十月革命节，又是托洛茨基的生日^①。餐桌上才会出现一瓶土耳其的葡萄酒。午餐除了鱼以外，有时还能吃到炸肉丸、蕃茄和辣椒，但几乎从未吃到鲜肉。托洛茨基胃口不大，而且对吃什么毫不挑剔。在相处的7年里，我们一日3餐同桌吃饭，我总是坐在他的右首，可从未听他对食物发表过评论。虽然也可能会讨论法国苹果与美国苹果的区别，但他从不谈自己的口味如何，而只发表一些一般人的看法。托洛茨基不吸烟，也十分讨厌别人在他面前吸烟。

在这与世隔绝的岛上，托洛茨基常常一连几月闭户不出。同这么一班人马呆在一起商议工作，即使在进餐时，他也不考虑到应该跟大伙儿聊些轻松的话题。我记得有几次进餐时，他专心致志，一言不发。要不就是三句不离本行，又谈起眼前的

^① 托洛茨基生日是1879年俄历10月26日，而十月革命节是俄历10月25日。

——译者

工作。他会从一封信或一份报纸上得来的某个消息发表评论。或者，他会把自己的一些最新的政治见解先向我们说说。几天以后，我们就会在他的文章中发现他的这些新思想。有时，他会大谈往事，包括他的少年时代。他说有一次在敖德萨亲戚家里干过一件荒唐的事：在燉鸡里撒了许多芥末弄得大家哭笑不得。有时他的思绪又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在那儿，他的房间紧挨着列宁的房间。除了国内战争以外，他所经历的每一时期几乎都谈到了。对国内战争却只是泛泛而谈，他会把内战时期的某件事，同美国的内战，后来又同墨西哥的内战进行对比。但这些评论总带有他的政治见解。而他个人与国内战争的关系我则从未听他谈起过。

托洛茨基对人物的评论带有嘲讽的口吻，对于他的敌人和对手更是如此。但是他的嘲讽又常常可能是一种友善的玩笑，对于他周围的人，他也是采取这种态度。例如，当时，达拉第是法国的政府首脑，托洛茨基就冲我大发议论：“你们的达拉第”如何如何，毋庸说明，达拉第的上台与我无关。要是遇上一个美国人来访，他就会说：“你们的罗斯福”如此这般。他的谈话常常是十分尖刻和辛辣的。安德烈·布列东于1938年到墨西哥访问托洛茨基后就谈过托洛茨基的那种“戏弄”语调。托洛茨基还喜欢给周围的人起绰号。我不喜欢喝茶，没几天，早餐我又只喝了牛奶。于是“莫洛根”（只喝牛奶的人）就成了我的外号。（据说俄罗斯有个教派成员叫“莫洛根”的，他只靠喝牛奶过日子。）有一天，我修好了一只水泵，于是又得了一个新头衔——专家治国论者。那是在1933年春，当时“专家治国论者”还是一个刚刚出笼的新名词。后来，我为了办理去法国的签证手续而到伊斯坦布尔法国使馆去洽谈，那时我就以“外交部长”闻名。以后到了墨西哥，我已摸透了托洛茨基的

脾气，常常不等他吩咐就将事情办好，这样，他又给了我一个外号——“乌热”（俄语，其意是“早已准备”）。据说，列宁曾经给斯维尔德洛夫起过这个外号。

午饭后，托洛茨基就上床休息，他不允许任何人去打扰他。此时，不管有什么事情，即使来了电报也只好等一等。在这段时间里，他读些非政治性的著作，最常读的是俄国小说或者法国小说。当时他阅读的就是朱尔·罗曼的长篇小说《好心人》。他认为罗曼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艺术大师”。他读书后，午睡20分钟光景，一般到4点钟为止。于是整个寓所的生活重又复苏了。

每天下午，我们大家都聚在餐厅饮茶。这时的谈话内容与午饭时差不多。晚餐是7点，吃得很简单。晚餐后，托洛茨基回书房继续工作。直到9点或9点半才回卧室就寝。他经常失眠，所以总吃安眠药。娜塔丽娅第二天上午就会告诉我们：“L.D.①昨天夜里又服了安眠药。”弗兰克尔对我说过，1930年，法国托派组织内部的派别斗争非常尖锐，有关斗争新动向消息的电报要是白天来迟了，他就同娜塔丽娅商量，不把电报送给托洛茨基，而拖到第二天上午才送去，这样可以使托洛茨基安安稳稳地睡一夜。

托洛茨基入睡时，我们总有一两个人整夜守卫着他，像白天一样轮流值班。我们关心的是托洛茨基的生命安全。从1923年他率先反对斯大林开始，他面临的危险一直是有增无减。到1932年，斯大林也许已经明显地意识到让托洛茨基离开俄国是个错误，²托洛茨基在国外找到了许多新朋友，并且用俄文出版了《反对派通报》，源源不断地发表了不少专著、小册子和论文。随着岁月的流逝，斯大林想通过暗杀托洛茨基来

① L.D.指托洛茨基。——译者

“纠正”其错误，这种可能性在日益增长。对托洛茨基来说，潜在的危险还来自另一方。这几年，伊斯坦布尔的白俄分子很多，这些参加过国内战争的人对托洛茨基耿耿于怀。事实上，这两股威胁势力很容易串通一气。斯大林通过格伯乌可以雇用白俄分子来谋害托洛茨基。

所以在1932年到1933年，安全问题是头等大事。保卫工作化去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我们始终枪不离身，随身带着德国手枪，后来到了墨西哥，又配备了自动步枪。托洛茨基本人有一枝小得出奇的手枪，我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每当托洛茨基下楼吃饭时，我们就把门窗关上，门窗上都有铁板，并且派一个人在房子周围的花园里巡视。晚间，总有一个人在门口警卫室里值班，每隔一定时间出去巡逻一次，有时还搭上一个土耳其警察一起警戒。但对于警卫的效果，我们从不抱有乐观的态度。试想，一个拥有雄厚财力和技术手段的堂堂大国，要想干掉一个人，而这个人却两手空空，只有几个年轻朋友在他身边保护，这场竞争的结局将会如何呢？因此，我们只能是尽力而为吧。我想，这样做至少可以防止精神失常者的袭击。事实上，格伯乌的一个特工人员，叫布鲁姆金的，他在内战期间曾是托洛茨基军事指挥部的成员，1932年，他来伊斯坦布尔，在街上遇见了廖瓦，他就秘密拜访了托洛茨基。来访者忠告托洛茨基：至少要有20个受过训练的人，才能保证安全。而我们，只有三四个人，而且也没受过什么训练。但是，这些困难丝毫不会削减我们的热情和忠诚。

保卫工作令人疲惫不堪。我们采取过好几种值班方式：一种是4小时一班，大家轮换；另一种方式，是一个人连续值班24小时。但不管那种方式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我们的人实在太少了。清晨两点被叫醒去换班，而且月复一月地连续下

去，真叫人难以忍受，睡眠不足是普林吉坡岛给我留下的记忆之一。白天，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躺在床上看书或打盹，碰巧托洛茨基闯进来，他一定会大喊一声：“瞧，这里有一个俄国移民！”

每天早晨，除了星期五，这天在土耳其是作为节假日的，邮递员总会送来一大捆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有书信、报纸、书籍、文件等。我们先把所有的包裹打开，然后再交给托洛茨基。但信是不拆的，因为当时的暗杀技术看来还不可能将致命的装置放入一个小小的信封里。每天总收到一些古怪的信件，有的署着一个《圣经》中的名字，也有人劝托洛茨基保持健康，或是拯救他的灵魂。每天还会有一些要求托洛茨基亲笔签名的信件。

我们这儿也能收到来自西欧的报纸，但总要相差两三天。托洛茨基经常阅读的有《巴黎时报》、《德意志大众报》等。读报时，他总喜欢用红蓝铅笔在报上作些记号。有些文章则剪下来，归入文件夹以便写作时参考。每天上午，我们都收到土耳其各种日报，至少大标题我们都可看懂。每天下午，我们就派人到码头去买由伊斯坦布尔出版发行的法文和德文晚报，从中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大通讯社的电讯。

我们同岛上的居民极少交往，这儿雇了一个希腊厨师，他睡在这里。还雇一位每天上午来做清洁工作的希腊妇女。1929年托洛茨基刚来岛上时，出于安全考虑，曾经打算不请外人帮忙。但是这个计划不久就废弃了，因为有些事我们干不了。让娜·马丹在1959年2月25日给我的信中就谈到这个问题：“我到别墅后，雷蒙问我，除了干一点秘书工作（即阅读和剪贴外文报纸——我选择了英文）外，是否愿意在娜塔丽娅的配合下给大伙儿做饭。他向我解释说，由于安全的原因，我们不能

雇人帮忙,尤其是厨师工作,我想你是会理解的。于是我接受了。我扮演的角色真有点棘手,有点难以胜任。L.D.总是要求我尽快把剪报给他(您得记住,我们必须浏览来自欧洲的所有报纸),可另一方面,我必须承担一切杂务活,从买菜到做饭,而且由于医生的嘱咐,L.D.的饮食有严格的规定,每天要准备两种不同的饭食。厨房设备又是那么原始落后,并且要准时开饭。你也知道,因为L.D.有一张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有一天,由于午饭没能在规定时间内准备好,我见他重新回到书房后就再没有下来。到了开饭时间,他不用别人叫自己会下来的。这时饭菜必须准备好。他不称赞,也从不抱怨。但是,娜塔丽娅和我实在被弄得疲于奔命了。”很显然,这种体制是无法工作的。后来就只得雇人帮忙了。

在土耳其,我们既没有朋友也没有熟人。在伊斯坦布尔,同我们有关系的只有一位美国人房东。我们每月要向他交房租。另外还有几个店主,因为我们要从他们那儿购些办公用品和渔具之类的东西。我在普林吉坡期间,托洛茨基到伊斯坦布尔找过一两次牙科医生。那时我们曾租用一艘汽艇,它就停在后院的码头上,这样我们就可直驶伊斯坦布尔。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居住的整个时间里,从未遇到过来自土耳其当局的麻烦。1920年在争取土耳其民族独立斗争期间,凯末尔元帅曾经得到过苏俄的武器援助。这正是通过当时担任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提供的。几年以后,有位访问者披露了托洛茨基在1933年对他说的话:“当年土耳其与希腊打仗,我曾经派红军支援了凯末尔元帅,这点老交情他是不会忘记的。所以凯末尔不顾斯大林的压力,没有把我监禁起来。”这话可能不是托洛茨基的原话,但他确实提供了军事援助。我也曾听说过,在俄国革命早期,列宁和托洛茨基曾被土耳其议

会授予名誉议员的称号。

1965年9月热拉尔·罗森塔尔告诉我一件事：这事发生在1930年初，当时他到普林吉坡岛拜访托洛茨基，在那里住了大约两个月。一天凯末尔元首来拜会一位部长级官员。这位部长住的别墅靠近托洛茨基住的别墅。凯末尔派了一位副官来问托洛茨基是否愿意接待他。托洛茨基为了避开会面，就借口身体欠佳。这可能是因为托洛茨基不想同凯末尔建立任何私人接触。这位元首当时正在迫害土耳其共产党人。据我所知，这是土耳其最高当局与托洛茨基之间建立联系的唯一的一次尝试。

1932年11月，托洛茨基计划离开土耳其，前往哥本哈根进行演说，未费任何周折，土耳其当局就给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签发了土耳其护照。那时他们的苏联护照已经期满，而且也无法更换。因为1932年2月20日苏联当局已经作出判决，取消托洛茨基及其家属的苏联国籍。他们从哥本哈根返回后，就立即获准仍回岛上居住。1933年7月，他们去法国时也是使用这张土耳其护照。实际上这些早已超期的护照在后来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被迫去挪威和墨西哥时仅仅起了身份证的作用。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想去土耳其访问托洛茨基，并打算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土耳其当局也都准予入境，从不加以阻挠。就拿我来说，只是说访问托洛茨基是为了联系出版或翻译事宜。

在普林吉坡岛，外来人必须到当地警察局去登记，对于住在托洛茨基寓所的人来说，办这个手续总是十分简单的。奥默·艾凡提，这个守卫住宅大门的土耳其警官能说一口俄语并能说几句法语，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才被选中的。他是高加索人，有一天晚上，他以一种自信的语气对我哼着曲子，声

音低得连旁边的警察也听不到，歌词的开头是这样的：“我不是俄国人，我不是土耳其人，我是高加索人。”

可见，我们同土耳其当局的关系是恰当的，我们从不为解决一件小事而过多地去同高级官员打交道。后来我们在墨西哥也是如此。比如，美国托派领导人阿恩·斯沃贝克于1933年来普林吉坡岛，他途经柏林，廖瓦托他给我们捎带一台短波收音机。入境时，这台收音机被海关官员没收了。在伊斯坦布尔海关大楼里，我花了两天时间同土耳其当局进行一场徒劳的谈判。结果我只得提着一只空箱离开了海关。

随着托洛茨基到达土耳其，来自西欧的拜访者便接踵而至。最先来的是一位法国律师莫里斯·帕兹。他是1929年3月12日或者是13日到达的，并且住了几天。他是巴黎的反对派集团的领导人之一，这一派出版了《反潮流》杂志。托洛茨基与帕兹之间的政治讨论很快陷入了不愉快的境地。再说帕兹也没忘记他是个律师，他甚至很明确地要求托洛茨基补偿他的车旅费。托洛茨基不禁感到大失所望。不过，他认为有一点是可取的：帕兹向他推荐某一种牌子的墨水。因为托洛茨基是个笔不离手的人，而且总喜欢把每件事都写下来，因此就采纳了这个建议。托洛茨基后来在谈到帕兹的这个推荐时说：“这是他做过的唯一的一件好事。”

1929年3月底，从巴黎来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4月20日托洛茨基在给帕兹的信中写道：“就个性来说，雷蒙·莫利尼尔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乐于助人、最讲求实际、干劲最足的一个人。他为我们找到了住所，替我们同房东太太谈住房条件，等等。他还非常乐意地带着他妻子跟我们一起住了几个月。”莫利尼尔确实赢得了托洛茨基的敬意。几个月后，托洛茨基对一位来访者说：“雷蒙·莫利尼尔是未来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榜

样。”莫利尼尔于5月返回了巴黎，但他的妻子让娜(她的原名叫马丹·德·巴里埃)仍在岛上住了一段时间。

托洛茨基的老朋友阿尔弗雷德·罗斯麦及其夫人玛格丽特·罗斯麦在1929年5月上旬来访。罗斯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巴黎结识托洛茨基的，20年代初又在俄国见到他。玛格丽特在岛上住了4个星期。阿尔弗雷德·罗斯麦一直住到7月中旬。在此期间，罗斯麦夫妇成了托洛茨基同外界联系的中间人。玛格丽特主要负责同出版商打交道，因为她手头有一大笔钱，虽说数字并不大得惊人，却也十分可观，因此她取得与出版商签订《我的生平》及《俄国革命史》两本书出版合同的权力。

雅各布·弗朗克(也叫格拉也夫)是一个立陶宛后裔懂俄语的奥地利人。他于5月29日来这里担任秘书工作，直到10月底才离去。7月初，热拉尔·罗森塔尔和皮埃尔·丹尼斯·纳维尔到岛上商议，准备在1930年建立雷蒙·莫利尼尔、皮埃尔·弗朗克和阿尔弗雷德·罗斯麦3人为首的统一的法国托派组织，并打算在巴黎出版《真理》周刊。10月初，由玛格丽特·罗斯麦选派一个法国人罗伯特·兰茨到岛上来做了几个月秘书工作。罗森塔尔于1930年1月底回国大约呆了2个月。1930年4月15日，由玛格丽特介绍来当秘书的扬·弗兰克尔是从布拉格来的。他留在岛上的时间比先来的任何人都久。正因为他在岛上，廖瓦才能在第二年前往柏林。

莫利尼尔夫妇继续定期来土耳其拜访，有一回，雷蒙·莫利尼尔单独返回巴黎，把让娜留在岛上。在一个炎热的土耳其之夜，让娜与廖瓦相爱了。让娜只把这种关系看成是一夜欢情，她打算回巴黎与雷蒙重新团聚。而廖瓦却把这次冒险行径看得非常认真，并扬言如果让娜不再与他相爱，他就自

杀。于是他们同居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让娜也深深地爱上了廖瓦。她在1938年廖瓦去世时的不少来信中，都充满了悲痛欲绝的哀伤之情。由于廖瓦和让娜的私通，托洛茨基对儿子十分恼怒。

廖瓦启程去柏林以后没几天，即1931年3月1日凌晨两点，伊泽别墅里的人们都被大火惊醒了。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齐娜都冲出屋子来到花园。弗兰克尔还在着火的屋里把文件资料从窗口扔出来，直到消防员赶到现场，才迫使他撤离。这场大火来得十分突然，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火焰吞没了一切。我初到普林吉坡岛时，曾看到的那些书籍，书皮已经烧焦，里面却仍完好无损。这场大火是安装在顶楼的热水汀引起的，那个取暖装置整夜在运转着。大火只烧了顶楼和二层楼。齐娜和弗兰克尔住的底层却安然无恙，整座房子仍然矗立着。一楼和二楼之间的天花板也未倒塌。由于大火被迅速控制，二楼还留下了两间相连的小屋，里面的东西基本无损。这次被烧毁的是一些书籍、革命时期拍摄下来的照片、写作所需的有关国际形势剪报，还有一些私人物品和两架俄文打字机。被抢救出来的是托洛茨基正在撰写的《俄国革命史》第二卷手稿，以及全部重要文件，包括托洛茨基与西伯利亚流放者之间的来往书信。托洛茨基逃离屋子时就随身带着记录西伯利亚人通讯地址的笔记本。

娜塔丽娅在1958年同我的一次交谈中，她告诉我，在那次大火中受损失的只是一些印刷品。除此之外，只是些放在托洛茨基桌上或者玛丽雅桌上的几封尚未答复的信件，以及托洛茨基正在写的有关法国《乌斯特里事件》论文的几套手稿。几年以后，托洛茨基在一封信中提及，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评论的著作手稿都毁于那场大火。我估计他是记错了，因为他

是在大火以后很久,即1933年初才酝酿写这部书的,他在1931年初写的信中也从未提到过这部著作,而且娜塔丽娅在1958年与我谈话中也否认了这部手稿毁于大火之说。

在大火中幸免于难的人们来到了萨伏伊旅馆,住在院里一幢单独的只有三间小居室的风子里。弗兰克尔后来说:“由于这场大火所造成的无法挽回的损失,除了托洛茨基同志之外,我们大家都心乱如麻,忧心忡忡。可是,我们刚刚安顿下来,托洛茨基就把他的手稿往桌上一摊,叫来了速记员开始口述他的著作,好像当天晚上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后来,1940年5月25日凌晨,在墨西哥科约阿坎发生了第一次谋杀事件时,托洛茨基也同样镇定自若。凶手们在西克罗斯指挥下,射击一阵后就逃跑了。托洛茨基在等待墨西哥警察到来的这段时间里,又坐在书桌前开始写作了。看来,写作或口述是他保持心理平衡的一种方法。火灾后不几天,雷蒙·莫利尼尔和他的兄弟亨利从巴黎赶来,忙着为大伙儿寻找新住所,结果在莫达找到了。

当我到达普林吉坡岛时,法国托派团体的一场政治危机导致了托洛茨基和罗斯麦夫妇间的决裂,于是他俩的任务就由雷蒙·莫利尼尔担当起来。由于考虑到实际结果而站在托洛茨基一边的人,当时有:在柏林的儿子廖瓦、在普林吉坡岛的扬·弗兰克尔、在巴黎的莫利尼尔。在某些问题上,亨利·莫利尼尔也扮演过重要角色。这一班人中,总的倾向显然是反对纳维尔的。廖瓦和弗兰克尔,更不必说莫利尼尔兄弟,对纳维尔的评价远不如托洛茨基所作的那么精辟入微。托洛茨基虽然与纳维尔有分歧,并且常常为他恼怒,可他对纳维尔身上的那种知识分子品质还是很尊敬的。在我们房间的盥洗室的房顶上,弗兰克尔还保存了两期《革命超现实主义》杂志。他就

把它们拿给新来的人看，以此来证明纳维尔的那种超现实主义者的狂热劲。

托洛茨基对于来访者和新来的人显得十分亲切。他的谈话、解释、手势以及提问，确实都很有魅力。当有年轻妇女在场的时候，他似乎显得特别活跃。但是谁跟他一起工作的时间越久，他就越挑剔，而且态度也变得愈加粗鲁。我们发现自己的处境与这种变化大有关系，我们不得不从早到晚，成年累月地一起守在这块小天地里，受到旷日持久的安全措施所约束。一切都要事先安排，不论是接待来访还是外出旅行，绝不能随心所欲。托洛茨基有一次冲我发牢骚：“你们简直把我当成一件物品了。”

从1929年到1940年，也就是托洛茨基第三次侨居国外期间，他对待3个人是最粗暴的。这3人就是廖瓦、扬·弗兰克尔和我。弗兰克尔告诉我，在普林吉坡岛期间，廖瓦同他的父亲关系十分紧张。有一次廖瓦曾经说过，他要到伊斯坦布尔的苏联领事馆去打听一下，是否可能申请回国。虽然弗兰克尔从未说，廖瓦在这件事上确实采取了什么行动，但是廖瓦在1937年7月7日给他母亲的信中有这样一些令人生疑的话：“假如我在1929年被批准回苏联……”这似乎隐约说明，廖瓦确已向苏联使馆提出过回国的申请，但遭到了拒绝。1937年2月15日，由于没有及时邮寄关于莫斯科审判案的几件证书，托洛茨基大为恼火，他就写信给当时住在巴黎的廖瓦，信中说：“我很难说清楚，落在我身上的沉重打击，究竟是来自莫斯科还是来自巴黎。”

至于我和托洛茨基的关系，我觉得是一种不断调节的关系。我们之间有时欢声笑语、亲密无间，可是不多一会儿，他会莫名其妙地对我发脾气，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但很奇

怪，后来在墨西哥，他同美国秘书和警卫人员的关系不知怎的变得单纯了，或者说他克制了，不像原先那样反复无常了。那几年他确实老得很快，但也许是因为面对美国人的心平气和，他的急躁脾气也就失去了昔日的锋芒。

1933年6月发生的一件事，可以说明他的那种粗暴性格：我们每次出海捕鱼回来总要把装在船尾的马达拆下来，放在清水桶里发动几分钟，作一次清洗，以防机器受海水的腐蚀。一天上午捕鱼回家后，我们发现专用汽油不多了，余下的都是冬天使用的油，于是我们就决定在专用汽油没买到以前不启用马达。当天下午，我打算把马达拆洗一下，因为必须要把海水排除干净，只好用一点稍有区别的专用油，在靠近码头的花园边上一个水桶里发动马达。托洛茨基一听到马达声，就立刻跑到阳台上，隔着花园，声嘶力竭地对我嚷道：“马上停止！”此时此刻，你若要向他解释什么，那是枉费心机的。

对于物品的保管和使用，托洛茨基有严格的规定。总的来说，他循规蹈矩、一成不变，缺乏机动性和灵活性。对于自己的心爱之物，诸如钢笔、马达、渔具和猎枪，都必须按规定使用和保养，这些规矩几乎是不可改动的。对他来说，要使自己适应新的设备始终是一个艰难过程。笔对他来说是最珍贵的东西，选用一枝新笔必须经过许多次试用方可。对钓鱼工具，他也非常仔细，他特别喜欢从美国带来的鱼线和鱼钩。他总是按照说明书上规则去操作马达，绝不允许出现任何违章行为。在岛上，弗兰克尔曾告诉我，托洛茨基在俄国时，想备一辆轿车供他自己驾驶。他的朋友苏联外交官越飞从国外带给他一辆有特殊装置的大功率的“梅西德”轿车。托洛茨基扶着方向盘开了50英尺，就掉进了沟里。从此他就不再开车了。后来，1933年夏天，在圣巴莱期间，为了安全的需要，只许托派组织

的人进入住宅,因此我们就没有人去帮助干家务。这样一来家务活全部落在让娜·马丹和雷蒙·莫利尼尔的新伴侣薇拉·拉尼斯身上,不过我们在休息时也尽可能地去帮助干点什么,尤其需要帮忙的是每天晚上洗碟子这样的杂务活。一天傍晚,托洛茨基也来插一手。他擦洗每一只盘子和杯子都特别仔细,这样一直干到很晚才结束。大伙儿都感到,他不来倒省力些,来帮忙反倒更累了。

托洛茨基从不喜欢装饰物之类的东西。有一段时间,他在床头摆了一张拉柯夫斯基的照片,他也许是托洛茨基在俄国时私交最深的朋友。这张照片是1932年从俄国秘密带出来的。1934年4月,当拉柯夫斯基已经向斯大林屈服后的一天,我正在巴比仲别墅花园里,焚烧一些无保存价值的文件,如译稿之类的东西,这时托洛茨基向我走来,把拉柯夫斯基的照片递给我,说:“给你,把它也烧了吧!”

托洛茨基书房的桌子上总是堆满了书报文件,他按自己的方法堆放,因此很清楚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任何人不能动他的书桌,即使娜塔丽娅也只能轻轻地掸一掸桌上的灰尘。在普林吉坡期间,托洛茨基在他的书房里有一只小铁盒,我们称它为百宝箱,那里面保存着最机密的文件。后来,他不在书房里保存文件,而把所有的文件统统存放在由秘书分类整理过的档案库里。唯一没有存入档案库文件夹里的东西是谢尔盖的信。这些信由娜塔丽娅珍藏在她自己的房里。

当我来到普林吉坡岛时,正好有一位美国人B.J.费尔德(他的真名叫古尔德)和他妻子埃丝特都在伊斯坦布尔逗留。他俩曾是美国托派组织的成员,由于内部派系斗争而被开除了。费尔德是一位经济学家,曾在华尔街商行工作过。当时全世界正处在经济萧条困境中,托洛茨基密切注视着经济的发展,

因此很重视费尔德的经济实践知识。在我到达后的数星期内，他们进行了频繁的交谈。我经常在下午4点半在托洛茨基书房里与他们相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们是用德语交谈的。托洛茨基甚至还打算跟费尔德合作写一本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专著，但最后毫无结果。每次交谈，埃丝特总是坐在屋角，给托洛茨基作油画肖像。我不知道这幅油画最后是否画成。

我去普林吉坡岛的启程日期起初定于1932年6月，但由于托洛茨基可能去捷克斯洛伐克治病，并在矿泉疗养地呆了一段时间，所以我的行期被推迟了。七八月间，托洛茨基的行程仍未最后确定。有一次看来一切准备就绪了，然而由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犹豫不决，计划又被打乱了。到9月份事情已经明朗，旅行去不成了，所以我去普林吉坡的行期才定了下来。我到达时，一个新计划正在筹划：托洛茨基应丹麦大学生组织的邀请，准备赴哥本哈根进行演讲。起先没有作什么准备，但到了11月初，情况突变，以致在动身前没有时间去处理许多悬而未决的事情，这就势必要有人留下来。这个差使落到了一个最后到达岛上的人，也就是说落在我的身上。除了谢瓦和我以外，托洛茨基以及宅子里其余的人全部于1932年11月14日离开了伊斯坦布尔。谢瓦准备去维也纳，因为他母亲即将从柏林迁往那里，但是奥地利驻伊斯坦布尔的领事由于没有接到上级的特殊指示（后来才接到），而拒绝为6岁的孩子签证。后来，我和谢瓦办妥一切手续于11月23日离开了伊斯坦布尔前往马赛，再从马赛乘火车到巴黎。我们在巴黎呆了一个星期，这时托洛茨基正在哥本哈根访问。

托洛茨基所以接受丹麦大学生的邀请，是因为这将给他一个机会使他能够通过演讲来捍卫他的思想，并得以会见相

当多的一批志同道合者。大约有 20 来个托洛茨基主义者从欧洲各国来到哥本哈根同托洛茨基进行了政治性讨论。也许他还希望能被准许定居在某一个西欧国家。不管怎样，他毕竟小心翼翼地 向丹麦政府递交了永久签证或至少是长期居留许可证的申请书，但毫无结果。既然没有别的国家愿意接受他，那就只好返回普林吉坡岛，别无他法了。法国政府甚至不许托洛茨基在巴黎中途下车。12 月 6 日他由敦刻尔克出发，上午 10 点到达巴黎的北方车站后，只好搭乘 11 点 10 分的火车开往马赛。

由于轮船航班的关系，托洛茨基必须等候大约 10 天光景才能乘上下一班去伊斯坦布尔的轮船。法国当局同意托洛茨基在马赛郊区居住一段时间，可以临时租用一所别墅住下来。亨利·莫利尼尔已先去马赛寻找住处了。12 月 4 日，我也离开巴黎前往马赛，在那里，我和亨利一起将住处安排妥当。12 月 6 日，我乘火车前往阿维尼翁，去迎候从巴黎开来的托洛茨基所乘的那趟列车。

在回马赛途中，我与托洛茨基、廖瓦同坐一个车厢。乘此机会，我开始向他介绍巴黎托派组织的近况。因为一星期前我在那里作了实地调查。托洛茨基制止了我，他很自信地说，法国警察在车厢里安装了窃听器。我向他解释说，在行驶的列车上要利用窃听器是困难的，因为周围的噪声很大。但他仍不放心。

火车在马赛附近的一个小站作了一次例外的停靠，说是亨利·莫利尼尔在那里迎接我们，并准备了几辆开往别墅的汽车。亨利的确带了几辆车在那里等候，但原计划已被改变：法国当局决定让我们直接到港口乘坐一艘于第二天开往伊斯坦布尔的意大利轮船。那时天已黄昏，真让人大失所

望,但也无可奈何,我们只得到港口登船。这是一条装运石灰的又小又旧的船,船的舷梯只不过是一块平放着的木板。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雷蒙·莫利尼尔都上了船,我还在码头上忙着。这时托洛茨基突然走下舷梯,向站在码头上的警官匆匆而去。娜塔丽娅和雷蒙也紧随其后。托洛茨基用手指着警官的鼻子,大声地说道:“我们不能在这种条件下航行,法国政府欺骗了我们。”这是我所见到的他很少几次大动肝火中的一次。他嚷道:“难道你相信法国警方有权强迫我们上意大利船吗?”那警官回答说:“是的。”但他并没有粗暴地用身体阻止托洛茨基登岸,虽然他完全有权这样做。结果查明,这条船确实是一条又旧又慢的老爷船,通常都不载客的,这次是应法国当局请求,才临时作此安排。法国政府一心要托洛茨基尽快离开法国。且不说,这条船要两个多星期才能到达伊斯坦布尔,而且它沿途还要停靠好几个港口装卸货物。这就势必要日日夜夜在这种令人讨厌的噪声中度过。

我们就站在码头的照明灯下,挨着那倒霉的货船。夜深了,有几个人坐在行李箱上。四周布满了穿制服的警察和便衣,但没有记者。法国警方显然没有兴趣让自己的行动公诸于众。

于是我们开始商议对策。先是给巴黎打电话。在码头上,托洛茨基向我口述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发给当时的法国总理埃里奥及其两位部长肖当和德芒齐,抗议法国警方的欺骗行为。这时有人建议我们不妨去转乘一艘定期开往伊斯坦布尔的真正的意大利客轮,只要意大利能为我们签发过境证就行了。鉴于那条货船不会在第二天下午以前登程启航,法国警方才同意托洛茨基及其随行人员在马赛旅馆里休息一夜,条件是:如果第二天上午意大利不签发过境证,托洛茨基必须

登上这艘意大利货轮。大约在凌晨 3 点半，我们才住进了马赛
的雷吉娜旅馆。但是对我来说，一天的事情还没完，我还得
担任警戒，坐在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的卧室门口走廊里一把
椅子上守卫着。

翌日，12 月 7 日，亨利·莫利尼尔去意大利领事馆。向罗马
联系的电话打通了，于是使馆签发了过境证。下午托洛茨基、
娜塔丽娅、扬·弗兰克尔、奥托·许斯勒乘火车前往文蒂米利
亚，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不得不向即将返回柏林的廖瓦挥手
告别。一位意大利警官在边境上等候着我们。当时法意两国
关系不好，并且由于在马赛的这一插曲，这位意大利警官忍不
住要刺激一下法国。他说：“托洛茨基先生，您在这儿是自由
的。”这显然是言过其实，因为我们只能在警察严密监视下按
照预定日程穿越意大利。我们从文蒂米利亚到热那亚，从热
那亚到米兰。12 月 8 日上午到达米兰后，又几乎马不停蹄地
动身去威尼斯，下午 3 点多钟到那里，打算直接坐轮船去伊斯
坦布尔。在途中听说，轮船刚刚离开了码头，如果我们乘火车
到布林迪西还能赶上这艘轮船，因为它在那里也将停靠。在
等候火车的那段时间里，我们在警察陪同下观光了威尼斯市
容，并乘坐警方的汽艇游览了运河。大约晚上 9 点，我们坐上
了去布林迪西的火车，第二天即 12 月 9 日，就在那里登上了
意大利的亚德里雅号邮轮。

在这段曲折多难的日子里，托洛茨基郁郁寡欢。因为他
在刚过去的几星期内，有机会再次接近人民，而现在他只好离
开西欧回到那与世隔绝的小岛去。船在比雷埃夫斯停泊时，他
也没有上岸。12 月 11 日晚上我们到达伊斯坦布尔。当晚在船
上睡了一觉，第二天上午才去普林吉坡岛。皮埃尔·弗朗克
从巴黎乘火车返回，赶在我们前面到家，他已安排好家里的一

切，哥本哈根之行就这样结束了。

普林吉坡岛寓所里的生活又恢复了原样。托洛茨基又开始工作了。他似乎重新焕发出无限精力。他虽然因未能获准在西欧定居而感到不快，但也许他并不真正相信定居是可能的。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俄国的经济形势，当时面临着极其危险的局面；二是从组织上加强国际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它正在取得良好的开端。关于俄国的经济问题，我曾跟他就经济增长率作过一次讨论。我借助从佩拉法国人开的书店里买来的一张对数表，并根据各种增长率绘制了一些曲线图表给他。他把图表放在书桌上从不使用。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不相信那种使他不能一目了然的数据。

圣诞节前夕刮起了一场风暴，海上巨浪滔天，连拴在后门码头水坞里的两条捕鱼船也感到不安全。一排排巨浪向码头袭来。我们只好在黑夜里，完全凭着自己的体力把鱼船拖出水面拉进花园。托洛茨基也全力以赴地协助我们。

1929年，托洛茨基在苏联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小住了几日，当他离开使馆时，苏联政府以“版税”名义给了他1500美元。托洛茨基同时还得到了一份苏联护照，护照上职业栏内填的是“作家”。托洛茨基接受世界各地报社的采访因而赚取了一笔钱，他以此来支付在土耳其的生活费用。他的著作，首先是《我的生平》与《俄国革命史》两部著作的出版合同，使他也得了一大笔钱。这笔钱一部分用来资助出版《反对派通报》，同时也用于创办许多诸如《真理》周刊之类的托派报纸，还有一小部分钱是寄给西伯利亚流放者的。

处境贫困是当时所有革命者注定的命运。托洛茨基由于同出版商签订了合同，因而他比较宽裕。但当我在1932年10月到达普林吉坡时，这种宽裕已告结束。哥本哈根之行，导致

他财政亏损极大，尽管有丹麦大学生组织和美国广播公司为此支付了一笔钱。但在以后岁月里，财政困难越来越大。

1933年1月5日，扬·弗兰克尔离开了普林吉坡岛，前往才从柏林迁至巴黎的“国际书记处”工作。就在同一天，齐娜在柏林寓所里用煤气自杀了。她的自杀是在当天下午两点被发现的。廖瓦给娜塔丽娅发来了电报。电报是1月6日送到的。这时我们刚好吃完午饭。我记得那天是皮埃尔·弗朗克担任警卫值班。他把电报交给正想上楼的娜塔丽娅。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拆看电报后，什么也没对我们说，立刻关上了卧室房门。我们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事情，可又一无所知。我们是看了晚报后才得知这条消息的。一连几天，托洛茨基闭门不出，只是偶而半开着房门，要我们给他送茶水去。几天以后，他才重新回到书房继续工作，看来他面容很憔悴，两道深深的皱纹从鼻子两侧延伸到嘴角。他的第一件事情是口述一封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他在信中说，他女儿之死应归咎于斯大林。

我从未见到过齐娜。扬·弗兰克尔和让娜·马丹曾对我谈起过她。托洛茨基有子女4人，只有齐娜的长相最像父亲，而且在气质上也有些相像。她写给父亲的信充满着激情。她和她儿子谢瓦于1930年底才离开俄国，他俩是托洛茨基家庭成员中最后离开俄国的。这孩子的父亲普拉东·沃尔科夫当时在西伯利亚流放。齐娜和谢瓦在土耳其一起生活了9个月，她就独自去了柏林，打算去找廖瓦和让娜·马丹，准备在那里接受精神分析疗法。她把谢瓦留在普林吉坡岛上，托洛茨基对此很生气。1932年6月30日，托洛茨基给廖瓦的信中写道：“你母亲（指娜塔丽娅）被谢瓦缠住了手脚，……我们必须尽快解决谢瓦的问题。”这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就是早晚要把谢瓦送

到法国去跟他妈妈一起生活。我在1932年10月到普林吉坡时，谢瓦还在那里。他是个文静听话的孩子，早上去学校读书，回家常常呆在房间里。其实，娜塔丽娅的手脚并没有被他捆住。

在柏林，齐娜找了一个会说一口流利俄语的犹太医生给她治病。让娜经常去探望她。谢瓦跟着我从普林吉坡到了巴黎后于12月14日前往柏林，在那里同分别1年多的母亲团聚了。

很多年以后，在1959年3月27日的一封信里，让娜对我谈到了托洛茨基的女儿：“简单地说，齐娜对丈夫普拉东已经有些淡忘了。由于两人分开这么久，所以人们并没有为此责备她。她的肺结核症正处于吸收好转期。她绝对没有想过要重返俄国。恰恰相反，她希望留在国外。而正是L.D.希望她考虑回国。因此她的行为在某些方面开始表现得有些反常。她最担心的事莫过于有朝一日发现自己被迫返回俄国。她确实常常出现谵妄症的病状，因此一直在诊所接受治疗，但她却从未完全丧失理智，而且发作的持续时间也不长。我们问过医生她的病对谢瓦是否会有影响，医生劝我们把孩子留在她身边，这也许对病人有好处。医生并不认为这对谢瓦会有什么危险。在病情严重时，你知道，她也曾经考虑过要使孩子远离自己，她最后想到的是孩子。当然她有许多变态心理，如果考虑到她去柏林以前的生活经历，那么这又似乎是十分自然的。但我不认为驱使她自杀是由于想到自己的精神病即将再次发作，何况当时她的病情已接近治愈，因为她已经自由地离开了医院，回到她寄宿的公寓和谢瓦一起生活了。真正的原因是：她感到绝望，这种绝望之情我只能与你面谈而不能写在纸上。她的绝望之情曾记述在纸上，那纸当时还留在她的寓所里，没有

要销毁的迹象。她甚至连想也没想过。我自问，为什么我们不把它们毁掉呢？但是我可不能自作主张地采取这个行动，万一列夫（指廖瓦）决定把这些材料妥善地保存起来呢……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最后却落入警察手里。廖瓦死后，警方两次到我在巴黎的寓所进行搜查。一想到这些微妙精细令人痛苦的东西竟然在警察肮脏的手里拿着，该多么可怕呀！现在要重新得到它们、甚至查到它们的线索，是决不可能的。战后，我们曾正式要求警方归还被查抄去的东西，包括这些材料，但最终得到的答复是这些东西全都找不到了。”

1959年9月，在我和让娜的一次谈话中，她提到另外3件事：第一，齐娜在柏林时对廖瓦并不信任。在自杀之前，正是让娜接到过她留下的一封短信，她在那张字迹清晰的便条上，写道：“请好好照看谢瓦，他是个乖孩子。”第二件是齐娜死的时候，已经怀孕了，对此让娜未多作解释。第三是，在齐娜治疗期间，托洛茨基把齐娜写来的信寄给她的精神分析医生，他无疑是想帮助医生了解病人的思想，但是齐娜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极为伤感。齐娜在给父亲的最后一封信里流露出这种被遗弃的情感。1932年12月14日，她在信里写道：“亲爱的父亲，我渴望得到您的来信，哪怕只有几行字也好。”

对于托洛茨基来说，女儿去世这一个人的悲剧正好与欧洲面临的政治悲剧交织在一起。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当时德国正处在一种捉摸不定的局势中，两大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未受触动，而这时纳粹党已经取得了执政的权力。3月2日，在托洛茨基书房里我们每天进行的午后讨论中，他就有关德国形势告诫我们：“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这就像你必须攀登一座陡峭的山峰，你把它看成是一堵平滑的墙壁，当你站在它面前时，你觉得自己不

可能爬上去。但是如果你能利用每一条裂缝，每一个自然台阶，每一个洞穴，使你的手得以抓紧，脚能够踏稳，这样你就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登上山巅。为此，你不仅要勇气，而且还要有长远和敏锐的眼光。”可是这个工人阶级组织却一无所成，而希特勒则日益猖獗。2月27日，纳粹党自己制造了国会大厦纵火案，希特勒就以此为借口取缔了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3月5日，希特勒建立了他的极权主义政权。

托洛茨基迅速作出了反应。3月14日，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德国无产阶级的悲剧》，副题是“德国工人将重新崛起，决不要斯大林主义”！在此之前，托洛茨基的政策一直是改造正式的共产党组织，因此托派集团的日常活动也完全是为了使广大共产党员接受他们的观点。托洛茨基反对派把自己看成是第三国际的一员，即使被正式开除以后也仍是如此。当时一些地方和托派组织有联系的个人或集团曾主张建立新的国际，但是托洛茨基一口拒绝了 this 主意。由此可见，放弃改造政策意味着同过去一刀两断，这个方针的转变经历了好几个阶段。

早在3月2日的谈话中，托洛茨基对我们说：“我敢肯定，如果希特勒在德国继续执政，共产党被瓦解，那么就必须创造一个新党，但是新党的大多数骨干还得从老党中去吸收。”但是这个意见仍然是同假设的形势有关。3月5日的大灾难发生以后，托洛茨基在3月14日的文章中抛弃了改造德国共产党这个过时的方针，可仍坚持对共产党国际的其他共党，尤其是对俄国党进行改造的方针。但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整体的共产国际的问题迟早是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它声称德国共产党所执行的不与社会党人合作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直到希特勒发动政

变的那一时刻。执委会按照斯大林命令支持着斯大林，在各国共产党的队伍中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孤立的反响，但作为一个组织，共产党国际却处在斯大林的控制之下。因此改造的方针是完全不现实的。

就在托洛茨基逐步放弃改造方针的过程中，俄国党提出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共产国际的4月决议发表以后，托洛茨基在普林吉坡曾对我们说：“自4月份以来，我们主张在各国党内进行改革，而在德国则成立一个新党。现在我们可以采取一个对称的立场，就是说，我们主张除了苏联以外，每一个国家都建立一个新党。而对苏联，我们主张改造布尔什维克党。”这个主张从未在文章中出现过，是否给廖瓦的信中谈到过，我也不能肯定。但无论如何，这个主张很快被抛弃了。1933年7月15日，托洛茨基以格·古罗夫的笔名写了一篇文章发给各地托派组织。该文的标题是《必须建立新的共产党和新的共产国际》。在文章中，对所有受斯大林操纵的共产党实行改造的政策被抛弃了。作者解释道，这种改良政策现已成了“乌托邦的和反动的政策”。

政策上的转折与居住地的迁移恰成巧合。7月17日托洛茨基离开了土耳其去法国定居。当他于7月24日踏上法兰西国土的时候，7月份文章的译文几乎还没有到达各地托派团体领导人的手里。直到托洛茨基在法国生活的开头个几星期里，这个新方针才掀起了热烈的讨论。

也是在1933年春天，同俄国的通讯联系已完全中断。1927年末至1928年初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相继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起初，他们相互之间还可以较为自由地进行通讯联系。因为，他们在政府中曾占据过重要的位置，担任过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职务，所以他们在西伯利亚流放地之间的来

往信件包含了当时有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丰富资料。某些信件实际上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小论文。1928年下半年，虽然检查制度越来越严格，但流放者仍能彼此联系，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是寄明信片或发电报。正如娜塔丽娅后来告诉我说，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时，仍能与留在莫斯科的反对派保持通信联系。当一个窗口出现花盆时，这说明从莫斯科来的地下交通员已经到达。当时由廖瓦负责与这些人接头。

1929年到土耳其之后，托洛茨基仍能通过邮局同大约20名西伯利亚流放者保持联系。他们不是直接写信到普林吉坡，而是寄到法国或德国的某地。通常，他们仅仅寄来一张明信片，只谈些私事。随着岁月的流逝，通信也日趋减少。但在1932年，消息还是走漏了。就是拉柯夫斯基照片被带出俄国的那一次。廖瓦还是负责这方面的全部联系工作。先是在普林吉坡岛，后来在柏林。有时还汇点钱给某个流放者。那时同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私人通信已经中断了，唯一例外的是齐娜的生母，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勃朗施坦，她当时住在列宁格勒，还同齐娜保持着通信联系。齐娜死后，托洛茨基曾收到她生母的一封信，并回了信。他亲笔写了信并封了口交给我，在信封上亲自用漂亮的字体书写了通讯地址。他要我寄挂号信，并要求邮局把回条寄来，可是回条从未收到。1933年开头几个月里，同俄国的联系彻底中断了。直到几年以后，才从俄国来的逃犯，塔罗夫、西里加、维克托·谢尔盖、雷斯和克里维茨基那里直接得到一些消息。但即使在通信中断以后，托洛茨基同流放在西伯利亚的反对派成员的关系也还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1933年5月，我们从报上得知马克西姆·高尔基将乘坐苏联“让·饶勒斯”号轮船从意大利返回苏联。该船将途经伊

斯坦布尔。托洛茨基对皮埃尔·弗朗克和我说，为了打听有关在西伯利亚流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情况，不妨去见见高尔基。根据报上所说的日期，我们找到了停泊在伊斯坦布尔码头上的那艘“让·饶勒斯”号。一登上船，立刻有人询问我们是谁，来干什么？“我们是法国共产党党员，想要拜见高尔基。”于是，有四五个身强力壮的大汉立刻围了上来。不多一会儿，高尔基的养子彼什科夫来了，我们向他说明了自己的确切身分。他看上去对我们没有敌意。他告诉我们，他的养父由于身体欠佳不能接见我们，并问我们有什么需要他代劳的事情。我们对他说，最近得到了从俄国传来的有关拉柯夫斯基的那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在谈话中，始终有一两个可疑分子在那里侧耳聆听。彼什科夫答应把我们的话向高尔基转告。于是我们离开了轮船，可后来就杳无音讯了。

1933年上半年，托洛茨基的外貌发生了很大变化。自从齐娜死后在他脸上刻下的两道皱纹，随着岁月的流逝显得更深了。当我在上一年（1932）10月到达普林吉坡时，托洛茨基的头发已开始变白，虽然黑发仍处处可见。他的脸部和头部跟1924年或1925年所照的像片简直是毫无差别。但在1933年上半年，他不仅头发变白，发型也从向后梳理改为朝向一边。短短的几个月内，甚至是几个星期内，他的形象就变成了另一种模样，并一直保持到他的去世。熟悉托洛茨基的人常常会注意到他对穿着很讲究。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穿了一套挺括的白色西服。但到了1933年春天，他对自己的衣着就逐渐不那么留意了。

季节同托洛茨基的压抑心情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由于从黑海方向刮来的寒风，二月的气候非常寒冷。屋子里没有取暖装置，只有火盆。由于刮风，一连好几天都不能去打鱼。

一天下午，由于已有一个多星期不能出海捕鱼，感到无聊，娜塔丽娅、弗朗克和我就闲谈了起来。考虑到托洛茨基好长时间没有进行体力活动，我们有点担心，所以他们叫我去问他是否愿意到附近一个无人居住的小岛上去打野兔。我敲了敲他的书房门，他答应了一声：“进来！”我向他陈述了这个计划。“什么？打野兔！”他面带愠色地说。很显然，他对这种事已毫无兴趣了。

早晨长时间出海打鱼的这项活动也渐渐地被取消了。现在我们只是在下午四点半他休息以后才出去走走，而且也不走远，通常只在看得见住所的范围内走动。有几次，我们试图捞几条鱼，要是没有什么收获，托洛茨基就耸耸肩说：“这里没有鱼！”于是我们就打道回府。

有一次下午出海打鱼，我们险些送了命。事情发生在5月间，托洛茨基、哈拉兰波斯和我在4点半左右离开家门，我们不打算走远，所以连一个土耳其警察也没带。这是不寻常的做法，但这倒可能救了我们的性命。天空灰蒙蒙的，由于没有风，哈拉兰波斯才同意到海上去逛逛。

虽然不再限制在住所视野的范围内，但我们并没有走远，只是在普林吉坡岛和哈尔基岛之间游荡。当时刮的是北风，几分钟后，海上突然起了风浪。哈拉兰波斯立刻看出了危险，马上关上马达。他要我们躺在船仓底部，以便平衡船的重心，然后他开始用单桨划船。这时，托洛茨基和我就躺在被水淹没一半的船舱里。随着海浪的起伏，船上下颠簸，发出砰砰的巨响。哈拉兰波斯则一手操桨，一手排水。就这样折腾了大约半个小时。小船随风飘泊，靠着哈拉兰波斯的掌舵，船渐渐地飘到了小岛的南端。这儿海面比较平静，船就靠了岸。我们升起篝火烤干了衣服，然后托洛茨基和我步行回家。哈拉兰

波斯则留下来看船并等候着天好。与此同时，娜塔丽娅在屋里也看到了这个危险，于是，她同弗朗克一起驾着马车来找我们。但是普林吉坡岛的西部，通向海边的路蜿蜒曲折，并在一片松树林中穿行，所以弗朗克和娜塔丽娅没能看到我们。

在纳维尔和罗森塔尔的个人回忆录中都提到，托洛茨基在1929年和1930年谈话中常用“枪毙”这个词。我到普林吉坡岛以后，也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样的话，当他谈到那些使他气愤的对手时就说：“你要知道，这些人应该枪毙。”1932年春天以后，这个词从他的词汇表中消失了，他不再允许自己作这种诅咒了。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的财政困难更为加剧。希特勒上台以后，来自德国的版税费中断了。从美国的版税中获得的钱及其每年的利息存放在纽约的一家银行里，成了我们收入中最可观的一部分，但由于1933年4月罗斯福宣布美元贬值，使我们蒙受了很大的损失。1932年，托洛茨基从哥本哈根回来后，也没有写什么长篇巨著。他当时想写一部关于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专著，然后打算写一部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关系的书，题目拟作《伟大友谊的罗曼史》，并准备写红军史以及一系列苏联外交官的人物传记，如拉柯夫斯基、越飞、沃罗夫斯基和克拉辛，但这些课题还仅仅是计划。没有出版社来约稿签合同，也没有任何版税收入。同时，世界各地的报社也很少来约稿，一则因为托洛茨基的注意力转向新的国际，二则因为报社杂志编辑们发现他们的资金已经缩减。1933年4月27日，我写信告诉廖瓦，我们的全部资金只有1780美元，并且在近期看来也不会有任何收入。娜塔丽娅和我仔细检查了帐目，想方设法尽量减少开支。这时有个叫萨拉·雅各布美国人愿意到普林吉坡岛来担任义务打字员。她既懂

俄语，又是美国托派组织的成员。这个提议立刻被接受了，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下玛丽雅·伊利尼什娜的薪水。萨拉是6月份来的。6月18日，玛丽雅·伊利尼什娜就歇手回家了。

从哥本哈根回来后，岛上的人员来往频繁。扬·弗兰克尔1月份离去。阿恩·斯沃贝克则于2月份到达，在此住了几个星期。4月10日，奥托·许斯勒动身去布拉格，打算去那里为侨民出版一份新的托派德文报纸《我们的言论》。他在岛上担任的德文秘书由鲁道夫·克勒门特接替。鲁道夫是汉堡的一个青年大学生，4月27日到达的。美国托派组织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斯·沙赫曼于5月23日到达，7月份我们打算去法国时，他就随我们一起离开了土耳其。皮埃尔·弗朗克于6月22日离开普林吉坡岛返回巴黎。埃尔温·阿克尔克内希特这位当时德国托派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于7月7日来岛，不过他逗留的时间缩短了，因为我们在几天后就要去法国。当时每隔两三个月就会有客人来访，这对于我们大家来讲也算是一种调剂吧。

1933年疟疾在普林吉坡还很流行。我们屋里所有的人都在服用奎宁。这个药使我们的耳朵有点聋。尽管服了奎宁，但是到了5月份，我发高烧的次数越来越多，后来就不得不考虑住进伊斯坦布尔的一家法国医院。医院的主治医师加辛教授是个法国人。1929年托洛茨基在苏联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居住的几个星期中，格伯乌的头子明仁斯基在使馆向托洛茨基提供了几个大国派驻土耳其秘密特工人员的情报。他还特别告诉过托洛茨基，加辛医师是法国谍报机关在这一地区的负责人之一。我相信，托洛茨基或者还有寓所中别的什么人后来都曾请这位大夫看过病。5月25日，我被送进医院，由于发高烧，我只能躺在床上。托洛茨基来病房探病时对我谈起

了加辛医师的情况，然后说：“哦！这家医院不错。它简直像监狱一样舒适，在这里人们可以安静地读书。”我在医院里呆了10天。

6月初，法国作家乔治·西蒙农途经伊斯坦布尔，他致函托洛茨基要求能接见他，他要为《巴黎晚报》进行一次采访。托洛茨基于6月6日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篇谈话后来在报上发表了。其中托洛茨基最重要的论断是，“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德国的纳粹主义正在把欧洲引入无可否认的战争危险之中。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可能会看错，但是我觉得，人们对危险的程度远没有充分地认识。如果我们不是看几个月而是看几年，当然肯定不需要看几十年，那么我认为法西斯德国发动战争将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确实是一个决定欧洲命运的大问题。”这些话今天听来也许并不新鲜，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正确。但是如果回顾一下当时那些政治家和新闻界人士所说的话，他们对这位元首还抱有如此多的幻想，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上述预言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谈话中，西蒙农问托洛茨基，万一俄国发生危险，您是否愿意重返故土“为国效劳”，托洛茨基肯定地点了点头。西蒙农向托洛茨基赠送了一部他创作的描写非洲的小说。托洛茨基读了小说之后，对它作了高度的评价，他对我们说这部小说中关于对黑人被剥削的描写刻划得十分真实。

达拉第政府组成以后，莫里斯·帕里雅宁就着手发起一场要求政府批准托洛茨基定居法国的运动。他接触了许多议员和政界人士，以其热情和才能为实现该计划而竭尽全力。托洛茨基对他的行动表示赞成，甚至应帕里雅宁的要求，也曾给他写过几封信，虽然托洛茨基对此并不抱很大希望，他仍受到法国政府于1916年对他发布的驱逐令的限制。虽然从那

时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许多行政法令仍然有效。7月4日,帕里雅宁写信告诉托洛茨基,那个驱逐令已被撤销。这一消息在岛上引起了人们的惊奇。7月12日,我到伊斯坦布尔的法国领事馆为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的护照办理签证,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我们领到了签证,并且签证上没有规定明确的期限。

现在我们必须筹备搬家了,这回出门就不是上次托洛茨基去哥本哈根那样去了还得回来。档案材料和书籍都得装入大木箱里带走。7月15日,扬·弗兰克尔从巴黎赶来,他打算在我们启程离开后留下来同房东谈判处理住房问题以及出售船只和其他一些财物。7月17日,托洛茨基、娜塔丽娅、马克斯·沙赫曼、萨拉·雅各布、鲁道夫·克勒门特和我一起乘坐意大利的“保加利亚”号轮船,前往马赛。一条驳船停靠在寓所后院的码头边,装载着木板箱直接运往轮船,最后驶来了一艘汽艇,把我们送到船上,直到午后,船才启程。黄昏时,我们已航行在马尔马拉海上了。托洛茨基站在甲板上眺望着伊斯坦布尔城,直到它消失在地平线上。

第二章

侨居法国

轮船在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停靠，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没有上岸。抵达意大利卡塔尼亚时，娜塔丽娅跟我上了岸，大概到了那不勒斯后我们又上岸了。可是托洛茨基却一次也没有离开过船舱，因为他的腰关节患有风湿症，此时正值发作。所以整个旅途中，他是在船舱里度过的，而且大部分时间都躺着。在船上他写了一篇短文，评论伊格纳齐奥·西洛内的一本著作《丰塔玛拉》，文章所著的日期是“1933年7月19日于保加利亚号客轮”。这多少带一点讽刺的味道，因为该书攻击的是法西斯主义，而我们乘坐的正好是一艘意大利客轮。

7月24日早晨，轮船驶近法国马赛时，船长告诉我们，他接到当局的电报指示，船必须在马赛港附近停泊以等待汽艇的到来。起先我们以为都得乘坐汽艇，于是各自都作了下船准备。不多一会儿，就看见汽艇，它迅速地驶近船边。廖瓦敏捷地登上轮船，他给了我一封信，其内容是指示我下一步如何行动。然后他迅速地把他的父母亲接上汽艇，他们随身只带了几个手提包，汽艇随即驶向远方。我们的船也重新起锚向马赛港进发。由于事情干得过于匆忙，以致枪枝还留在我们的身边，这给海关检查时带来了麻烦，因为我们是作为普通旅客

登岸的。

廖瓦的指示是要我带着提箱在马赛乘火车到里昂。到了里昂以后，在确信没有记者跟踪的情况下设法于第三天上午赶到大西洋海岸的圣特车站同廖瓦会晤。其余的人则带着大批行李乘火车前往巴黎。这一切安排都是为了甩掉记者的纠缠，并且尽可能摆脱格伯乌的跟踪。我按预定计划，于7月26日早晨在圣特车站见到了廖瓦，随即一起到了托洛茨基下塌的一座别墅。这座别墅地处鲁瓦扬北面约8英里的圣帕莱小镇附近。它建在岩石层叠、地势陡峭的海岸边，取名为“海浪别墅”。住宅外面是一个很大的花园，周围没有左邻右舍。这住所是雷蒙·莫利尼尔发现的，他很善于选择。当时适逢夏天，海滨地区到处是度假的旅游者，在那段时间里，不会有人注意这座别墅的居住者，即使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些特殊，估计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目。

我听说从马赛到圣帕莱旅途中发生过一个小插曲。汽艇在卡西斯靠岸，当地保安当局的一位官员在托洛茨基的护照上签字，以示准予他在法国居住，所受的限制同其他侨民完全一样。一行人从卡西斯出发乘汽车途经蒙彼利埃、阿尔比和蒙托榜等地。在阿基坦的一个小镇托南斯过了一夜，于7月25日中午到达圣帕莱。当他们快到目的地时，只见住所附近正燃起熊熊大火，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由于周围有消防员和一大群围观者，所以他们担心托洛茨基让别人认出来，但总算太平无事。托洛茨基一直坐在汽车里，用提包遮住了脸的下半部分，像是患了感冒，就这样一直到可以开车进宅子为止。总的来说，这次旅行还算顺利。唯一的麻烦是托洛茨基的身体欠佳，腰关节风湿痛持续不断，汽车行驶中的每次颠簸都给他带来痛苦。

与此同时，报上出现了一条消息，说托洛基已到了克莱蒙费朗附近的一个小疗养地罗瓦。此地距鲁瓦扬约200英里。他始终弄不清楚这个假情况是怎么炮制出来的，是否是由于某人的姓名被搞错了一个字母而造成泄漏，或者是法国警方故意把一个相似的名字披露给某个亲近的记者？虽然，我们在圣帕莱逗留期间有很多人来访，但是“海浪别墅”的秘密并未走漏。

我们到达住地以后不久，我就去拉罗舍尔拜访了省长，他已经得到关于托洛茨基来到该省的内部通报。托洛茨基旅居法国的具体安排是由保安总局的高级官员和亨利·莫利尼尔在巴黎商定的。我把我们确切的住址告诉了这位省长，他就向我保证，这个住址，除他以外，在省里决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会谈中，他似乎没有打什么官腔。他还告诉我，他早年在蒙彼利埃就结识了拉柯夫斯基，当时他们是同学。

我还去拜访了房东，他的住所离这儿只有几英里。他是个古董收藏家，不厌其烦地告诉我关于亨利四世壁炉的掌故，我只好耐着性子听他说。我们住在他的别墅期间，他一次也没来过，也根本不打听谁住在这幢房子里，大概直到很久以后才知道托洛茨基曾是他的房客。

8月3日，鲁道夫·克勒门特从巴黎来到这里，重又担当了德文秘书工作。萨拉·雅各布，这位俄文打字员不久也来了。打字机的声音又开始在屋子里敲响。陌生人是不让进入这所屋子的。让娜·马丹和薇拉·拉尼斯负责膳食和管理家务。这位生于比萨拉比亚会讲俄语的薇拉这时已成了雷蒙·莫利尼尔的妻子。从巴黎来的一些青年托洛茨基主义者，则协助我们一起担任警卫。如同在普林吉坡岛时一样，派专人通宵值班，在四周巡逻警戒。

在圣帕莱期间，托洛茨基只在下午进晚餐以前这段时间

走出别墅，坐上轿车到野外作短暂的漫游，欣赏着满是葡萄园的乡间景色。雷蒙·莫利尼尔从巴黎弄来了两条德国狗，一公一母；一条叫本诺，一条叫丝苔拉。托洛茨基常常逗它们玩耍，比如把手杖扔到远处，然后让它们把手杖衔回来。

8月初，可能是在8月7日前后，雷蒙陪同安德烈·马尔罗从巴黎驾车来访。两人到达寓所时已是黄昏时分。马尔罗与托洛茨基见面后就在圣帕莱的一家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又来到别墅同托洛茨基在书房里进行了长谈。马尔罗后来在报上发表了这次会谈的纪要，交谈涉及到革命后俄国的艺术发展，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差异，1920年红军在波兰失败的原因，日本与俄国在未来战争中的战略等问题。有时他们在院子里交谈，这时全屋子的人都可以参加他们的谈话。去年春天在普林吉坡岛时，托洛茨基曾读过塞利纳的小说《长夜漫漫的旅程》并且写了一篇书评。这次他们也谈到了塞利纳，当时托洛茨基站在屋前的台阶上，马尔罗站在下面的石级上。马尔罗对塞利纳很熟悉，他维妙维肖地模仿着塞利纳说话时的姿势和腔调，让人捧腹。

在我的印象中，马尔罗从未同我们一起聚餐过。每当黄昏时分，托洛茨基和马尔罗在分手前总要在我的陪同下到外面去散步。有一回，我们登上岸边的一块岩石，眺望大海。此时夕阳西下，在朦胧的暮色里，马尔罗的那种神经质的急切的动作显得格外突出，而托洛茨基则始终保持着那种刻板、矜持、说教的姿态。海水撞击着他们脚下的礁石。他们最后谈到的话题是死亡。马尔罗主要是说，“有一件事是共产主义永远无法战胜的，那就是死亡。”托洛茨基回答说：“当一个人完成了他为之献身的事业，当他做了他想做的事，那么死亡对他来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马尔罗离开后，就我记忆所及，托洛茨基似乎再也没有提起过他。在那段时间里，我们都忙于政治斗争和组织工作。托洛茨基修正了他的行动方向，决定建立新的国际。这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是个方向性的转变。我们来到圣帕莱不久，1月27日，这里的全体人员开会讨论了这一新目标，托洛茨基在会上所谈的一些观点使大家看清了当前的政治形势。他说：“这里有一个连带的次要问题那就是新国际的名称，是否叫第四国际呢？这个名称看来并不十分令人满意。以前我们同第二国际决裂时，我们就改变了我们的理论基础。现在我们也不再以共产国际初期召开的四次代表大会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宣称，我们是属于共产国际的，并且自称是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对此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第四国际的名称比较简洁，这也许有利于对广大群众的吸引。但从另一方面考虑，用现有的名称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也许对于逐步选择干部是有好处的。”这些话表达了他从改良政策向建立新国际的转变过程中最后的犹豫，但是他的犹豫没有持续多久。虽然这个新组织并未打算吸引“广大群众”，他所关心的还是“逐步选择干部”，但他不久却采纳了第四国际的名称。

这个新方针很快被世界各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接受了。改良政策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可是除了承认这个现实以外，还突然冒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同一些独立团体建立何种关系。希特勒的上台执政，两大工人阶级政党的瘫痪，德国斯大林主义者的幼稚无能，这一切使一部分人产生动摇。在西欧，那些长期独立于两个国际之外的，或者不久前才与之脱离关系的社会党和共产党组织正在寻找新的出路。英国的独立工党、荷兰的斯内夫利特领导的党和德卡特领导的

党、德国侨民组织的工人社会党(S.A.P.)以及其他一些组织都想听听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观点。现在托洛茨基本人并非在千里之外的普林吉坡岛,而就在法国,他可以而且也愿意向这些团体的领导人会面和交谈。因此,这些人就纷纷来到巴黎,雷蒙·莫利尼尔则从巴黎用车子三三两两地把他们接送到圣帕莱,或者由廖瓦在巴黎给他们作好秘密旅行的安排,由我到圣特车站去迎接他们。

托洛茨基同斯内夫利特会见感到特别亲切。他们是在莫斯科相识的,1932年11月,他俩在哥本哈根再次会面,他们用德语交谈,以单数第二人称的“你”来称呼对方,以示亲昵,在德文、俄文、法文中都有这种用法,托洛茨基对非俄罗斯人,一般是不这样称呼的,即使对俄国同胞,我只知道,他同拉柯夫斯基交谈时,才用这样的称呼。

托洛茨基侨居圣帕莱期间,他同雷蒙·莫利尼尔的关系出现了最初的缝隙,原先他对雷蒙是非常信赖的,1933年8月,托洛茨基同各方人士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政治讨论和谈判。在这期间,托洛茨基有机会得以进一步了解莫利尼尔处理事情的方式方法,在这里他可以比普林吉坡时看得更清楚。在8月下旬,几乎每天下午快结束工作时,托洛茨基就向我口述一些通知,我记录以后,得连夜去鲁瓦扬,通过电话把通知全文向雷蒙转述,然后把这些便条及时销毁。当时法国托派团体内部正在进行派别斗争。以莫利尼尔为骨干的托派团体的领导班子受到了团体内一个“犹太帮”派别的反对。这一派的成员是由巴黎犹太区的毛皮工人及一些大学生组织的,1933年10月,法国的托派集团即将分裂,这个反对派将成立新的组织,叫做“统一共产党人联盟”,但是在8月份,事情尚未发展到这一步,莫利尼尔却对反对派失去了耐心,竭力想尽早地摊牌。托洛茨基

向莫利尼尔发出了指示。内容主要是强调要从政治思想方面加强斗争,驳斥反对派的论点,阐明双方的分歧所在,而不要急于采取导致分裂的组织措施。

在圣帕莱,托洛茨基通过与众多来访者的频繁接触,不会不察觉到雷蒙·莫利尼尔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已经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和怀疑。莫利尼尔兄弟俩:雷蒙和亨利都是“生意人”。他们按照低于面值的价格收购股票和金融债券,然后用种种巧妙的手法甚至采取威逼利诱、敲诈勒索的手段来赚取钱财,虽然还未达到违法的地步。他们的公司叫做“法兰西集资协会”。该公司的赚钱手段使自己在巴黎的商业界弄得声名狼藉。例如,1936年春天,当时我需要找到一份工作,所以根据报上的招聘广告前去应试,我所期待的那位雇主要了解我的履历,当然我不能把托洛茨基的名字说出去,于是我灵机一动回答说,我曾在雷蒙·莫利尼尔公司工作过。当他一听到这个名字时,立即面如土色,大喊一声:“滚出去!”当时莫利尼尔兄弟正是用种种不光彩的手法获得了不少钱,虽然他们还称不上百万富翁,但在大多数一贫如洗的托洛茨基主义战士们看来,他们的财力已是相当可观了。

9月间,娜塔丽娅离开圣帕莱前往巴黎,打算在那里小住几星期进行探亲访友。这是他们1927年离开莫斯科以来第一次夫妇离别。这时访问圣帕莱的热潮过去了,政治分界线也明朗了。事情越来越清楚:原先那种怀着惊奇的甚至怀着友好的感情前来联系的许多政治团体,现在都要同托洛茨基主义保持距离。英国独立工党和德国的工人社会党都无意成为托洛茨基运动的参与者。

在9月初的头几天里,托洛茨基同一位德国经济学家弗里茨·斯滕贝格作了长时间的交谈。托洛茨基希望能说服他

按照新国际的纲领撰写有关世界经济局势的那部分章节，但毫无结果，因为斯滕贝格游离了托洛茨基主义。顺便提一下，托洛茨基曾经期望与之合作写书的唯一对象仅是经济学家：在普林吉坡岛时他找过费尔德；在圣帕莱他找了斯滕贝格；在墨西哥他选中了奥托·吕勒。这种巧合也许正好暴露了托洛茨基对自己所掌握的经济学知识缺乏自信。

9月10日，一位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路易·索夫里尼翁从普瓦提埃前来拜访托洛茨基。他们谈话的话题很快转到了建立第四国际的新方针上。索夫里尼翁问托洛茨基：“总而言之您的这个新建议实质上就是一切从头开始，是吗？”托洛茨基回答说：“完全正确。”在谈话接近尾声时，双方都站了起来，这时索夫里尼翁直截了当地提了一个问题：“托洛茨基同志，您对斯大林有何看法？”这确实是来访者经常会提到的问题。托洛茨基从总体上作了回答：“他是一个具有非凡魄力的人。”

在圣帕莱，托洛茨基的健康状况开始好转，腰痛病很少发作。在8月开头3周内，他忙着接待客人，自我感觉良好，然而到了8月底，他发了一次高烧。他在一生中，这样的高烧发过好几次。医师们为了掩饰他们的无知，就用了一个古怪的医学名词“隐发性热病”来加以搪塞，在以后几个星期里，他的病时起时伏。

9月中旬，气候起了变化，烈日炎炎的夏天过去了，洋面上刮起了风浪。我们住的别墅真是名副其实的“海浪”别墅，海浪整天冲击着庭园边的断崖峭壁。托洛茨基身体感到不舒服时就整天躺在床上。每当我去给他送报纸时总见他脸色阴沉，头发蓬乱。但话又说回来，虽说有阴沉的日子，但也有心情开朗的日子，在那种时候他就写作或接待客人的来访。

托洛茨基在海浪别墅居住期间，大约接待了40多个客人，其中许多外国友人来探望他是为了同他讨论一些政治问题。在巴黎，亨利·莫利尼尔从未受到过来自保安总局对这些访问的指责。这说明如下夏朗德省省长向我保证的那样，确实没有警察监视这所别墅。对周围情况的监视由我们自己负责。我们曾注意到有一些白俄团体到这里来，后经了解，他们只是一些前来避暑的旅游者。法共鲁瓦扬地区有一位支部书记叫古比尔，此人在圣帕莱开了一家自行车商店。8月间我们得悉，他对于斯大林的法共领导集团持反对态度，于是我们就同他交往，请他到别墅来，这样他就成了这儿的常客。托洛茨基也很高兴同他交谈。

古比尔告诉我，在他们支部里有一名党员是出租汽车司机，名叫马塞尔·居罗多。他对托洛茨基派有几分同情，但不知道这种同情程度有多深，要是让他和托洛茨基会面，唯恐他在外面走漏秘密，所以我们就一直等到托洛茨基快离开圣帕莱的最后几天里才对他开放。10月初的一天，我乘坐居罗多驾驶的出租汽车，在车上问他是否想见见托洛茨基。当时这问话令他大吃一惊。当然这次访问很成功，托洛茨基也非常希望多接触一些法国工人。谈到最后，居罗多向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托洛茨基同志，您是怎么失去权力的？”“哦！您知道，居罗多同志，一个人失去权力可不同于一个人丢了钱包。”于是，他就滔滔不绝地谈起列宁逝世前后在俄国所发生的事情。（不过在这里，我想说说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也许在某种意义上失去权力和丢失钱包是一样的。当你确信钱包还在时，只要摸一下自己的口袋就能感觉得到；而当你失去了选票或在选举中失败，那就像钱包丢失了一样，它已不再存在，因而你也不可能重新把它抓住。而且就托洛茨基是否

“有过”权这一点,也始终是个谜。)

10月8日,在亨利和雷蒙的陪同下,娜塔丽娅从巴黎回到圣帕莱。由于托洛茨基需要休整一段时间,他们决定搞一次休假旅行。10月9日上午11点,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由亨利·莫利尼尔及让·迈希勒陪同乘车离开了圣帕莱。为了尽量不惹人注目,托洛茨基刮掉了山羊胡子。他们经过波尔多和蒙德马松,到了上比利牛斯省的巴尼埃尔德比戈尔,在一家旅馆住了下来。海浪别墅的其余人也去了巴黎。圣帕莱的叙述到此将告一段落。

以巴尼埃尔德比戈尔为基地,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断续到各地作短期旅行。这期间,他们顺道访问了卢尔德^①,托洛茨基后来在日记里(1935年4月29日)写下了这次访问的印象:“那是一家专售神迹的商号,一家以神的恩典为交易的营业所……人类的思想的确陷进茅坑里去了。”亨利·莫利尼尔不久就离开了旅行行列返回巴黎,为托洛茨基准备新的住所。我记得,让娜·马丹曾陪着这对休假者玩了几天。在这3个星期的假期里,据我所知,托洛茨基没有写过一行字,只是翻翻报纸。

1933年10月31日下午5点,这批旅游者从巴尼埃尔德比戈尔登上公共汽车前往塔布,晚上11点又从塔布坐火车去奥尔良。翌日上午,雷蒙·莫利尼尔驾着汽车在奥尔良车站迎接他们。迈希勒返回巴黎,雷蒙则把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送到巴比仲。同日,也就是11月1日,我和亨利·莫利尼尔也从巴黎来到巴比仲。

巴比仲离开巴黎要比圣帕莱近得多。虽然,法国政府发给托洛茨基的签证上并没有作出明确的限制,但是他居住的

^① 在法国南部边境的一个城市。——译者

地点必须报当局批准。我想法国当局是不会允许他住在巴黎的，原因是怕他过多地参与日常的政治活动。基于在圣帕莱逗留期间情况良好，亨利·莫利尼尔大着胆子向法国当局要求他居住在离开巴黎 30 英里的巴比仲。这个要求被接受了。看来，巴比仲是个合理的妥协，它既不是巴黎，离开巴黎又不远。

当时，巴比仲还是塞纳—马恩省的一个很小的市镇，处于枫丹白露森林的边缘。虽然画家们使这个小镇闻名于世，但它仍然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亨利·莫利尼尔在通往森林的乡间小道旁租了一幢别墅。这房子取名为凯尔·莫尼克，只有上下两层，托洛茨基的卧室和书房都在二楼，房间很小，楼梯和走廊很狭窄。我们感到很不舒服，完全不像在普林吉坡和圣帕莱的住所那样宽敞舒适。花园也不大。这座别墅不比乡间的农舍大多少，但是它地处偏僻，故而十分安静。1973年，我重游故地，发现森林旁边的大道依旧存在，只是那座别墅已被拆除了，那里辟了一条小路，通往一所比较宽敞的住宅。

几天后，我们在巴比仲安了家，除了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以外，这幢屋子的常住客还有鲁道夫·克勒门特、萨拉·雅各布、我的伴侣加布里埃尔·布劳什和我。廖瓦、让娜和亨利经常驾车来此探望。意大利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布拉斯科的妻子，被大伙称作布拉斯科大嫂，每星期一次来帮助佳比^①和娜塔丽娅干一点家务活。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人进过这幢屋子。即使在巴黎，除了少数例外，一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不知道托洛茨基的这个住处。

巴比仲地方当局包括镇长在内都不知道托洛茨基住在镇里。当局并未指示警察时时监视这座别墅。就我们自己来说，

① 即作者的妻子加布里埃尔·布劳什。——译者

我们也不可能在晚间值班，因为这里总共只有两个年轻力壮的男人。鲁道夫和我正担负着别的任务，要在晚上值勤，体力上是吃不消的。我们只好寄希望于改名换姓，并用两条狗看家，同时在房间的安排上作些考虑，我就睡在靠近大门的那个房间里。

1933年春，托洛茨基为写作的题材而踌躇不定。在圣帕莱，他一直在思考着写一部关于红军的著作，到了8月底，他把这个选题写信告诉给美国的一位出版商，但是几天以后，一位英国出版商建议他写一部关于列宁的专著，几经犹豫以后，终于采纳了英国人的建议。

在巴比仲定居以后，托洛茨基就立即按这个计划着手写作。廖瓦从巴黎给他弄来一批书，尤其是俄文书。我相信是鲍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帮助廖瓦找到这些书的。托洛茨基阅读时总喜欢在一些书页的空白处用铅笔做上各种记号，然后把它们拿到巴黎去打字，再送回巴比仲。这些文稿、剪报以及各式各样的文件就被分档安放在卷宗里。那年冬天，工作进展很顺利，完成了部分章节。

初来时，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每天下午总要到别墅前面的枫丹白露树林里去散步，但随着冬季的来临，树林里就不再那么使人感到心旷神怡了。所以在冬天下午，托洛茨基和我就到巴比仲的街上踟蹰。小镇上的居民常常在各自的窗口瞧着我们这些过路人。他们压根儿也想不到这个步履矫健的中年人竟然是托洛茨基。“吃饭穿衣、梳妆打扮，这一切都是人们不得不天天重复的无聊事情。”有一天当我们在巴比仲街上散步时，他向我发了这样的牢骚。另一次，他对我说：“政治学是展望未来的科学，这就是为什么法国人把政治学叫做测量科学的道理。不过，对他们来说，这种测量是一种小范围的

测量。”

有一次散步时他还跟我谈到了他的自传。当时有一个法国出版商雷德尔正打算替他另外出一部自传，大约是原书的三分之一的删节本。于是托洛茨基重读了他的这部著作，并且在书页的空白处用铅笔做着记号，以便编辑成一部删节本。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是决不会去重读自己作品的。在一次散步时的交谈中，他批评了这部著作：“这部书写得很糟糕。有许多该写的事情没写，而不该写的却写上了。”

托洛茨基常常抱怨印刷上的差错，托派组织的一些出版物，通常是在困难条件下印刷的，所以差错屡见不鲜。托洛茨基在与友人的通信中常常责骂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在谈话中也常会扯到这个话题上去。而他自己却从不校对自已用俄文写成的文稿，这些杂务事全由廖瓦料理。结果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人们发现，托洛茨基原先在《俄国革命史》文稿上用铅笔写的对俄文打字员的指示，竟然也一并印到书里去了。在巴比仲散步时托洛茨基对我说起过的这次纰漏，可以看出他对这件事是十分恼火的。尽管如此，在他全部著作中，他还是把《俄国革命史》列为自己最得意的杰作，除了这些印刷错误以外，他对该书没有作过任何批评。

贝诺和丝苔拉被安置在花园中的两个狗棚里，由托洛茨基亲自照看，亲自给它们喂食。有一天晚上，贝诺无缘无故地狂吠起来，我出去想制止它，但毫无效果。有几家邻居打来了电话，对这种噪声干扰提出了抗议，并威胁说，如不想办法排除就去报告警察。情况变得非常棘手。此时已过半夜，托洛茨基突然走出自己的卧室，手持皮带，奔向贝诺，他一边训斥，一边抽打，这条狗就躺进了自己的窝，托洛茨基继续用皮带抽打狗屋，一边用俄语斥骂贝诺，嚎叫终于止住了。

不久我们就经常去巴黎，一般是在每月的第二或第三个星期六，有时每星期都去。起先，逢到要外出的星期六，廖瓦和亨利·莫利尼尔一早就驾着小车到巴比仲接送托洛茨基。但不久就采取了一个简便的办法，托洛茨基和我一起步行到枫丹白露的公路边，在那里直接乘公共汽车去巴黎。在车上，托洛茨基用手帕捂住鼻子和嘴，装作感冒的样子，这是为了遮住山羊胡子，这胡子是他从比利牛斯省回来以后又留起来的。过了一段时间，鲁道夫·克勒门特和我轮流陪同托洛茨基。在巴黎，有几位朋友腾出五六间卧室供廖瓦支配使用，他们常常交替地使用这些卧室。托洛茨基在那里接见的人们大多是托派组织的领导人。有法国的，也有其他国家的，他们或是住在巴黎，或是从外地专程来访。有一段时间，托洛茨基甚至经常参加国际书记处召开的会议。他会见了德国和奥地利的政治避难者，其中有维利·施拉姆。他同鲁特·费舍和马斯洛夫无论在私交方面还是在政治上都恢复了关系。他还会见了西蒙娜·韦伊，他们两人就苏联的国家性质问题曾经有过一番热烈的讨论。

托洛茨基在同友人谈话结束时，一般都已接近黄昏了。他在返回巴比仲以前，有时候喜欢到巴黎市区逛逛马路。他在圣米夏莱大街散步时，廖瓦在他的右侧，我在左侧，他仍用手帕捂住自己的山羊胡子。每次走过书店，他总要停步浏览一下橱窗里展出的样书。

1933年11月7日，廖瓦和让娜到巴比仲来吃午饭。桌上放了一瓶法国葡萄酒。此时，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坐在这个乡间别墅陈设简陋的小餐厅里，跟自己的儿子重新团聚在一起，已经不像在土耳其那样孤独了。他们在这里不知不觉地度过了流亡期间比较轻松的日子。

1934年1月底,萨拉·雅各布突然决定返回纽约与丈夫欢聚。在还未找到接替人之前,她就走了。到2月20日,她的工作已中断了3个星期,托洛茨基只好用德文给廖瓦写信:“我的工作计划完完全全被打乱了。”

1934年2月6日,右派集团在协和广场挑起了一场反对达拉第政府的骚乱。之后,左派在2月12日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示威游行予以回击。法国的政治力量出现了两极化的趋势。在巴黎的托派团体也想有所作为,已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宣传活动,看来可以采取新的行动了。现在需要团结各方面的力量,于是决定让我到巴黎去搞组织工作。每周回巴比仲一两次,以处理一些法文信件。佳比跟我一起去巴黎。她在巴比仲的工作由奥托·许斯勒的妻子特鲁德承担。马克斯·加文斯基,他是波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虽说对俄文并不精通,有时也去巴比仲担任几天俄文打字员的工作。这样的安排总的来说托洛茨基是不称心的,好在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多久。

托洛茨基还有另一面,那就是教条的、书生气的一面,或者可以说是保守的一面。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任何创新总是侧目而视的。他对于这种创新有一种说法,叫做“修剪马克思的胡子”。1933年2月在普林吉坡岛时,他要求皮埃尔·弗朗克和我把共产国际前4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要和决议全部搜集起来。他的计划是要原封不动地运用它们,使它们成为托洛茨基主义国际组织的一种宪章。这些文件一旦收集起来后,问题就明显了,这些文件所论述的除基本的政治观点以外,大部分都是些局部的、过时的问題,以致这些文件不可能原封不动地适用于制定一个新纲领。于是这个计划只得放弃。1934年3月13日,托洛茨基完成了一篇论述军事问題和未来战争问題的论文,文中写道:“尽管运输工具和一些军

事装备都实现了摩托化，但是对骑兵的需求仍然是不可改变的：如同拿破仑时代一样，3个士兵必须配备1匹战马。”正在托洛茨基写这篇论文的时候，一位法国少校就作出了在未来战争中坦克将扮演重要角色的预言。

虽然，保安总局没有把托洛茨基住在巴比仲的情况通报给地方当局。但是由于住在凯尔·莫尼克别墅里的这个家，与众不同、行动诡秘，以致遭来流言蜚语，终于在1934年1月引起了当地宪兵队的关注。后来我才知道，巴比仲的一些居民竟然猜疑这座别墅里住着一帮子伪币制造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订购牛奶的数量超过了一般法国家庭的平均水平。他们以为这是由于那些地下印刷者需要服用大量牛奶以便溶解吸入体内的铅毒。于是在这小镇里，那些散布流言蜚语的人就忙乎开了。虽然宪兵们并未发现这户人家犯有任何不轨的行为，但是他们仍想知道这些人究竟是何许人，究竟在干些什么？

1934年4月12日晚上11点，鲁道夫·克勒门特驾着摩托车返回巴比仲。那天他在巴黎呆了一整天，到廖瓦家里把寄到那里的邮件进行整理，并把它们带到巴比仲。两个宪兵借口他的车灯不亮，就叫他停车，让他出示摩托车的驾驶执照。可是执照上不是他的名字，大概是我的名字。于是就断定他驾驶的摩托车是偷来的。再加上克勒门特随身带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和许多外国报纸，又不能说明自己的身分和自己的去处，而且他说的法国话又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这一切都足以引起对他的怀疑，结果宪兵把他逮捕了。

4月13日，默伦地方检查官和塞纳—马恩省省长一起商谈对策，这显然是由于他们所截获的信件把托洛茨基牵连了进去。所以在采取行动以前，默伦检查官先同内务部进行了

电话联系，询问有关托洛茨基旅居法国的一些规定。他被告知，托洛茨基住在法国虽然持有完全合法的签证，但他应该住在科西嘉。这个错误的答复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很难说清楚。二月骚乱以后，达拉第政府被年迈的杜梅尔格为首的政府所替代，新内阁更加右倾。随着行政机构的改革，许多高级官员，尤其是内务部的官员被撤换。因此很可能是这样：一位不熟悉托洛茨基情况的新任官员惊讶地接到这一电话，他的记忆中仿佛在报上曾经刊登过托洛茨基到达法国的消息，故此就信口开河地作如此回答。在保安总局，亨利·莫利尼尔只同极少数官员取得联系，而托洛茨基的住址又是机密情报，不会放在一般的档案材料里。只有一两个人知道这件事，而接电话的那个官员无疑是个新手。

4月14日上午，默伦检查官来到凯尔·莫尼克别墅，同来的有宪兵、书记员和上了手铐的克勒门特。登门的目的是问讯托洛茨基有关摩托车的事情，偷窃的指控当然不能成立。后来，托洛茨基在1935年3月18日到21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这件事。在那位官员的报告中提到托洛茨基应住在科西嘉的背后不管包藏着什么理由，法国政府毕竟抓住了这个机会。它利用这次事件，虽说这也许并不是它所希望的，但却是十分乐意借题发挥，以便调整托洛茨基在法国的居住地点。达拉第政府发给托洛茨基签证以后，看来并不干预托洛茨基的行动，而现在随着杜梅尔格政府的上台，情况就起了变化，似乎是换了一个朝代。人们开始呼吁，托洛茨基应该到科西嘉去。新闻界掀起了一场狂热的驱逐运动，一些报纸要求托洛茨基“滚回”他从未去过的科西嘉岛，或者要求对他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在这件事发生很早以前，廖瓦在拉尼租了一套房子。拉尼

是塞纳—马恩省的一个小镇，离开巴黎大约 80 英里。他很少到那所别墅去，但一直保留着。他身旁只有两三个人知道有这所房子。4 月 15 日晚，亨利·莫利尼尔和廖瓦就急匆匆地把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用车子接送到拉尼去。我一个人留在莫尼克别墅。第二天来了一些记者，不久至少有十几名记者白天守候在住宅周围观察动静，晚上住进巴比仲的一家小旅馆。那些好奇者也纷至沓来，小镇出现了少有的热闹景象。我为了使他们相信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仍住在这所别墅里，早上，就把他们在二楼卧室的百页窗打开，晚上又把它们关上。令我吃惊的是，这个恶作剧居然获得成功。记者们除了见到我以外未见到任何人，照说应该引起他们的怀疑，但未见他们报导说托洛茨基已转移别处，可见没有任何事情动摇他们的确信：托洛茨基仍住在莫尼克别墅。不久我看到早报上登出的消息，是我前一天用电话告诉廖瓦或者是雷蒙·莫利尼尔的情况。很快我就明白了，原来记者在别墅附近安装了一部窃听电话。我想，这下捉弄他们反倒更容易了，于是我就胡编了一点假情况用一种秘密的方式通过电话传出去。比如我用了一个马塞尔的名字，那么不用多久，报上就会连篇累牍地报导马塞尔的新闻。

在这一个星期里，除了记者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人在别墅周围闲逛，但是到了星期天，总有一大批人前来围观。我记得，当时甚至出现了从巴黎到巴比仲的专程旅游车。有个星期天下午，有好几百人在别墅周围乱转。有人还闯入了屋后的树林里，喊骂声不绝于耳。这完全是一群凑热闹瞎起哄的家伙，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整个住宅里只有我一个人，还有就是贝诺和丝苔拉，站在院外的两个宪兵面对着这么多人感到束手无策。有一个家伙企图爬上围墙。我带着贝诺就冲过去，他

对我喊道，他是在自己的国内——法国，高兴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说，这里也是我的祖国。令他奇怪的是，在我说话中他听不出有任何外国人的口音，于是他站在围墙上不动了，呆若木鸡，神情沮丧。他瞧了一眼站在我旁边嚎叫的贝诺，也许是受到了某种灵感的驱使，他就翻身下了围墙。

我跟随托洛茨基多年，这也许是我唯一感到害怕的一次。各家报纸掀起了一场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群情激愤，人人都以为托洛茨基仍然住在这所别墅里，而每天晚上都是我一个人呆在那里。围困了大约 10 几天以后，一天早上，我找了一群记者，向他们宣告，托洛茨基早已离开此地，远走高飞了。他们倒并没有因为我哄骗了他们而对我大动肝火。这是一次有益的战斗。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在拉尼住了几天以后，就同迈希勒一起前往沙莫尼住进了一家旅馆。他们心神不定，不知道明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娜塔丽娅则留在巴黎。亨利·莫利尼尔为了托洛茨基未来的去处正同法国当局磋商。他们曾经设想过把托洛茨基安置到马达加斯加岛或者是留尼汪岛。此外还谨慎地向土耳其政府作过试探，是否存在着让托洛茨基返回土耳其的可能性，回答是不会准许作这样的安排。这时对托洛茨基来说，真是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地步了。

1934 年 5 月初，一天上午，娜塔丽娅、雷蒙·莫利尼尔和我驾车离开巴黎去沙莫尼探望托洛茨基和迈希勒。接着又迎来了一段“热闹的”日子。由于我们所到之处已接近瑞士边境，保安总局以为我们试图闯入瑞士国土，他们便向记者透露我们的汽车牌号。记者立刻把牌号在报上公开了，这实际是一种警告，要我们严守规约，因为规定之一就是不准靠近边境。到了 5 月 10 日，在征得了保安总局同意后，托洛茨基、娜塔丽

娅和我在拉特龙什住进了一个叫贡博的膳食公寓。拉特龙什是格勒诺布尔附近的一个小镇。在公寓的登记簿上，我用我的名字登记，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作为我的叔叔和婶婶的身份登记。我的名字原是荷兰裔的，借此倒可以掩饰一下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那种异样的口音和腔调。为了避免在公寓食堂里吃饭，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装作丧家，娜塔丽娅穿着黑色的衣裙，托洛茨基则在衣袖上戴着黑色的袖章。他们俩人在自己的寝室里用餐。当他们外出时，屋子里的人都保持着一种肃然的沉默。这所公寓很小，可是气氛同一般的旅馆非常相似，如果不施以任何小计，要想不介入他们的谈话是难乎其难的。而参与谈话则可能引起怀疑。

我在公寓食堂里用餐时，试图在可能范围内察看一些周围的动静。一位“保险公司代理人”差不多与我们同时住进这家公寓，实际上他是保安总局派来的便衣警察，此人姓加涅。我们知道这位仁兄的到来，因为保安总局要随时关注托洛茨基是否继续隐姓埋名。加涅和我假装新近相识，以便相互接触交谈而不致引起别人的怀疑。大多数寄宿者都是拉美国家到格勒诺布尔大学读书的青年人，可是危险还在后面。

这里气候宜人。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有时也到花园坐坐，托洛茨基读着报，用法语吩咐我去办些什么事。下午，我们常去乡间散步，当年那里的乡村气息相当浓厚，令人心旷神怡。有一次散步，我们突然发现自己在一个坟地上转悠，原来这是一座俄国侨民的公墓。墓碑上用俄文刻写着将校们的姓名，托洛茨基一言不发地加紧脚步走出墓地。

我们不久就获悉，那位女房东是一个保皇主义者又是一个勤于礼拜的天主教徒。一直在进行侦探的加涅先生打听到这个情报后就告诉了我。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星期天做弥撒的。

问题。每逢星期天，作为共济会成员的加涅也只好上街，装作上教堂去做弥撒的样子，这一切都是为了掩护托洛茨基能安全地住在这位保皇派的寄宿公寓里。这的确是一出费多式的喜剧！我们自以为是地想出了一个主意，每逢星期天上午做弥撒时，就到街上散步。有一个星期日早晨，我们真的进了一所教堂，这也许就是司汤达十分熟悉的黄色广场附近的圣安德烈教堂。这时，一位神父正在布道。托洛茨基和我们坐下来静听了几分钟。在我们离开教堂后，他问我：“他的演说是否像热拉尔那样有吸引力？”在巴黎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中间，热拉尔·罗森塔尔是最知名的人物，因为他口才出众，有卓越的演说本领。

在这所公寓里有一个休息室，凡是这里的房客都可以进去，里面有报纸和杂志。一天早晨，我发现了一份最新出版的《插图》杂志，里面刊登着一幅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合影的彩色照片，显然，由于巴比仲事件才促使这家杂志发表这张照片。在照片上，托洛茨基蓄着山羊胡子，头发往后梳理，然而在这所公寓里，他的胡子剃掉了，发式也改成分头式，可是娜塔丽娅却跟照片上没什么两样，即使能找出一两处异点，但无论谁只要看过那张照片，不会认不出他们的。我马上向加涅发出警报，他就立即把那本杂志拿到自己的卧室里藏了起来。我相信房东太太一定会要他物归原处。他则千方百计地把他收藏起来，直到我们离开这所公寓。托洛茨基自己在1935年5月8日的日记里生动地描述了我们在这家客栈的经历。

5月28日，我们离开了拉特龙什。雷蒙·莫利尼尔在圣皮埃尔—德沙特勒斯租了一间房子。那是阿尔卑斯山下的一个荒凉的乡村。地处格勒诺布尔以北大约20英里。此时，我就去了巴黎，在法国托派组织中任职。而托洛茨基和娜塔丽

娅就在圣皮埃尔同雷蒙·莫利尼尔、薇拉·拉尼斯夫妇住在一起，这时留在他们身边的只有担任俄文打字工作的马克斯·加文斯基了。当时也没有讲明留任的期限。

6月中旬，我把邮件从巴黎送到圣皮埃尔，那里的环境给我的印象不佳。村子很小，这些新来的户主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何况，同托洛茨基夫妇同居一屋对于雷蒙·莫利尼尔这样有身分的人来说，是不会习惯的。加文斯基是个不大合格的俄文打字员，又是个不大好相处的人。因此，这样的局面是不能维持多久的。

托洛茨基住在圣皮埃尔的时候，我去了荷兰，又去了比利时。在托洛茨基周围的人始终为他准备了两套行动方案，一套代号叫帕里雅宁行动，一套代号叫玛格丽特行动。第一套方案是让托洛茨基按照合法的手续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第二套方案是采用非法的手段去实现同样的目标。1934年6月，因为托洛茨基在法国的居住发生麻烦，廖瓦和我就着手采取玛格丽特行动计划，于是我到荷兰去找斯内夫利特；同时在他的党内物色了一个身高、年龄、长相都与托洛茨基相仿的德国人。随后我们把这个德国人公开地带入法国，又偷偷地带出法国，这样法国警方就不能在他的护照上盖上表明此人离境的印记。整个计划执行得很顺利，所以我们在巴黎保留了一张护照。接着，我又到了布鲁塞尔去见亨利·斯巴克，此人是比利时社会党内反对派的领袖。他对托洛茨基主义抱有某种程度的同情，虽然他的同情没有维持多久。一个比利时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乔治·魏雷根陪同我去找斯巴克。斯巴克在他的书房里接待了我们。他以粗鲁的言词评论社会党的领袖：“我敢断定，这些人不会有好下场！”我向他说明托洛茨基万一需要偷越法国—比利时边境时可能会遇到麻烦，他不以为然。

地说：“完全没问题！到时候我会用车子到边境去接他，必要时，我可以出示议员证件。”

1934年夏季，托洛茨基提出建议，让法国的托派集团加入社会党。希特勒上台执政后，斯大林主义者对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诬蔑诽谤更加激烈，法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广大党团员深受其毒害，他们把我们视为仇敌，以致不可能相互进行任何方式的讨论，而往往诉诸武力。托洛茨基设想，如果托洛茨基主义者加入社会党，那么他们就获得了一个使他们能发挥作用的天地。这个后来称之为法国式转变的建议，在法国托派集团和全世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曾几何时，托洛茨基主义者尚把自己视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如今却要加入社会党，这对多数人来说不啻晴天霹雳。雷蒙·莫利尼尔和纳维尔在这个问题上分道扬镳了。莫利尼尔赞同加入，纳维尔则坚决反对。到了秋天，大部分法国托派集团的成员参加了社会党。

在保安总局同意下，托洛茨基在圣皮埃尔住了下来。事实上，法国当局发给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的，是伪造的身分证。他们的姓氏改为拉尼斯，国籍是罗马尼亚，托洛茨基的职业是教授。其实，“拉尼斯”是雷蒙·莫利尼尔情妇薇拉的姓氏。但是，伊泽尔省长由于某种原因不喜欢托洛茨基呆在他的省里，尤其是住在圣皮埃尔。这个小镇的镇长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同省长有私隙。假如托洛茨基隐居本省的事实一旦被揭露，岂不成了一大丑闻，从而对省长产生不利的影晌？所以省长就故意把消息泄漏出去。结果当地的报纸公布了这一情报，虽没有公开托洛茨基的具体住址，只有指明在某地区。这是一种敲诈的方式：如果托洛茨基不肯屈服，不肯立刻离开，那么下一步就要披露更具体的情报了。

6月底,对托洛茨基来说,事情已到了非离开圣皮埃尔不可的地步。于是托洛茨基、娜塔丽娅、雷蒙·莫利尼尔前往格勒诺布尔,我则从巴黎匆匆赶来。我们没有计划好新的去处,陷于走投无路的困境,一切又得从头开始。雷蒙到巴黎去设法寻找出路,娜塔丽娅由于改名换姓比较容易,所以就一起去了巴黎。而托洛茨基和我则一起乘公共汽车去里昂,在那里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了。

我们在饭店用餐。白天,托洛茨基阅读报纸或到市里去兜圈子。托洛茨基还养成了一个新的爱好,即一到晚上就上影院看电影。我们还买了一些书。一天下午,我们到一所公共图书馆,托洛茨基借了一本傅立叶的著作,我们在图书馆里呆了两三个小时。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纽约时把这件事讲给安德烈·布列东听,他对此很感兴趣。后来他把这件事写入了他的书里《傅立叶颂》。又有一次,托洛茨基和我在里昂街头散步,一位失业工人向我们乞讨,托洛茨基对我说:“给他几个钱吧!”我给了这个工人一枚2法朗的硬币,托洛茨基说:“再多给些!”于是我给了这个工人一张5法朗的纸币。托洛茨基身上从来不带钱。他到过许多国家,可是从不知道该国的纸币是什么颜色的。

我们常去公园溜达。有一次,我们在公园小憩,看看孩子们的玩耍。这时一个母亲打了她孩子一巴掌,托洛茨基就说:“这就是爱和恨的辩证法。”后来在墨西哥城,有一次我们从牙医师那儿出来,托洛茨基对我说:“应该发明一种医治牙病的综合疗法。”可见他在日常生活中也在力求发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我们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时,托洛茨基偶尔会向我口述信件和便条。雷蒙来看过我们一次,并带来一些需要回函的信件,我们的工作仍以某种方式继续着。但总的来说,在这

些日子里,托洛茨基沉默寡言,心神不宁。这种动荡不定的局面给他的心情造成很大的压抑。

托洛茨基和我在里昂暂住,亨利和雷蒙正在想方设法为我们解决居住问题。亨利继续同法国当局谈判,雷蒙继续在寻找合适的地点。不久,办法总算找到了。在巴比仲事件以后,我曾经去找过教师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在瓦兹省一个小镇上教书的莫里斯·多蒙热,他和协会中的不少同事都同情托洛茨基,虽然他并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我曾经要他物色一位中学教师,此人必须是住在远离巴黎的村庄或小镇上,房子比较宽敞,并愿意保护托洛茨基,房租我们照付。多蒙热答应替我寻找。结果在7月初,他要我们去看洛朗·博先生住的一幢房子。在格勒诺布尔东面大约6英里处的叫多梅讷的小镇上。雷蒙·莫利尼尔到多梅讷去察看了地理环境后,感到一切都很满意。洛朗·博所住的是一幢3层楼房子,外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坐落在萨瓦公路附近,但在路边,离开镇中心约1英里。洛朗·博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可也是一位左翼教师,他愿意把部分房子租给托洛茨基居住。

1934年7月中旬,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我到达多梅讷,是亨利·莫利尼尔开轿车把我们送到那里的。屋子里最初的摆设全是临时凑合的。托洛茨基就在底层原主人的书房里工作。由于不可能找到俄文打字员,托洛茨基写作时只好用手书写。头几天我们和洛朗·博一家人一起用餐,后来娜塔丽娅在女房东的帮助下自己开伙,但只给托洛茨基和她自己做饭。我大部分时间在外面吃,因为我有自行车,去镇上很方便。保安局的密探加涅也在多梅讷住下。以便监视这幢房子。他的监视有两个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尽可能不让托洛茨基的秘密身分暴露出来;另一方面他必须掌握出入托洛茨基住所来访者的

踪迹。

这所房子周围没有邻居。屋子后面的花园一直延伸到阿尔卑斯山脚下。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常常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到那里去散步，当然不会遇到任何人。黄昏时，洛朗·博偶而也会驾驶他的小轿车把我们带到野外兜风。我们一直坐在车内，毫不停顿地行驶在乡间，就这样消磨一个多小时。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坐在后排，我坐在博的旁边，可是与他谈话总觉得乏味。

在格勒诺布尔有一个青年教师，名叫阿历克西·巴尔丹，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热烈同情者。他有两个兄弟加入了巴黎的托派团体，其中一个叫布瓦泰尔的，还是团体的领导人。阿历克西·巴尔丹及其妻子维奥利特很快得到伊泽省省长的批准，来拜访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巴尔丹是社会党党员，经常参与格勒诺布尔的政治活动和工会活动。托洛茨基和他的谈话总离不开当地的政治话题。托洛茨基对各种细节非常感兴趣，他利用这个机会使自己沉浸在这种日常的实际活动中。巴尔丹参与地方事务越来越频繁，他在工会大会上的几次演讲稿，实际上是托洛茨基起草的。早先，即在希特勒还未上台执政以前，托洛茨基也曾为一个德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赛波尔起草过在普鲁士议会上发表的演说词。

法国的政治形势随着左派和右派之间对立的加剧而日趋紧张。在巴黎的托派团体中也有大量的事情急待处理。因此他们要我两头跑，一部分时间在多梅讷，其余时间在巴黎。我得在巴黎度过三四个星期，然后在多梅讷呆上三四个星期。不过这个安排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也得根据需要作临时调整。1934年10月间，我在多梅讷翻译了《法国向何处去》的第一部分。托洛茨基写完一章，我就翻译一章。这样一本分析法

国政治形势的小册子，由于没有迁就法国当局的立场，当局竟不准用托洛茨基名字发表。因此我的译文在风格上要改得让人看不出它是托洛茨基的手笔。后来这篇文章以部分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者署名，发表在《真理》周刊上。可是俄文原稿必须保存起来。因此当我打算去巴黎时，娜塔丽娅就把那份手稿缝在我上装的衬垫里，以便带回巴黎。

1935年1月间，我在多梅讷帮助托洛茨基写另外一本小册子。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共产党书记基洛夫在非常神秘的情况下被一个年轻的恐怖分子暗杀了，凶手叫尼古拉也夫，其杀人动机谁也弄不清楚。于是，斯大林又掀起了一场新的诽谤托洛茨基的运动，并处决了格伯乌的几十名官员。托洛茨基试图以他当时所掌握的情报来说明这个行动是斯大林的一个阴谋。我把他写的东西译成法文，不久后，这本小册子就在巴黎出版了。有一次，托洛茨基跟我谈论时，他概述了他所谓的“戴王冠的社会主义”理论。“你将会看到，斯大林一定会给自己戴上王冠”。他认为，基洛夫被刺以后，斯大林准会给自己加上某个崇高的头衔，就像波拿巴改姓为拿破仑那样。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似乎应验了这一预言。斯大林封自己为“人民之父”，在他周围聚集着尽是些阿谀奉承之辈，竭力制造个人崇拜的气氛。基洛夫的遇刺及其所造成的后果标志着制造这一神话的工程已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然而托洛茨基也许认为这是返回到更传统、更正规的旧体制的做法。

1月底，我刚好在多梅讷，我的儿子在巴黎郊外出世了，这消息是雷蒙·莫利尼尔告诉我的。在格勒诺布尔，我几乎每天晚上要跟他通电话。雷蒙故意跟我开玩笑，说我的妻子佳比生了双胞胎，那时我没有理由不相信，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托洛茨基。他马上说：“混血种很容易高产。”佳比身材矮

小、黝黑；我呢，个儿高，皮肤白。托洛茨基根据这么一点差别，来作出他的理论解释。

2月，我又回到了多梅讷，那时，托洛茨基正在撰写《法国向何处去》第二部分。从2月7日起，他开始写日记。这部日记对于研究托洛茨基的生平是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它是在流亡生涯中最艰难的时期写下的。因此，单凭这本日记所反映的气氛和精神状态来推断他在整个流亡期间的的生活情景是靠不住的。正如他的日记所披露的那样，他曾经沉浸于各种不同的兴趣爱好中，但这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因为托洛茨基知道，一旦发生什么事情，他的日记很可能落入法国当局之手。所以，在日记中常常故弄玄虚。比如在4月9日的日记中，托洛茨基写道，他“不知道谁是《法国向何处去》一文的作者”。在几个月以前，即在巴比侖事件中，他曾经自称是一个“耍阴谋的老手”。因此很可能是这样，他写这本日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让法国警方看的：“瞧！这就是我正在从事的工作。”所以在日记中看不到托洛茨基政治活动的全貌。他对世界各地托派组织内部的宗派斗争的介入，他同许多人的政治通信以及各地来访的客人，这些在日记中丝毫没有留下痕迹。比如：廖瓦、让娜、雷蒙·莫利尼尔常从巴黎来探望他。除此以外，也有其他人前来同他进行政治性讨论和磋商。另外还有亨利克·斯内夫利特、皮埃尔·纳维尔、让·鲁和马尔索-皮韦尔都曾来多梅讷拜访过。有一次，伊凡·克雷博也来了，为了逃避加涅的监视，雷蒙·莫利尼尔在汽车经过镇中心时，不得不把客人藏在汽车尾部行李箱里。

托洛茨基在多梅讷已度过了两三个月，现在看来，还得在那里逗留一段时间，因此就想尽可能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洛朗·博把整个底层都让给了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一个房间

作为卧室,另一间作为托洛茨基的书房。书架安放在走廊里,书是从巴黎寄来的。我在多梅讷时,就在底层的一个小房间里工作和睡觉。看来有必要在底层安装一个浴室,而装个浴室得化很多钱。可是无论是洛朗·博还是托洛茨基,手头都不宽裕。事实上,那时托洛茨基的财政状况相当拮据,因为他身处逆境无法以投稿谋生。不久在分摊费用问题上,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争执。有一段时间,双方关系搞得很紧张,托洛茨基和洛朗·博两人见了面都不说话。后来,托洛茨基在快要离开那里时,情况才有所改变。这件事促使托洛茨基在1935年2月12日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再没有比忙于原始积累的小资产阶级更可憎的了。我从来也不曾像现在这样仔细地观察过这类人物。”字里行间充满着愤慨,可是把这说成是“原始积累”实在是对马克思经济概念的滥用。洛朗·博当然不会由于把房子租给托洛茨基而成为资本家。而娜塔丽娅在她的回忆中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她说到洛朗·博夫妇时,称他们都是“好心人”。

5月间,我乘坐从巴黎开往格勒诺布尔的火车去多梅讷。长途旅行让人疲惫不堪,再加上下午的车厢里又很闷热,我就到餐车去买了一瓶矿泉水喝,并顺手将服务员递给我的发票塞入了正在看的那本书里。这是我给托洛茨基带去的书。我到达多梅讷的第二天后,当我正在院子里散步时,托洛茨基突然出现在书房的窗口,手里挥动着那张账单,用法语冲我喊道:“你好啊!竟然到餐车上‘享口福’去了!”他已经学会了不少法国的俚语,并很喜欢运用这种语言。其实这是一件好事:它证明我只是喝了一瓶矿泉水,其余什么也没喝!

挪威如今已建立了一个社会党人掌权的政府。一个在挪威避难的德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华尔特·海尔德邀集了几个挪

威朋友要求政府批准托洛茨基入境。1935年6月8日，我从巴黎来到多梅讷报告一个消息：即挪威政府已经批准托洛茨基移居挪威的申请，虽然签证的印章尚未正式盖在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的护照上，因为他俩的护照还在多梅讷。但这只不过是一个手续问题。在两天时间里，娜塔丽娅和我整理好了行装和书稿，并且同洛朗·博夫妇作了简短的告别。

6月10日傍晚，我们来到了格勒诺布尔车站，准备乘坐去巴黎的火车。格勒诺布尔保安总局负责人前来送行，当我们准备登上火车时，他指给我看，伊泽省省长正站在另一边月台上远远地注视着托洛茨基的离去。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有单独的一间包厢，可以在座位上就寝。我则整夜坐在门外的过道上看守。黎明时分，火车到达了巴黎，廖瓦在车站等候我们。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直接去热拉尔·罗森塔尔的寓所。罗森塔尔跟他的父亲（是巴黎的一位名医）住在一起。

我们到了巴黎才知道，挪威政府还在犹豫，近日的谈判进行得很激烈，法国当局则希望托洛茨基尽快离开法国，回多梅讷去显然是不可能了。与签证谈判的同时，巴黎托派团体的许多人找上门来与托洛茨基讨论政治对策，因为法国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在米罗兹举行，法国托派与社会党领导集团的冲突已到了危急关头。托洛茨基在事后不久写下的1935年6月20日的日记中记述了在巴黎的这段紧张热烈的时刻。6月13日，问题终于解决了，挪威当局批准了以6个月为限的签证。于是我们打点行装，即日动身。

第三章

在挪威的困境

1935年6月13日午夜12点一刻，托洛茨基、娜塔丽娅、让·鲁和我，在北方车站乘上了去安特卫普的火车。让·鲁当时是法国托派的领导人之一，他陪同我们前往安特卫普，以便同我一起分担一路上的保卫工作。再者，托洛茨基还想同他讨论关于法国托派组织的一些问题。翌日早晨，我们抵达安特卫普，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扬·弗兰克尔在车站迎接我们。我们住进了埃克塞尔西奥旅馆。记得在1932年11月，也在这个城市，比利时警方派了许多警察严密监视着载送托洛茨基由丹麦回土耳其的那艘轮船，而这一次比利时当局却没有派警察监视。法国当局也如此对待我们，在北方车站上也没看到有多少警察。这次旅行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简便得多。

6月14日和15日，托洛茨基在安特卫普同比利时的一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和一些佛兰芒社会党联盟的成员进行了会谈。6月15日晚8时，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弗兰克尔和我登上了开往奥斯陆的“巴黎”号挪威轮船，而让·鲁返回巴黎去了。我们在船上一切顺利，旅客大部分是挪威人，他们似乎并不注意我们。6月18日早晨，轮船驶进了奥斯陆海峡。我们

办理移民手续没化多少时间，登岸检查也只是例行公事，就和其他旅客挤在一起走下了跳板。即使有记者的话，他们也难以靠近。我们立即乘上轿车前往位于奥斯陆西北 30 英里处的小镇——耶夫纳克尔，在一家小巧幽雅的旅馆里住了几天。

在这陌生的世界里，为我们做向导的是华尔特·海尔德，他的真实姓名是海因茨·埃普，他是前两年移居挪威的德国避难者，他的妻子是挪威人。除他之外，还有几个挪威朋友，其中一位是新闻界人士奥拉夫·舍夫罗。他在办理托洛茨基入境签证这件事情上，帮了大忙。另一位是大学生克耶尔·奥特森。6月23日，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住进了康德拉·克努岑家里，他是当时的挪威国会议员。这件事是由舍夫罗一手安排的，他和克努岑是知交。这幢住宅虽不豪华，但宽敞舒适。在不远处还有几所住宅。这个叫韦克斯霍尔的小村庄是赫纳福斯镇的一部分，该镇位于奥斯陆正北约四十英里处。

因为克努岑只能向托洛茨基提供有限的居住面积，所以托洛茨基只得减少秘书班子的成员，也不设专门的警卫人员。扬·弗兰克尔就成了他唯一的秘书。于是我于6月25日乘火车返回法国。存放在多梅讷的书籍和档案资料于7月底寄往赫纳福斯。俄文打字机也寄去了，同时为他物色了一个俄文打字员，于是托洛茨基又恢复了正常工作。

去年，即1934年2月12日，法国左翼曾在巴黎举行过一次街头游行示威，在游行时，弗兰克尔被便衣警察认出是外国人，于是被逮捕，然后被驱逐出境，回到了布拉格。弗兰克尔找了一个伪造证件的行家，把法国警方贴在护照上驱逐令消除掉，于是他就凭着这张真正的但作过涂改的护照，到挪威来与托洛茨基会晤。1935年10月，他作为侨居挪威的外国公民被

责令亲自到挪威警察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由于考虑到护照上的涂改一旦被发现就会给托洛茨基带来麻烦，因此觉得还是让弗兰克尔返回捷克斯洛伐克为上策。他回到布拉格，就着手物色接替他在赫纳福斯工作的人，结果选中了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埃尔温·沃尔夫。他于11月15日到达赫纳福斯。弗兰克尔在托洛茨基身边工作多年，而沃尔夫没有这样的经历。何况，他对秘书工作也不怎么感兴趣，因此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托洛茨基对文稿的处理总感到不太称心。

我回到巴黎后就在法国托派团体中担任了工作。自1934年入秋以来，我们的托派成员在社会党和社会党的青年组织中积极开展活动，但在青年中活动的收效却比在社会党内所取得的成效更显著。托洛茨基主义者在青年中间争取了不少支持者，在塞纳区一直保持领先地位的弗雷德·泽勒为首的社会主义青年小组与托派更加接近了。我回国的时候，青年组织中的两派：以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泽勒一伙为一方，以比较保守的分子为另一方，双方正开始发生一场尖锐的斗争。

7月底，社会主义青年联盟全国代表会议在里尔召开。7月30日，我在里尔给托洛茨基发去一份电报，告诉他：“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决定开除我们和泽勒一伙。”我们这次被开除是党内右派分子策划的结果，并得到社会党一般成员的支持。8月8日，弗雷德·泽勒、达维德·鲁塞、伊凡·克雷博和我以及其他几位作为被开除者的代表前往社会党总部，同由莱昂·布鲁姆等社会党领导人所组成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进行会谈。该委员会试图进行调解，希望我们留在社会党内，但必须接受苛刻的条件。我们围坐在一张狭长的桌子旁，布鲁姆就坐在我的斜对面。他以甜蜜的嗓音，娓娓动听的、有说服力的理由，企图使我们接受传统的社会主义立场，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

展到这般地步，因此也就难以挽回了。

泽勒集团联合了托洛茨基派，打算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青年组织。10月末，泽勒去挪威拜会托洛茨基并在那里呆了约两个星期，很自然他也问起托洛茨基如何丧失权力的问题，并且问：“您为什么不运用掌握在您手中的强大的军事机器进行抵抗？”托洛茨基虽然认为这是一个“幼稚”的问题，但还是在11月12日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斯大林能战胜反动派？》的长文。他对该问题作了极详尽极清楚的答复，列举了有力的论据，但也不乏牵强附会的理由。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在文章中说到：“无疑，在当时要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三头同盟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甚至不需要付出流血的代价，但是政变所造成的后果将是加速官僚化、专制化的进程，而这正是左翼反对派所竭力反对的倾向。”

泽勒以他那新入教者的狂热劲，从挪威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在巴黎的一位亲斯大林的朋友，在那张明信片上写着：“斯大林完蛋！托洛茨基万岁！”这位朋友竟然把这张明信片转交给法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这事引起了小小的风波，所有的斯大林分子都把这张明信片说成是托派准备实行个人恐怖的一个信号。

临近1935年岁末，托洛茨基通过廖瓦同设在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主义历史研究所进行谈判，打算把在1917—1922年的通信集出售给该所，共有900多封信件，都是影印件，原信接政治局的命令被存放在莫斯科了。结果在1935年12月28日，同研究所签订了出售的合同。

1936年1月26日，廖瓦就信件寄送阿姆斯特丹研究所的问题写信给他父亲，信中说：“我抽掉了列宁写的3份材料。在第一封电报上，列宁写道：‘可以用贿赂的手段，也可以用恐

吓的办法，’我二封电报上写着：‘如果他们纵火，就把他们全部处死。第三封电报要求枪毙搞破坏活动的耶夫斯克的工人。我把这3个文件另加存放。”这是我所知道的涉及到文件的唯一的一件事情，这关系到保护列宁名声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些被抽掉的文件结局如何。我无法从让·梅耶编纂的《托洛茨基文集（1917—1922）》中找到它们。在那本集子中我只发现一篇，在第545页上，有1919年6月8日列宁给斯克良斯基的谈到耶夫斯克工人问题的电报全文：“请以我的名义打电报给梅尔尼昌斯基，告诉他，犹豫不决，对旷工行为不执行处决是可耻的。”这似乎就是廖瓦所说的第三个文件。

托洛茨基建议法国托派团体集体加入社会党，纳维尔不赞成这个意见，并退出了该组织，他自己另外建立了一个小团体。可是，在法国托派团体加入社会党以后，纳维尔又立即决定把他自建的那个小团体也加入了社会党。在社会党内，这两个派系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越来越相同，所以在1935年，他们被开除出社会党后，都认为有必要重新建立一个独立的托派团体。于是，纳维尔、雷蒙·莫利尼尔、皮埃尔·弗朗克、让·鲁、巴尔丹等人就成了新团体的领导人。

1935年9月到10月间，莫利尼尔对自己的合作者开始表现出不耐烦的情绪。他认为，这个新组合的托派团体，工作进展得太慢；他觉得，该团体出版发行的《真理》周报上的文章写得太空洞，使工人们不愿意看。分歧开始形成，于是一个团体分成两派。我觉得自己是站在雷蒙·莫利尼尔一边的，自最初参加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以来，在法国托派内部历次争端中，我一向是同他联合在一起的。自1929年以来，他一直受到托洛茨基的信任。干工作谁也不及他那样精力充沛，雷

厉风行。凡是团体要筹集资金、印刷标语传单、组织群众集会，这些事情总少不了他。

雷蒙·莫利尼尔是个喜欢张扬的人，他写信给托洛茨基公开了自己的打算。信中他详细阐述了他的那个尚未向周围人宣布过的计划，至少他没有向我说过。在当时，我也常写信向托洛茨基报告我所观察到的情况。因为在信里我没有提到莫利尼尔新近向他谈到的那个计划，托洛茨基以为我故意对他隐瞒实情，似乎我不了解这一情况是不可能的；他获得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因为廖瓦和其他几位都定期地向他作书面汇报。

12月初，分裂终于出现了。莫利尼尔——弗朗克集团（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开始出版新的报纸《公社报》了。让娜·马丹也属于这个集团，这就必然使她和廖瓦之间产生纠葛，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越来越感到痛苦。但在当时，分裂程度尚未越过派别斗争的常规范围，两个集团之间还在进行谈判，而我和托洛茨基的关系暂时中断了，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结局是，《公社报》并未比《真理》取得更大的进展，双方面临着同样的困难，都没有取得成功的灵丹妙药。1936年1月上半月，我放弃了现在看来是无谓冒险的一切举动。有几个星期，我哪一派也不接近，可到2月中旬我又重新加入了受托洛茨基支持的那一派。在分裂初期，佳比像我那样选择了莫利尼尔集团，后来她仍留在那里，这样我跟她之间就出现了类似廖瓦和让娜之间的尴尬局面。

我在政治上遇到的波折又进一步对我的个人生活产生了影响。由于脱离了两派组织，我不得不另谋职业。在巴黎第十九区社会党小组内，我认识了一个叫安德烈·蒂里翁的人，在他的帮助下，我找到了工作，在法国互助会担任保险统计

员。这家公司是专门给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退伍军人支付养老金的机构，有 200 来名职员。蒂里翁虽然不是最高负责人，但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因此他可以雇用几个年轻的超现实主义。此时，我又恢复了跟托洛茨基的通信。不久，安德烈·纪德从俄国旅游后写的一部小书《从苏联归来》出版了，我就给托洛茨基寄去了一册。

5 月下半月，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其间工人们占领了工厂。在 6 月初的一个夜晚，有一种奇异的气氛笼罩着巴黎。任何一个角落都看不到警察，马路上空空荡荡，除了少数几个工人在厂间走动外一无动静。这种局面没有延续多久。双方开始了谈判，城市又恢复了原先的面容。6 月 7 日，一份协议签订了，即政府、雇主、工会 3 方面达成的所谓马蒂尼翁协定。

可是 6 月 8 日，星期一，法国互助会的罢工仍在继续。我们占领了办公室。白天，妇女们做饭；晚上，我就睡在地板上。一切事情都做得顺顺当当，井井有条。我们是罢工委员会的秘书，该委员会占据了主任办公室。两位警官进入办公室彬彬有礼地询问参与罢工的人数，其中一个把数字记入笔记本。我们的罢工在全国工潮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在我们的这个小天地里，谈判却出现了马拉松的局面。以主任及其助理为一方，以罢工委员会为另一方，围坐在长桌边进行着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结果以幅度较大的提高工资，享受有工资的休假以及其他待遇而平息了这场罢工。

身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密切注视着法国的形势。法国的托派集团恰好走完了一次改组的历程。6 月 1 日，与莫利尼尔派取得了暂时的和解，两派决定采用一个新的名称，叫“国际工人党”，同时开始为党报物色一个报名。6 月 10 日，托洛茨基写信给我，信上说：“随信寄来的是一篇近日写就的文

章,极为紧迫。因此我请您去完成这件非常棘手的任务:将此
文立即传到同志们手中并将它刊登在报上。该报名称最好叫
《苏维埃报》,这样可以使我们的思想传播到信奉共产主义的
工人中间去,何况它非常适合当前的形势。报头上不妨这样
写:“苏维埃遍天下吗?是的,但首先在法国出现。”

托洛茨基随信附来的那篇用俄文写的论文,题目叫《法国
革命开始了》,写于6月9日,它是6月5日写的评论法国形势、
题为《决定性的步骤》一文的继续。那篇文章是几天前寄给我
的。至于那个“苏维埃遍天下!”的说法,当时是共产党人在游
行示威中最常用的一句口号。托洛茨基不仅对报名提出建议,
而且想到了报头,可见他对法国真可谓关怀备至。当天夜里,
我就坐在法国互助会主任办公室桌边翻译了他的文章。可是
托洛茨基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于是他对法国托派团体的领
导人越来越失去耐心。他认为该团体并未按照形势需要紧急
行动起来。他在6月12日给我的来信中写道:“我收到了您
的便函(即告知关于法国互助会的罢工之事),并祝贺您担任
了罢工委员会秘书。我希望,您把我的第二篇文章(即6月9
日的那篇)送到编辑部,如果编辑部拒绝接受我提出的条件
(即毫不推迟,毫不改动地刊登托洛茨基的文章),那么我将公
开发表声明,本人对法国支部的机关报不承担任何特殊责任,
同时我将通过《每周公报》与我们的同志保持接触,该报篇幅
虽小,但我在那里能够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

一般来说,托洛茨基总是把重点放在现有的托派组织上,
并密切注视着这个特殊团体组成后的所作所为,而这次他要
亲自筹划办一份新的报纸是非同寻常的做法。可他还不以此
为满足。不久以后,我收到了托洛茨基亲笔写的便函。(当时
没有把它们复制保存起来,后来这类信件不幸都丢失了。)他

在信里建议，在巴黎创办一份新报纸，取名为《苏维埃报》。他打算把每期的绝大部分重要文章从挪威寄到巴黎，由我把这些文章译成法文并负责报纸的出版发行。托洛茨基企图对法国托派团体的领导集团保持着某种中立的姿态。他选中我实现这项计划，显然有以下一些理由：我能够迅速地把他的文章从俄文译成法文；我对出版印刷业务比较熟悉；还因为我曾经一度是莫利尼尔集团的一个成员，而现在已与他们割断了关系；我不论同鲁·巴尔丹、纳维尔派，还是同莫利尼尔——弗朗克派都没有牢固的政治关系。当时法国托派团体的领导班子是由这两派成员构成的。然而，随着工潮的平息以及托洛茨基同法国托派团体领导人的关系逐渐改善，这个筹办报纸的计划结果还是流产了。

7月19日爆发了西班牙内战。7月底，托洛茨基告诉廖瓦和我，他想秘密访问卡达卢尼亚。廖瓦和我设想了几方案，我们想雇一艘渔船让他从挪威抵达西班牙，但除了进行几次会谈以外，这个主意并未获得成功。

8月5日，托洛茨基已着手多时的一本书《被背叛了的革命》终于定稿了，并寄给了他的译者。同一天，他离开了韦克斯霍尔，与康拉德·克努岑一起到附近的克里斯蒂安桑作一次远足。就在当天晚上，挪威一小撮亲纳粹集团的成员袭击了克努岑住宅，并盗走了属于托洛茨基的信件和文件。在巴黎的廖瓦为托洛茨基的安全而担忧，他要我去挪威照看一下。我就去安特卫普搭船，于8月25日上午到达奥斯陆。

当轮船还在奥斯陆峡湾平静的海面上航行时，挪威的早报已在船上出售了。我能看懂报上的大字标题，从而得知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案的结果：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余的14名被告都被处决。在韦克斯霍尔我立刻找到新居同托洛茨基。

娜塔丽娅、埃尔温·沃尔夫以及克努岑一家住在一起。我们在那里，不断有记者来采访，他们想获得托洛茨基对莫斯科审判的反应。托洛茨基确实感到担忧，先是担心审判的本身，然后是担心审判对挪威政府可能造成的影响，而挪威政府对托洛茨基的态度越来越严峻。莫斯科当局对挪威政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求政府对托洛茨基采取措施，不然的话，莫斯科将大幅度缩减挪威鲑鱼的进口量。

8月28日，托洛茨基和埃尔温·沃尔夫去奥斯陆，为了在挪威纳粹党人侵犯克努岑住宅案件中出庭作证。哪知对法西斯分子的起诉竟成了一次反托洛茨基的行动，作为证人的托洛茨基发现自己竟成了被告。当天下午，我在客厅里同一个记者通话后，刚放下电话，突然闯进两名警察。他们抓住我就把我带出屋去，这时我看到一辆挤满警察的车子。就是这些警察把托洛茨基从奥斯陆押送回来的，我无法同他说话。沃尔夫坐在另一辆车上，我也被推进了这辆车。一名警察匆忙从屋里拿走我的箱子和一些属于我私人的物品。接着就把我们带往奥斯陆。他们所有这一切行动，都是在没有向我们作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干的。

沃尔夫和我被带到奥斯陆警察总局，当局要我们公开声明我们是自愿离开挪威的。否则的话，我们就要被驱逐出境，把我们赶到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我们拒绝在声明上签字。沃尔夫身上有些钱，我则身无分文。在囚室里，他给了我一张钞票，我就悄悄地塞进袜统。我们不知道他们将会怎么处置我们，也不知道托洛茨基的命运如何。

翌日，我们在两名警察的监护下被莫名其妙地送上了火车，到达瑞典边境。两名瑞典警察替换了挪威警察，他们一直把我们押送到丹麦，并把我们转交给丹麦警方。我们于8月

30日到达哥本哈根，被6名丹麦警察看管着。此时此刻，我们仍不明白：我们究竟要去哪儿，这个世界还将发生什么事情。在哥本哈根车站上，一位警官头目很有礼貌地告诉我们，我们将被送往一家旅馆。我们坐上一辆汽车，周围挤满了警察，汽车在街上疾驶。当我们进入这家“旅馆”时才明白，原来这是一所监狱。——实际是一所秘密监狱。到了晚上，沃尔夫和我被关进了单人囚室，室内几乎空无一物，只有一张钉在墙边的木板床和一条毯子。我们身上的全部衣物在夜间全都被拿走，甚至连一块手帕都不许留下。

第二天，他们仍是不作任何解释，把我们带走了。我们来到一个码头，被带上一艘很小很旧的船上，船就立即起锚。船上没有警察，船长对我们很客气，我们打听到这原是一条空的货船，现在准备到摩洛哥去装椰子油，中途要经过安特卫普，那时我们就可以在那里登岸。后来，船驶入大海时，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将被挪威政府拘留的消息。这时风云突变，海浪乍起，使空船颠簸摇摆。我们抵达安特卫普是9月2日，比利时警察已在码头等候我们的到来。我们在他们的护送下，登上了去巴黎的火车。进入法国国境后，比利时警察尽量避免引起法国警方的注目，也不向他们详细介绍我们的情况，因为他们怕法国警方借口沃尔夫是捷克人，而强迫他返回比利时。我们总算平安到达了巴黎。北欧各国政府如此对待我们，当然因受俄国施加外交压力的结果。

9月2日，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被挪威政府拘押在奥斯陆西南方约25英里处的一个叫桑德卑的小村庄里，被关在一幢2层楼的小屋内，有10来名警察在底层看守着，不许托洛茨基接待来访者，但有两人可以例外：一个是挪威律师，他已经来过几次；另一位是法国律师热拉尔·罗森塔尔，1936年10

月，他曾获准去探望过一次。托洛茨基的信件来往也受到密切的监视。他写的信往往被耽搁很长时间才能寄出或者被退回。此时他只能得到一些少量的信息。

为了驳斥莫斯科强加于他的莫须有的罪名，托洛茨基通过他的两名律师在几个欧洲国家对诽谤他的几家共产党刊物向法院提出起诉。可是10月29日挪威政府发布一条禁令，禁止被拘禁的外国人“从事诉讼活动”。托洛茨基甚至被剥夺了近距离活动的权利，只能在屋子周围走动。他的处境犹如狱中的囚犯一样，而且是关在一个条件极差的监狱里。托洛茨基在他的一份声明中说，号称“社会党人”的挪威政府竟堕落到如此地步。回忆在多梅讷那些倒霉的日子里，即使法国的杜梅尔格政府也没有这样卑鄙无耻。

我回到巴黎后，又在法国托派团体内任职，但不久我的日常活动就是配合廖瓦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审判中出现的诬陷进行反驳。由于托洛茨基在挪威政府的压力下被迫沉默，廖瓦就着手写文章逐条逐点地进行批驳，结果形成一部书，我把它译成法文并负责出版事务，督促印刷工人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以及负责校对清样。这部题为《红色白皮书》首次系统地揭露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案件中的阴谋。

1936年秋，莫斯科审判案调查委员会在巴黎成立，热拉尔·罗森塔尔以律师的资格积极参与了委员会的工作，我也从中协助。在委员会几次会议上，我见到了罗斯麦夫妇、安德烈·布列东和维克托·谢尔盖。布列东为人善良，很愿意帮助我们。每次会议结束时，我们往往就某一个文件达成了协议，并在文件上签字，大家都站起来，挨个签上自己的大名。布列东总喜欢用绿色的墨水笔签名，并在名字下面写上“作家”两字，这颇令我奇怪。

同年秋天，我几乎每天和廖瓦会面，我开始更多地了解他。他是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从事工作的：莫斯科千方百计地想迫害他，法国当局又不断地找他麻烦，经济收入拮据，与让娜的关系也不是那么称心满意。廖瓦又常常表现出一种沉默寡言的性格，在这方面他更像他的母亲。有一天，我们在拉克雷泰尔街他的公寓里闲聊，我问他在布尔什维克执政初期，他们是用什么办法来防止同性恋的？他用断然的口气回答说：“他们全部是特务。”

廖瓦对法国托派团体领导人总不那么信赖，多少有点轻视的成分，背后常常用“法国佬”一词来称呼这些人，而在交谈中，他又会毫不犹豫地讲“我们俄国人”如何如何。1934年，他又称赞斯大林分子季米特洛夫具有“布尔什维克的骨气”。

廖瓦对法国托派领导人缺乏信任，这可能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38年2月，他患了腹部疼痛的疾病，本可以求助于法国托派团体的某一位领导人，纳维尔或者热拉尔。他们同法国医学界的高手都很熟悉，尤其是热拉尔，他父亲是巴黎的一位名医，本可以给他指导，为他提供方便，可是廖瓦宁可去住俄国人开办的一家小医院。1938年，那里只聘用一些白俄分子或斯大林派来的特工人员滥竽充数。廖瓦笨拙地装出一副法国工程师的样子，可是那些俄国医生用不了两分钟就看出他是俄国人了。过了很长时间，法国托派领导人才知道他进了俄国人的医院并在那里做了手术。当他决心去住院时，让娜在他身边陪伴着，她对他的忠诚使他没有产生任何疑惑，可是廖瓦却被对法国托派领导人的敌意迷住了心窍。陪伴他的还有马克·祖博罗夫斯基，这个人后来才知道是斯大林派遣的特务。在这个关键时刻，廖瓦没有跟任何一个法国托派领导人接触过。虽然当他决心住进这家俄国人办的医

院时(后来他终于死在那里),他的头脑一直是清醒的,可是祖博罗夫斯基对作出这个决定肯定是起了推动作用。

热拉尔·罗森塔尔是托洛茨基同外界联系的主要渠道之一。10月份热拉尔获准对托洛茨基作了一次短期访问。它又是在挪威检查官严格限制的情况下允许同托洛茨基保持通讯的极少数几个人之一。廖瓦、热拉尔和我3人得经常碰头处理一些重要日常事务:与托洛茨基取得联系,研究解决僵局的对策,为了驳斥莫斯科的诽谤,托洛茨基试图在好几个地方向法院起诉,因此为了打赢官司还得四处奔波,同时还要协助莫斯科审判案调查委员会开展工作以及关心廖瓦的处境。因为他曾向法国当局保证过不干预任何政治活动。但现在他却以自己的名字发表了《红色白皮书》。面临的问题还真不少,每星期都有许多问题要处理,有时几乎天天会遇到一两件需要立即作出决定的麻烦事,弄得我们焦头烂额。比如,有一天上午,我们3人在一家咖啡馆里聚会,大家围坐在一张小桌旁,热拉尔在谈话中突然用“让娜·莫利尼尔”的称呼提到了让娜。我也不太明白他为什么不用别的称呼。不过,让娜未婚时所用的马丹这个姓氏,在党内可从来没有用过。当廖瓦听到热拉尔用这个名字称呼她时,就霍地站了起来,推倒了桌子,厉声说:“我可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说完就走了。于是,在后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就只好充当他和热拉尔之间调解人。这一切当然只能给工作增添了麻烦。

廖瓦在留居巴黎的数年中,他的亲密助手就是马克·祖博罗夫斯基。许多年以后,人们才知道祖博罗夫斯基是格伯乌的一名特工人员。自从托洛茨基离开俄国来到伊斯坦布尔起,斯大林就派遣了一批特务打入托派组织,其中一部分是在当地雇用的代理人,他们的活动不超过一国的范围,还有一些人是

国际间谍，他们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参预国际秘书处的
工作，以及《反对派通报》的发行业务；还有被派到廖瓦身边工作
并经常跟托洛茨基直接联系，甚至还登门拜访。有 3 个人是
最重要的国际间谍：索波列维奇兄弟俩，一个叫亚伯拉罕，一
一个叫鲁文。第三个就是马克·祖博罗夫斯基。他们的活动方
式可以写一部书，但是还有一些人的活动至今还涂抹着神秘
色彩，令人费解。

雅各布·弗朗克（又名格拉也夫）就是其中之一。他于
1929 年 5 月 29 日到达普林吉坡岛，随后留下来当了 5 个多月
的托洛茨基秘书。他是维也纳精神分析专家阿尔弗雷德·阿
德勒夫人赖莎·阿德勒介绍来的，看上去挺老实。赖莎原是
俄国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托洛茨基流亡维也纳时，她
就认识了托洛茨基。1929 年初，托洛茨基一到土耳其，她就
拍了一份电报给他以示慰问，并开始同他通信。弗朗克是立
陶宛籍的犹太人。1929 年春天，在赖莎·阿德勒把他推荐给
托洛茨基时，弗朗克已是奥地利共产党的成员了。他在 1927
年秋天以前，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直在苏联驻维也纳的商务
代办处工作。他并没有向托洛茨基隐瞒这些事情，托洛茨基
在当时无疑把这些看成是可取之点，而不是可疑之处。弗朗克
大约是在 1929 年 10 月底离开普林吉坡岛的。

弗朗克身上确实存在着一些疑点。当时在普林吉坡岛住
过的人和我后来认识的人，如廖瓦、让娜、阿尔弗雷德·罗斯
麦和玛格丽特·罗斯麦，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诉说过弗朗克的
情况。1958 年，我曾问过让娜，她记得很清楚；她发现弗朗克
喜欢夸夸其谈，对上有点阿谀奉承。因此让娜对他没有多少
好感，可也没有什么怀疑。不过，托洛茨基对弗朗克是信任
的，在弗朗克离开普林吉坡岛 3 个月以后，即 1930 年 1 月 27

日，托洛茨基在给一名捷克托派分子的信中写道：“弗朗克同志曾在普林吉坡岛担任过我的秘书，工作数月，你们对他可给予完全的信任。”1930年，弗朗克写过一篇评论俄国经济形势的文章，发表在《反对派通报》上，这时他开始表现出对斯大林主义越来越好感，于是逐步脱离左翼反对派。难道他仅仅是一个叛徒吗？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也许他是个叛逆者，这也是托洛茨基的看法。但他也可能是一个受过训练、被格伯乌控制的特务。有许多迹象可以印证这个假定。格伯乌有个惯例：喜欢从俄国毗邻的国家里招募那些会说俄语的犹太人，把他们派到西欧搞特工。索波列维奇兄弟和祖博罗夫斯基就是例子。弗朗克看来也属于这种类型。

从当时来往的信件中还可以发现许多线索。1930年1月13日，雷蒙·莫利尼尔给廖瓦的信里说到：“一个叫罗曼·威尔的人（指鲁文·索波列维奇）自称与弗朗克是知交，要求直接负责《反对派通报》德文版的发行工作。”现在知道，那时这位威尔先生已是格伯乌的职业特务了。他为了插手廖瓦的工作就利用了弗朗克的名字。1930年8月30日，他直接写信给托洛茨基。这时他已深深打入德国的托派团体，在信中写道：“我曾向您提议，是否将弗朗克同志增选到（德国托派团体）全国性的领导班子中去。”弗朗克离开普林吉坡岛以后，曾于1929年12月17日写信给托洛茨基说：“那位来比锡人罗曼·威尔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他干起工作来像头公牛。”显然，他们在相互吹捧，在虚构编造一个故事。

1929年哈林在苏联驻巴黎的大使馆工作，他曾经同情托派，并且充当过托洛茨基与莫斯科托派分子之间的中间人。1929年7月间，托洛茨基从普林吉坡把《反对派通报》第一期的全部打字稿寄给他，以便由哈林去负责出版。哈林就把稿件交

给格伯乌。尽管有一份眷清稿，但第一期通报还是被拖延了出版时间，更令人痛心的是，托洛茨基把从俄国带出来的一些原始文件也寄给了哈林，以便他摘登在《通报》上，结果，这些文件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据我回忆，这些情况我是从廖瓦和雷蒙·莫利尼尔那里听来的，从托洛茨基的来信中也证实了这一点。1937年7月28日，他从墨西哥写信给廖瓦说：“(杜威)委员会想得到列宁逝世后克鲁普斯卡娅给我的那封信的原件或是可供证明的影印件，据我回忆，克鲁普斯卡娅的原信件以及其他的珍贵文献为了能够在《反对派通报》上摘要刊登，结果给弄丢了(我怀疑是给格伯乌的特务窃走的)。”托洛茨基早在普林吉坡时就委托布鲁姆金转交给莫斯科托派分子的一封信里就斥责哈林是个特务分子。哈林也许就是那个在1929年六、七月间就暴露特工身分的约瑟夫吧。不过，我不能十分肯定。

1930年6月18日，雷蒙·莫利尼尔从巴黎写信给当时住在普林吉坡的廖瓦：“为了接替你在土耳其普林吉坡的工作，您得认真考虑一下奥平，他像您那样精通德文、法文和俄文，他是一位非常忠诚老实的人，办事积极而且很有才干。他的妻子也会打字，虽然她不一定肯一起去，可是他不会以此作为赴任的条件。”保罗·奥孔也叫奥平，是出身于南乌克兰的犹太人，作为难民侨居在布鲁塞尔，他对托洛茨基主义者颇为同情。虽然他没有到普林吉坡去工作，但不久他就参预了国际书记处的工作。雷蒙·莫利尼尔于1930年12月初安排他去巴黎。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密尔。据说他出生的那个村庄叫米洛沃耶。这个村庄就在托洛茨基的诞生地扬诺夫卡以东120英里处。尽管奥平没有到普林吉坡去给托洛茨基当秘书，但雷蒙·莫利尼尔还是让他到岛上呆了几

个星期，与托洛茨基进行会晤。我听说，托洛茨基很高兴同这位老乡一起回忆童年的生活情景，彼此用俄语交谈，谈得津津有味。大约在1932年六七月间，奥平同苏联驻巴黎的使馆进行谈判，要求重返俄国。结果，他获准回到哈尔科夫定居，他在那里有一些亲戚。他是个背叛者还是一个特务呢？

亚伯拉罕和鲁文兄弟俩是立陶宛的犹太人，两人用的假名：一个叫亚伯拉罕·谢宁；一个叫罗曼·威尔。1929年，他们作为来比锡的一个德国托派团体成员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现在知道，那时他们已经成了格伯乌的代理人。他们是1927年被招募进去，并接受训练的。1930年4月26日，谢宁写信给托洛茨基说：“您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我从柏林写信给您？事情是这样的：我同我的妻子正在柏林度假，有两周时间。我妻子是苏联公民，而且是个党员。在苏联驻柏林的商务代办处工作。她的单位和党组织并不知道她是我的妻子。这就是她尚未丧失职位的唯一原因。”这件事本身以及他们故意装出的一副诚实样子，同雅各布·弗朗克的情况是何其相似啊！

索波列维奇兄弟俩在这个国际托派组织中崭露头角，受到重用。威尔负责《反对派通报》德文版的发行工作。不久，廖瓦又逐渐把在俄国本土及其边境小国发行杂志的任务也委托给威尔。这样问题就更严重了。兄弟俩还参与了德国托派团体的领导工作和国际书记处的工作。他们善于利用托派内部的派别斗争来抬高自己。由于在托洛茨基周围的人都反对纳维尔，因此，他俩都很快变成了最彻底的反纳维尔分子。1930年12月2日，雷蒙·莫利尼尔给廖瓦的信中写道：“罗曼·威尔对纳维尔恨之入骨，现在密尔（即奥平）对纳维尔也视作眼中钉了。”

1931年8月，威尔和谢宁一起前往土耳其拜访托洛茨基。1932年11月，谢宁又在哥本哈根拜会了托洛茨基。1932年12月，在德国托派团体内的分歧和争论日益频繁之际，威尔和谢宁乘机把纷争带进了部分组织中。德国托派团体办了一份小报，名叫《不断革命报》。1933年1月威尔和谢宁在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制造一起假的论战，并把争论点用印刷体登在报头上，于是德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就把要求恢复斯大林主义的这一伪造争端加以转载，并配上相应的评论。因此，在希特勒上台执政的前夕，德国托派团体正处于混乱之中。

令人惊讶的是，在1931~1932年这两年炽热的政治气氛中，德国托派团体竟无所进展。他们取得的成绩与法国托派在1934~1936年同样激烈的政治环境中所取的进展真是无法比拟。在德国，托派团体处于停滞状态，然后发展到彻底瓦解。这可以找到很多原因，但其中主要因素恐怕就是索波列维奇兄弟俩从中捣鬼。然而，1933年1月5日托洛茨基给雷蒙·莫利尼尔信里竟对这种局面作了这样的解释：“威尔把每句口号、每篇文章、每个行动都搅混了，因而阻挠了德国反对派取得进展，而要想当面指责他，的确很困难，因为他决不是一个做事有条不紊的人。”

多么奇怪的描述！更奇怪的是他并不认为威尔是个职业特务，而只是把他看成是个背叛者。可是威尔当时的一些做法完全是一个职业特务在那种环境下所惯用的策略。托洛茨基对此作了准确的描述，然而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例如，他在1933年1月14日给德国托派团体领导人的信中说：“德国左翼反对派在遭受威尔之流混乱思想和有害手段的严重影响下竟然还有这样的成就真是令人费解。”1933年9月26日，

他在给希腊托派分子维特的信中提到，在维特集团里存在着“威尔——谢宁分子”。可见，托洛茨基仍然是从政治上的宗派主义角度着眼，而不是从职业特务方面去看威尔的所作所为。

大约就在1936年第一次莫斯科审判期间，索波列维奇两兄弟突然销声匿迹了，这使托洛茨基有再次的机会去注意这两个人。莫斯科审判案中的一名被告瓦连廷·奥尔贝格，此人前几年一直在德国托派团体中鬼混。托洛茨基在1936年8月22日给廖瓦的信里提到这个情况：“例如奥尔贝格，就可证实我们的设想。这些诉讼中的所有证人都是格伯乌雇用来的，在这些人中间，有的曾经竭力巴结左翼反对派，或者至少有这种企图，这些人或许早已是格伯乌的特工人员，或是一些青年野心家，想在左翼反对派中谋取一官半职，而后又为了向上爬背叛了左翼反对派，诸如此类。这种人已经发现了好几个（如巴黎的密尔、威尔和谢宁两兄弟、格拉也夫等等）。”托洛茨基在同一天写给廖瓦的另一信里说：“有必要搞清楚密尔、威尔、谢宁、格拉也夫等人的底细。这些人跟我们关系密切，因此要了解一下，在起诉书中出现的那些陌生名字的背后是否就是这几位。这样就能揭露他们的特务身分，识破他们的庐山真面目。”

大约在1935年，谢宁回到俄国呆了一段时间。他在那里帮助格伯乌对已被驱逐的托派分子亲属采取报复行动。在西班牙内战初期，有人报告说，威尔在图卢兹和巴塞罗那两地穿梭来回，1937年在巴黎的雷蒙·莫利尼尔，那时已被迫不再经商了，而当了一名出租汽车司机。有一天，他正好看到威尔（他们彼此熟识）钻进停在他前面的一辆出租汽车里，身旁有四五个彪形大汉陪伴着。于是，莫利尼尔就跟踪着威尔乘坐的汽车穿越

了巴黎的许多条马路，直到拉克雷泰尔街，停在廖瓦住的那幢公寓大楼门口，威尔及其一伙下了车。莫利尼尔看见他们进了离廖瓦寝室很近的一个房间里。莫利尼尔立即奔向廖瓦的房间去报告这一情况，可是给他开门的却是祖博罗夫斯基，他不让莫利尼尔进去，而对莫利尼尔说：“我们会留意的，这不关您的事。”当然啰！

大约在1934年和1936年间，有一次我从托洛茨基那里回到巴黎，发现祖博罗夫斯基已成了法国托派团体的一名成员，并且成了廖瓦的助手。但我已记不清第一次同他会面时的情景。托派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深有浅，有的彼此亲密无间，有的彼此仅仅是工作上的联系。我同祖博罗夫斯基的关系丝毫谈不上亲热，他那副阴沉的、老是紧锁的脸双眉以及他的平庸气派，对我没有多少吸引力。但是我对他并未产生特别的怀疑。廖瓦对他很信任，几乎每天同他碰头，一起工作，一起聊天，彼此用他们共同的母语——俄文交谈着。

祖博罗夫斯基通过法国托派团体找到了接近廖瓦的途径，由于他自称是一个倾向托洛茨基主义的大学生，从而加入了托派团体。让娜听说他会俄语，于是就把他介绍给廖瓦。祖博罗夫斯基所用的策略与威尔的策略大相径庭。后者在德国扮演了一位政治领袖的角色。在政治上他表明自己的立场，在团体内搞派别活动、耍两面手法。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这个托派团体陷入混乱。1932年12月21日，托洛茨基给雷蒙·莫利尼尔的信中就提到了威尔的这些表现：“威尔精明能干，他善于争取工人群众的支持，为了使这场危机公开爆发，他不得不知去伪装。”祖博罗夫斯基在法国托派团体内，情况迥然不同。他就像一只耗子，决不做抛头露面的事情，他总是随声附和多数。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个人的存在。

他和廖瓦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我只能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观察到一些现象。我跟廖瓦见面时，祖博罗夫斯基不在场，我和祖博罗夫斯基见面时，廖瓦不在场。我看到他们在一起大约只有一两次吧，但是我有一个确定的印象：祖博罗夫斯基从不向廖瓦提出那种会引起争论的政治问题，或把谈话引向一个严肃的话题。他很愿意帮助人，能不折不扣地完成廖瓦交给他的任务，除了卑微、没有气派外，你在他身上简直挑不出什么毛病。

威尔和谢宁在希特勒上台执政前夕就暴露了真面目。在随后出现的政治动乱中，他俩很快被遗忘了。建立新国际的动向开辟了一个新的前景，人们的眼光不是盯住过去而是注视着未来。1932年10月，奥平·密尔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承认他和廖瓦都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对某些人过分重用，他们唯一的长处就是会讲俄语。这种认错虽然尚属肤浅，可是在威尔和谢宁问题上，他甚至还没有认识到这种错误。托洛茨基对过去只作了简单的反省，过了一两年在祖博罗夫斯基身上他们又故态复萌，重演过去的错误，牢牢抓住他，委以重任，很快就把《反对派通报》发行名单交给他负责保管，把什么事情都委托给他。

托洛茨基确实经常提醒他周围的人要谨慎小心。1932年六七月间，我把我的护照让雷蒙·莫利尼尔带到柏林去交给廖瓦，万一发生意外，他可以携带这张假护照离开德国。后来在普林吉坡岛时，我把这件事告诉托洛茨基。他反而不高兴，他说：“假如我病倒了，他们会把我送到伊斯坦布尔的医院并让我入睡。当我入睡时，我就会说出护照的事！”1935年10月10日，托洛茨基给廖瓦的信里说到：“格伯乌一定会千方百计弄到我的档案材料。”后来虽然发生了米夏莱大街的盗窃事

件。但这一切忠告也只是说说而已，正如托洛茨基虽然经常要埋怨印刷上出现的错误，可是校对的事情照样还要别人代劳，他对待别的琐事也是如此，他的十足的贵族气派使他不肯插手这类小事。

有一次托洛茨基告诉我，列宁就是在担任政府首脑以后，也还喜欢亲自书写他准备邮寄的信封。由此可见列宁对小事也很关心，不像托洛茨基总是喜欢依赖秘书。尽管列宁不会轻信别人，但还是受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的欺骗。这说明，用一个人的个性来解释事情发生的原因是要特别谨慎的。虽有这样的保留，但必须指出，托洛茨基除了对琐事不屑一顾之外，还对自己的思想观点过分自信，具有知识分子的狂热。他相信自己的思想在适当的时候一定能够征服人心。比如，1938年春天，我们想物色一名俄文打字员，因为莉达要回国结婚，萨拉·雅各布有她自己的工作也不能久留。我们写信给国外的一些朋友请他们帮忙物色。结果捷克同志来信答复，说有一位年轻的捷克女士，精通俄语又会俄文打字，愿意去墨西哥工作，但唯一的缺陷是她可能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我走进托洛茨基的书房把这一消息告诉他，他用左臂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手势说：“让她来！我们可以把她争取过来嘛！”

1938年5月14日，托洛茨基在给纽约的扬·弗兰克尔的信中谈到了这位女士：“她是一位18岁的妙龄女郎。我不相信她会是一个可怕的格伯乌特务，即使她对斯大林分子有某种同情并对我们怀着某种邪恶企图（我想不会有人把一个恶魔的计划委托一个没有社会经验的女孩去完成）。我们也有足够能力监视她、控制她，对她进行再教育。”1938年6月18日，托洛茨基再次写信给弗兰克尔：“如果这位捷克姑娘是一个称职的打字员，我打算长期雇用她。在这件事情上政治觉

悟并不十分重要。一个 18 岁的姑娘不可能在我这里施展什么阴谋诡计。我们有很强的力量,过两三个月,她就会被我们完全同化的。”他对自己的观点多么自信!然而,当你知道当今社会上人们的所作所为,那么你读着上述的信件时就会感到不寒而栗了。另外看来,托洛茨基对 18 岁少女的心态了解也是相当肤浅的。

由于纳维尔对祖博罗夫斯基表示怀疑,托洛茨基就写了一封回信对他说,“你想剥夺我与人合作的权利”,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思想方法。1929年布鲁姆金到普林吉坡探望托洛茨基时,托洛茨基把一封给莫斯科反对派成员的亲笔信交给他带去。这种信是否真能送到收信人手里呢?

虽然在巴比仲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向报社发表声明自称“是一位老资格的地下工作者”,但两星期后,他自己就破坏了秘密工作的规则。1934年4月底,他住在沙莫尼的一家旅社,与法国当局的关系处在岌岌可危之中,法国政府正打算对他的命运作出决定的时刻,他却开始草拟一份反战提纲,打算以国际书记处的名义发表。如果说有什么需要保密的文件,那就是一份机密文件。而托洛茨基却把一张草稿扔进客房里的废纸篓里,结果落到了警察局手里,多亏亨利·莫利尼尔的机智才没把事情闹大。

至于廖瓦同他父亲的关系,说来也很微妙,他俩有时都会耍一些外交手腕。廖瓦向托洛茨基汇报情况,往往掐头去尾,有所保留。比如,1936年11月6日晚上,格伯乌窃取了托洛茨基存放在巴黎米夏莱大街一个公寓里的那部分档案资料。法国警方认定,这伙窃贼的本领非同一般。格伯乌是通过祖博罗夫斯基事先了解到米夏莱大街那个住所里藏着什么。被窃以后,廖瓦就写信给他父亲,谎称被窃取的材料大部分是各

国托派团体以各种语文出版的报纸资料。难道说，格伯乌从莫斯科派了一批盗窃能手仅仅为了窃取他们早已了如指掌的那些报纸吗？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不管怎么说，廖瓦对祖博罗夫斯基轻信是令人吃惊的，在几年时间里他俩几乎每天碰头。他们之间没有语言上障碍。但人们至少可以发现，祖博罗夫斯基不具有一个革命者的气质。他靠拢廖瓦，可从不暴露自己的思想，让人捉摸不透。

1936年12月，廖瓦和我收到了关于挪威政府处理托洛茨基问题相互矛盾的消息。我发现我的旧护照上有德国签证的痕迹，没有使用过，它是12月22日批准的。我本来可以早几天申请，因为廖瓦要我马上去挪威奥斯陆会见托洛茨基，并陪送他去墨西哥。最后我们听说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已于12月19日乘船前往墨西哥。情况一旦弄清，廖瓦就要我去墨西哥。墨西哥驻巴黎的领事馆官员们，已经接到墨西哥总统卡德纳斯的指示，所以对我很客气，把去墨西哥所需的一切证件当即发给了我。我记得在动身前夕，还曾专门到圣热纳维埃夫图书馆去查阅大百科全书上有关墨西哥的条目，以便多了解一些该国的情况。

第四章

最后的旅程——墨西哥

1936年12月28日，我在瑟堡市登上澳大利亚女皇号客轮前往纽约。时值严冬，偌大的轮船乘客却寥寥无几。船上有一群从欧洲旅行后返回美国的大学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美国的年轻人。我觉得他们生气勃勃，性格开朗。

我在纽约住了几天，会见了几位美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我特别记得那次在詹姆斯·伯纳姆家里吃饭桌上还点着蜡烛，觉得有点古怪。那几天我住在哈罗德·伊萨克的寓所里。1月初正是暴风雨季节。我从纽瓦克乘班机前往墨西哥城，但是飞机到小石城或者孟菲斯降落后就不再起飞了，因为整个西南部都受到暴风雨的袭击。于是我只好改乘火车，穿越这冰天雪地的大平原，直到拉雷多以后我又改乘班机飞往墨西哥城，于1月11日中午着陆。我在机场雇了一辆出租汽车前往科约阿坎小镇。该镇的隆德雷斯街上有一幢蓝色的房屋，周围有警察站岗。我在那里见到了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他们于1小时前刚从坦皮科到达这里，我向他们汇报了巴黎的近况。

刚从挪威牢房里释放出来的托洛茨基兴高采烈，渴望重新工作，必须在这个使用陌生语言的陌生国家里尽快地建

立起新的秘书班子。我的首要任务是物色一名俄文打字员。1月16日，莉达·雅可夫列芙娜，这个非常称职的打字员前来报到上任了。

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正在这几天开演。这回审判的是拉狄克、皮达可夫、穆拉洛夫、索科尔尼科夫，还有其余10几个人。每天报上都登载有关审判的报导。托洛茨基就著文揭露莫斯科的种种阴谋诡计。每篇文章都必须迅速译成英文和西班牙文，然后分发给各大通讯社和墨西哥的各家报社。每天晚上，我得跑遍墨西哥城各大报社，把托洛茨基当天的声明交给这些编辑先生。

第二次莫斯科审判案中一个伪造的罪名，是皮达可夫曾于1935年12月飞抵挪威去会晤托洛茨基。挪威官方披露当时由于气候恶劣，奥斯陆机场是关闭的。1月29日，托洛茨基对我说：“就像贪食会引起腹泻一样，关于皮达可夫飞抵挪威的杜撰可能正是导致斯大林垮台的开始。”1月31日，皮达可夫被处决的当天，托洛茨基又对我说：“这将使斯大林失去一切。”他的观点简略得出奇。但无疑他还在思考着斯大林的为人，同一天他还说：“耍阴谋诡计是智力低下的表现。”

迭戈·里维拉把座落在科约阿坎镇隆德雷斯街上的一幢蓝色别墅供托洛茨基使用。迭戈和他夫人芙莉达·卡洛则住在二三英里处的圣安琪寓所里。迭戈和芙莉达对托洛茨基十分殷勤。不久，我们会见了墨西哥托派团体中最积极的成员，他们大部分都是青年教师和青年工人，其中二三人还每天晚上来这里担任警戒。这样我在白天工作后才能得到休息。一个名叫安东尼奥·伊达尔戈的墨西哥高级官员，是墨西哥政府与托洛茨基联系的中间人。他很快成了我们的好朋友。他为人正直、性格开朗，曾参加过墨西哥内战，托洛茨基和娜

塔丽娅都很喜欢他。当遇有什么问题需要通过某个官员才能得到解决时，我就到他的办公署找他帮忙；他总是有求必应，鼎力相助。

2月初，我们和伊达尔戈一起到他的同事博霍克斯的乡间别墅住了二三天。那地方靠近库埃纳瓦卡。博霍克斯也是墨西哥的一位高级官员。虽说他是伊达尔戈的朋友，但对我们不是很热情，托洛茨基对他也只是礼节上的应酬。在博霍克斯别墅逗留期间，我们曾去附近的穆希卡牧场拜访了一整天。穆希卡的官方职务是墨西哥交通与公共事业部部长。他是卡德纳斯总统的知交和得力助手。由于卡德纳斯是国家元首，不便亲自接见托洛茨基，所以由穆希卡出面接待也可谓是权宜之计吧。穆希卡是个很有学问的人，他的外貌与托洛茨基有几分相像：高高的前额，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很乐于同托洛茨基交往。这次会晤，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十分热烈，对方谈到了墨西哥及其经济和社会问题，但没有涉及到具体事务。

2月16日，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去纽约马戏场召开了群众大会，托洛茨基打算在墨西哥通过有线电话向大会发表演讲，既讲俄文，也讲英文。那天下午，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我，得到墨西哥市电话公司允许，被带进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放着一只话筒。一位工程师向托洛茨基说明使用话筒时的注意事项。可是在数小时内，故障出了好几次。线路被接通后，托洛茨基刚要说话，线路就中断了，最后我们只好作罢。当时我还不熟悉墨西哥的情况，假如当时有经验的话，是可以找到应急办法的。结果，在纽约的马克斯·沙赫曼从口袋里取出托洛茨基英文讲稿，就当众宣读起来。这一招是我们的预防措施，开会前几天就把讲稿寄去了。1937年，电话通讯的质量和可

靠性当然没有达到今天的水平。但我们毕竟在工程师协助下进行了电话交流。我一直在怀疑，通讯中断是否由于俄国特务或是美国当局从中捣乱。

扬·弗兰克尔于2月19日从捷克斯洛伐克来到墨西哥。美国托派团体的一位成员伯纳德·沃尔夫也来到这里担任了英文秘书。托洛茨基同这一秘书班子共事了很长时间。那时他的工作十分辛苦。

托洛茨基抵达墨西哥后不久，他要求组织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就莫斯科审判中对他及其儿子的指控进行调查。这一计划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当时，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答应作为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甘愿效劳，甚至同意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内除了6个美国人之外，还有1位法国人(阿尔弗雷德·罗斯麦)、2位德国人(奥托·吕勒和温德林·托马斯)、1位意大利人(卡洛·特雷斯卡)、1位墨西哥人(弗朗西斯科·萨莫拉)。苏珊娜·拉·福列特担任委员会的秘书，是最积极、最勤奋的一员。

2月，一位美国作家华尔多·弗朗克来到墨西哥。他跟美国和拉美国家中的一些亲斯大林分子有交往，但是莫斯科的几次审判使他感到困惑不解，他就写信给托洛茨基要求进行采访。托洛茨基在作决定以前，派我先去城里同弗朗克会面，以便试探他来访的动机。我在旅馆的休息室里见到了弗朗克。经自我介绍，他知道我是法国人，就说：“你应该知道，我是美国的安德烈·纪德。”他先后两次访问了托洛茨基。他们的谈话虽然很友好热烈，但最后一无所获。弗朗克收到了杜威从纽约发来的邀请信，要求他继续留在墨西哥，以便参与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可是当该委员会的代表来到墨西哥时，他却找了一个借口而回避了。

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于4月到达墨西哥听取托洛茨基的证词,并对他进行查询。4月10日至17日,在隆德雷斯街住宅的大客厅里举行了听证会,约有40名记者出席,同时还邀请了一些来宾。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安全保卫工作就成了大问题。

小组委员会的听证工作迫使托洛茨基周围的工作人员日夜加班,忙得不可开交。当年离开莫斯科时带走的、后经阿拉木图和普林吉坡两次搬迁一直没有触动过的大批档案材料,这回还是第一次拆封应用。为了找到有用的旁证材料,我们不得不查阅大量文件。委员会还从世界各地收集了几十份莫斯科审判中炮制出来的假口供,其中许多供词都出自托洛茨基的政敌之口,为了得到这些资料得化很大的力气。这些供词不仅要翻译出来,而且还要加以注释,以便让公众、尤其是让委员会成员能够理解。有无数细节还得进行澄清、解释、调整。不用说,在这次工作中,不允许有任何伪造和隐瞒,也不能有任何偏向。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都像着了魔似的拚命地干。每天早上所有的人都会聚在托洛茨基的书房里,接受任务。人们感到托洛茨基又像当年十月革命期间那样成了革命的组织者。

与委员会成员的联系以及对大批前来墨西哥的美国托派分子的接待,全由扬·弗兰克尔负责,因此他要化很多时间到市里去。有一天托洛茨基走进弗兰克尔的卧室,向他要某个文件,而文件没有弄好,托洛茨基就回到自己的书房,使劲儿关上房门。那是一扇拼花玻璃门,年久失修,玻璃上的油灰早已脱落,由于用力过猛,方形的玻璃片雨点般落下。这碎玻璃的声响传遍了整幢楼房。

关于杜威委员会历次会议的活动情况和许多照片,都已

在报上公布过，我不需作多少补充。委员会活动接近尾声时，托洛茨基在会议间歇时与杜威在院子里有过一次交谈。杜威说：“托洛茨基先生，如果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像您那样，我将愿意做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于是托洛茨基回敬他一句：“如果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像您杜威先生那样，我将愿意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两人谈笑风生，气氛活跃，但多少带有几分外交辞令。当时，托洛茨基很欣赏杜威的果断性格，但数月后，该委员会的结论意见在电台公布后，杜威又补充了个人的意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了批判，这就引起了托洛茨基的恼怒。

在住宅洗澡间里浴缸上端的墙上挂着一幅油画，可能是芙莉达在布置房间时挂上的。这是一幅19世纪西班牙裸体画，画面上已染上了一层薄薄的深色釉彩，但至少让人可以看出它是一幅裸体画。在委员会开会期间，委员们和记者们，都要使用这个住宅里唯一的浴室。在第一次会议的前一天，油画不见了，原来是托洛茨基要娜塔丽娅取走的。后来会议结束后，油画又出现了。这件小事说明托洛茨基对记者最不放心，他决意不让他们抓住任何话柄去造谣生事。但这回他未免做得有些过分，因为很难想象，一个美国记者，即使是一个心怀敌意的记者，会在这幅已被损害的油画上制造什么新闻。

芙莉达是一位出色的女性，她漂亮、大方、有个性、有才学。她对托洛茨基的态度一开始就很随便。她不大会讲法语，可英语说得很流利，那是因为她在美国住了很长时间，当时她的丈夫迭戈在美国画壁画。所以她常常用英语同托洛茨基交谈，而娜塔丽娅却一点也不懂英语，她就只好靠边站了。芙莉达像美国人那样毫不顾忌地用“love”（爱）这个字眼。她在

告别时，就冲着托洛茨基说“我亲爱的”。托洛茨基显然被芙莉达吸引住了。于是就开始给她写信，常常把信夹在书里，当着别人的面，包括当着娜塔丽娅和迭戈的面，把书交给芙莉达，并说一番推荐的话要她读这本书。当时我对个中奥秘一无所知，只是到了后来芙莉达就才我说出了真情。

所有的这一切都发生在杜威委员会调查结果后的几周内。到了6月份由于两人过分密切，这种局势让人感到忧虑，娜塔丽娅默默地忍耐着，而迭戈似乎还一无所知。因为他是个有名的醋坛子，只要稍有一点怀疑就会引起一场风波。要是发生这种丑闻，准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影响。我记得，扬·弗兰克尔曾斗胆向托洛茨基进言，指出目前的局势潜伏着一种危险。

7月初，为了缓解两人的紧张关系，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决定双方暂时分居一段时间。7月7日，托洛茨基来到了一个农场主朗德罗的庄园住下。朗德罗跟安东尼奥·伊达尔戈和迭戈都是知交。他的庄园位于圣米格尔——雷格拉附近，离开墨西哥城有90英里，托洛茨基在那里，可以钓鱼、骑马。与他作伴的是赫苏斯·卡萨斯。此人是警察中尉，带领着一个警卫排驻守在隆德雷斯街。那里还住着一位西斯托，他是迭戈夫妇的汽车司机。娜塔丽娅仍住在科约阿坎。

7月11日，芙莉达到庄园来看望托洛茨基，我猜想正是在这次访问中他俩决定终止彼此间的暧昧关系。在此之前，两人一直沉缅在情网之中。根据当时的情况来看，两人的行为不可能过于放肆。毕竟中间横着很高的栅栏。这对情侣终于后退了。于是芙莉达仍然深深地爱着迭戈，托洛茨基也同样爱着娜塔丽娅。不过，要是这件事传扬出去，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娜塔丽娅得知芙莉达去庄园一事写信给托洛茨基，要他对此作出解释。托洛茨基则刚好作了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同芙莉达一刀两断。他回信给娜塔丽娅，说她提出的问题是“愚蠢的、可鄙的、自私的。”但是他还是承认，娜塔丽娅是他的牺牲品，并且宣称他正在流着“同情、忏悔、痛苦的眼泪”。于是他们在分开的3个星期里不断地交换着书信。

自从与芙莉达断交后，托洛茨基感到自己对娜塔丽娅的柔情密意又恢复如初了，可以从他当时所写的信中证实他对她的爱恋之情。但是另一方面，这些信也暴露了一个令人痛苦的阴影。出于某种心理机制，托洛茨基为了减轻对娜塔丽娅的负咎感，就指责娜塔丽娅曾对他犯有不忠的行为。这也许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经过一阵犹豫以后，他第一次挑明了这一问题：“我是以耻辱、自我悔恨的心情给您写这封信的。”接着语气就变得更辛辣了。托洛茨基向娜塔丽娅提出，布尔什维克政府成立初期，她在公共教育人民委员部工作时同一个青年助理是否有不正当的关系。那是20年以前的事情，那位助理曾追求过娜塔丽娅，但她并未以任何方式答应过他的求爱。一场激烈的争吵终于爆发了。但不是在信里，而是在电话里。7月21日托洛茨基从帕丘卡打电话给娜塔丽娅发泄他的妒忌。他在电话里，为了这20年前子虚乌有的爱情纠葛，用俄语大声地训斥她。娜塔丽娅气得浑身发抖。事后，她立刻写信给托洛茨基，信中说“我的儿子不信任我，他对我失去了信任……这是您的骄傲”。托洛茨基在挂断电话后，如释重负，他写信给娜塔丽娅说：“我想我会平静下来的。不管怎么说，我能够耐心等待，直到我们再次重逢。”

这种争风吃醋显然不是第一次。托洛茨基在信中说他是“旧病复发”，他把这种“痛苦”看作是一种周期性发作的热病。

1903年，他与娜塔丽娅相好时，娜塔丽娅原先有一个恋人，是经过一阵犹豫后才决定遗弃的。托洛茨基死后，她向一位朋友披露说：“他从来没有宽恕过我，对于这件事他老挂在嘴边。”

1937年7月那段日子里，娜塔丽娅又无意中给托洛茨基以一个沉重的打击。7月18日，娜塔丽娅给他写信说：“从内心说，每个人都是非常孤独的。”这句话在她看来是很平常的，但是托洛茨基却感到震惊。他写回信说：“这句话像一枚针深深扎进了我的心坎里。”他所以会有如此反应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特殊的；另一个是一般的。第一，这句话暴露了娜塔丽娅的孤独感；第二，这句话违背了托洛茨基的共产党人的信念。

最后，托洛茨基与娜塔丽娅之间的通信还表明，在双方感情的折磨中出现了情欲的复苏。7月19日，托洛茨基用了一句俄国土语向娜塔丽娅透露了自己情欲方面的冲动。他以最粗俗的语言向她详细叙述了他在睡梦中如何与她交合求欢的情景。

7月26日或27日，托洛茨基返回科约阿坎。我为了割阑尾于7月17日进了墨西哥城的一家法国医院。因此，托洛茨基返回时，我大概不在隆德雷斯街的寓所。这里的生活又一切照旧了。在一个局外人看来，托洛茨基、娜塔丽娅、迭戈、芙莉达，这4个人之间的关系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只是看到托洛茨基和芙莉达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再也听不到“亲爱的”这类词语了。最显著的不同也许是在娜塔丽娅对待芙莉达的态度上，时而冷淡，时而亲热。托洛茨基要求芙莉达把过去写给她的信归还给他，理由是：“免得这些信落到格伯乌的手里。”她把这些信归还给他后，他就当众把信销毁了。

就在这一次，芙莉达把事情的内幕告诉了我。

我可以肯定，托洛茨基与芙莉达的恋情是他离开俄国以来的第一次冒险。他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客观上都不允许这样放纵自己。他与芙莉达的关系中断后不久，又悄悄地陷入了与另一位年轻女子的情网。我对此事将在下文另作交待。据我在墨西哥所见的来判断，托洛茨基对芙莉达和另一位女子所采取的手法是大胆的，而且是驾轻就熟的。

我相信，在托洛茨基的一生中这类风流韵事是不少的。早在1920年，克拉勒·谢里丹曾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为托洛茨基塑像，托洛茨基在跟她言谈中和对她的态度上常常表现出某种挑逗的成份。我还从一个同托洛茨基没有私交的人那里听说，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期间，曾经跟一个金头发、白皮肤的英国女郎有过私情，但是关于这一传说的详情我就无从打听了。

伯纳德·沃尔夫于8月返回美国。9月底，另一位美国人约瑟夫·汉森来到这里。在他到达的那一天，或许第二天，我们抽出时间去拜访了费尔南德斯。他住在墨西哥城郊外，他的3个儿子都是墨西哥托派团体的成员。他们全家对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都很仰慕。托洛茨基也很喜欢同他们作伴。我们驱车前往时，由乔（约瑟夫的爱称）驾车，我坐在他身旁，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坐在后排。因为乔不熟悉墨西哥的街道，我得给他指点方向。每当十字路口，我就发出指令：“往右拐”、“往左拐”、“一直向前”。我们在这次拜访后的第二天，不知为了一件什么事，不得不再去费尔南德斯家访问。这样接连两天上门访友，实在是不寻常的。由于路程远，道路又曲折，要让乔一下记住这些道路是难以想象的，所以我就照昨天那样给他作向导，指示他“向右”、“向左”、“向前”。我们一行返回科

约阿坎以后，托洛茨基把我叫到他的书房里问我：“看来我们得把乔打发走，让他回美国，你说呢？”我感到惊讶，托洛茨基大声说：“此人教不会！”我为乔作了辩解，说明其中的困难。托洛茨基不以为然地说：“那么让我们走着瞧吧！”而事实上，在所有来科约阿坎工作的美国人当中，乔是托洛茨基与之相处最好、最受器重的一个。

10月底，扬·弗兰克尔动身去美国。11月初佳比带着我们的儿子从法国来到墨西哥。虽然她是法国莫利尼尔派的成员，但她答应在墨西哥期间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她在科约阿坎定居下来后，就帮助娜塔丽娅料理家务，像在巴比仲时曾经干过的那样。

佳比来到这里已有几个星期了。有一天，她跟娜塔丽娅和一个年轻的墨西哥女佣在厨房准备午饭。当时，娜塔丽娅还不太会讲西班牙语，对西班牙文几乎一窍不通，只好用手势和简单的词语来表达意思。常常用手臂去拉扯女佣让她明白该怎么干。这天早上，为了某件事情，佳比觉得娜塔丽娅对待女佣过于严厉，就当面指了出来。佳比这种直率的说话方式在巴黎是很平常的。当然她作为莫利尼尔派成员对托洛茨基夫妇也抱有某种敌意，现在这种情感就全部倾泄出来了。原先她俩在厨房一起干活时也常常发生摩擦，这次终于表面化了，双方都拉开了嗓门。这时，托洛茨基正好从书房出来，准备到洗澡间去，走过厨房门口，听到争吵声就进了厨房，看到了这一幕，他大喝一声：“你们闹吧，我要去叫警察了！”虽然他没这么做，但毕竟说了许多刺耳的话。

当天中午，我独自在整理报纸，托洛茨基进来看我，说了一句：“今天我不应该说这些话。”他以一种含糊的、似乎是羞怯的方式承认了他的失态。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感到窘

困的样子。但不管怎么说，佳比不可能继续住在这里了，于是她带着儿子途经纽约返回了法国。

1937年11月12日，托洛茨基要我发出如下的一份电报：

巴黎 肖当总理

基于伊格纳兹·雷斯的被杀、本人档案被窃以及诸如此类案件，我坚决要求当局对老资格的格伯乌代理人、国会副议长雅克·杜克洛至少作为证人进行审讯。 托洛茨基

这“老资格”一词显然说明，托洛茨基知道杜克洛同格伯乌的关系，因为托洛茨基一直是苏联政府的一名要员。这就是说，他正在泄露一项国家机密。这份电报在托洛茨基分子的队伍中引起了喧嚷，尤其是廖瓦认为其父拍发这份电报是一种失误。

在1937年，我们好几次接到纳维尔的来信告诉我们，安德烈·纪德打算来墨西哥，而结果总是一再推迟动身日期。11月，看来纪德的计划更为肯定了。托洛茨基试图防止他最后的动摇，曾一度想写信给纪德告诉他墨西哥方面将向他提供多少钱，但他没有那样做，因为他想到纪德很可能把这封信看作是对他的收买。于是就采取了比较间接的办法。托洛茨基起草了一封信，开头就称呼他“亲爱的文学大师”，并详细列举了吸引他来墨西哥的一切事物。他还准备请几位墨西哥艺术家和作家联名写信邀请，其中有迭戈·里维拉、萨尔瓦多·诺沃和卡洛斯·佩利塞。我记不清这封信后来是否发出，但如果发了也无济于事。因为我们不久获悉，纪德突然改变了计划去了非洲。

这所座落在隆德雷斯街的住宅，屋前有一个院落，前后有花园，另有几间小屋，正好构成了一个标准的长方形。

的两边是两条平行的马路：隆德雷斯街和柏林街。另一边是与这两条马路垂直相交的卡耶街。临街的所有窗户都用砖坯堵塞。这所住宅的另一面与另宅接壤。住宅四周都有高墙隔开。这样做弊多利少，因为屋内人看不见屋外的动静，而且墙紧挨着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的卧室。这种格局使迭戈·里维拉和我总是提心吊胆，我们常会谈到这个问题。

而托洛茨基关心的是另一码事。1937年将近岁末，墨西哥的斯大林分子们掀起了一场侮辱威胁托洛茨基的运动，而且越来越凶猛可恶。托洛茨基曾设想过，突然有一天在隆德雷斯街和卡耶街转角处，可能聚集数百人来袭击这所住宅。他们会装作政治示威的样子，而目的是要结果托洛茨基的性命。一天，托洛茨基向我详细交待了他的防卫计划。这计划需要准备一把扶梯，放在沿柏林街后花园的墙角下。那条街杂草丛生，很少有人经过。那里晚上光线暗弱，有时简直伸手不见五指，从外面根本看不清我们这所住宅的占地面积有多大。万一有人来冲击，托洛茨基可以爬上扶梯，一个人翻过墙去，悄悄溜进我们认识的一个墨西哥少妇家里藏身。那妇女就住在这所蓝屋不远的一幢房子里。爬墙是值得的，看来是个聪明的办法。几天后，托洛茨基建议我搞一次演习。到晚上他就爬上扶梯，翻墙出去到少妇家里。不过后来我听那少妇说，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托洛茨基曾经三番五次向她提出过非份要求。她只是不理他，但也没大声嚷嚷。尤其可笑的是，他还向这少妇透露这越墙的办法和演习的真正意图。这样，事情就被他弄得面目全非了。这种安全措施竟然与爱情冒险连结在一起，不能不让我感到扫兴。虽然我嘴上没说什么，但托洛茨基也许已经觉察到，我对此事已失去了积极性，因此他不再坚持这种演习了，况且形势不久又有新的转折。

与我们相邻的住宅近日出现一些陌生人和其他种种迹象越来越引起迭戈·里维拉和我的怀疑。里维拉为了表示自己的慷慨大度,决心把隔壁那幢住宅买下来,然而这笔交易需要花好几个星期。于是这几个星期成了危险的日子,因为,如果有人真想干掉托洛茨基,那么他就得在房子转让以前下手。最后我们采取这样的办法:在房子没有到手以前,把托洛茨基转移到洛马斯—查普尔特佩克区的安东尼奥·伊达尔戈家里暂住。那里是墨西哥城上流社会人士居住的区域。与此同时,要想方设法不让外人知道托洛茨基离开科约阿坎住宅的真相。

于是在1938年2月13日,托洛茨基悄悄钻进停在后花园的汽车里,躺在座位下面,由我驾驶汽车,待大门开启我就急速地驶过警察的岗亭,并亲切地向他们挥挥手,就像我平时单独驾车匆忙离去时所做的那样。接着托洛茨基站起身子坐在后座上,汽车就直驶伊达尔戈家。

那所住宅非常舒适。家里没有小孩,只有伊达尔戈夫妇俩。他们对托洛茨基殷勤招待,托洛茨基则整天看书写作。在科约阿坎,娜塔丽娅在床上放置着枕头,装成托洛茨基还在的样子。这就像35年前托洛茨基从西伯利亚逃脱时,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①所做过的那样。仆人等都不许进这个房间,娜塔丽娅还得经常从厨房把茶水端进去服侍这位据说是患病的托洛茨基。科约阿坎与查普尔特佩克之间的联系由我或者伊达尔戈来维持。

正在这个时候,即2月16日传来了廖瓦去世的消息。由于时差的关系,消息传到科约阿坎时已是午饭过后了。我记

^① 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是托洛茨基的前妻。——译者

得，这消息是美国某大报社的一位代理人用电话告诉我们的。当时在场的有乔·汉森、拉厄·施皮格尔和我。我们决定不告诉娜塔丽娅，也不让她看到报纸，不让她接电话。我就立即到圣安琪去找里维拉。在那里，我们打长途电话同巴黎的一位朋友通了话，大约是热拉尔·罗森塔尔或者是让·鲁，接着，我和里维拉驾车前往查普尔特佩克。

当我们进入托洛茨基的房间，里维拉就走上前去，直截了当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他。托洛茨基的脸立即转色，并问：“娜塔丽娅知道吗？”里维拉作了否定的回答后，他就说：“我将亲自告诉她！”我们就立即动身，我驾驶车子，里维拉坐在我旁边，托洛茨基坐在后排，神情呆滞，默不作声。到达科约阿坎，他就立即把娜塔丽娅叫到他们的卧室里，他们再次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就像当年在普林吉坡听到齐娜死讯时一样，人们通过半开的门把茶水送给他们。2月18日中午一时许，托洛茨基把一份手稿交给我。此稿是用俄文写的，他要我把文稿翻译出来散发给记者。该文要求当局对他儿子的死因进行调查。经过几天的闭户不出以后，托洛茨基又出现在自己的书房里，开始写悼念他儿子的文章。在去伊达尔戈家之前不久，他刚写完一篇长文，题目是《他们的道德准则和我们的道德准则》。该文日期是1938年2月10日，托洛茨基在廖瓦死后，就把日期改为2月16日并作了补充。

让娜获悉廖瓦死讯后，立即写信给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倾诉她的悲哀。因为她曾经同廖瓦热恋过。托洛茨基给她发了回电，以示抚慰：“小让娜，您说得对，我们必须活下去。”但情况很快起了变化：廖瓦死后在拉克雷泰尔街寓所里还留着大批文件，过了二三个星期，事情很显然，这位属于莫利尼尔集团的让娜并不准备把文件转交给托洛茨基。托洛茨基通

过他在巴黎所委托的律师热拉尔·罗森塔尔，表示了强烈的抗议。他认为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这些文件都是属于他的。他还认为让娜在干一件危险的勾当。因为法国警方正在找借口攫取这些文件，格伯乌对此也在跃跃欲试。他越想越恼火，于是双方开始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剑的交锋，然而，娜塔丽娅仍和让娜保持友好关系，两位同病相怜的妇女继续交换着书信，相互倾吐各自的哀怨。

大约在廖瓦去世1个半月后，即3月底4月初的一天，午饭后，托洛茨基在午睡，我在自己的寝室里，平常也是这个时候，娜塔丽娅常到我的房间里来说些家务琐事或者来查看一下帐目。这天她进来时，神情异常，脸颊上挂着泪水，她哭着说：“让·范^①！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吗？说，‘你站在我的敌人的一边。’”她用俄语重复着托洛茨基本人说过的这句话，托洛茨基不是用“对手”，而是用“敌人”这个词，在当时，所谓他的敌人就是指让娜和雷蒙·莫利尼尔，当然，他对这句话作了一些解释：“你的行为就像是与我的敌人站在一起”，“你已经中了我的敌人的阴谋诡计。”可严酷的事实是廖瓦去世才6个星期，娜塔丽娅还处于剧烈的悲痛之中，托洛茨基竟然说出了这样冷酷粗暴的话。

正在此时，我们听说，安德烈·布列东将受法国外交部派遣要来墨西哥进行商谈。托洛茨基要我给他搞几部布列东的著作，因为他从来未读过布列东的大作。由于时间紧迫，我决定不求巴黎的朋友而求纽约的友人帮助。4月9日，我写信给哈罗德·艾萨克，要他在纽约市能搞到的布列东的全部著作都寄来。4月底，他寄来了《超现实主义宣言》、《娜佳》、《联接

^① 让·范是本书作者的名字。——译者

器》等，还有其他几本书。我把新书拣出来，然后把它们送给托洛茨基。他把这些书堆放在桌子一角。就那样搁了好几个星期。我的印象是，他只是随便地翻阅了一下，而可以肯定，他并没有从头至尾地去读它。

4月下旬，布列东及其夫人杰奎琳来到墨西哥城，我就立即到城里去拜访他们。我们在一个典型的墨西哥餐馆用了午餐。看来布列东对墨西哥之行很感兴趣，这里的一切他都感到新奇。他对我很热情友好。1938年4月29日，我写信给皮埃尔·纳维尔，告诉他：“布列东已来此几天了，他对墨西哥，对迭戈的绘画，对这个国家的一切美好事物都非常仰慕。但是，他忙于应酬，出席各种宴请，有民间的，也有官方的，被大批人群所困扰。”几天后，我把布列东和杰奎琳送出城外，把他们带到科约阿坎，他们在这第一次同托洛茨基、娜塔丽娅会晤中，就谈到巴黎那个关于莫斯科审判调查委员会的工作，谈到纪德、马尔罗对审判的看法，彼此交换了一些信息。但没有涉及正题。几天后，即5月20日，他们进行了第二次会晤。我保存了一些供我自己阅读的在会晤后记下的笔记。这些笔记本可别小看了，它们确实给回首往事提供了重要依据。当布列东、杰奎琳、娜塔丽娅和我在托洛茨基书房坐定后，托洛茨基就立即为左拉辩护。他解释说，超现实主义是对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的一种反动，在左拉那些范围狭窄的题材特殊的文学作品中具有某种现实主义的敏感。他说：“当我阅读左拉作品时，我感到从中发现了许多新东西；许多我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我领略到一个宽广的现实世界。而越是虚幻的作品就越不能被人理解。”布列东略感惊讶，表情僵持，他挺直地坐在椅子上，他回答说：“对！对！我同意。左拉的作品富有诗意。”托洛茨基继续发表他的高见：“你们喜欢援引弗洛伊德的话，

可是他的观点不也有前后矛盾的吗？弗洛伊德把下意识提高到意识的高度，您不也想把意识窒息在无意识下面吗？”布列东回答说：“不，不，决非如此。”接着他提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彼此能否相容呢？”托洛茨基回答说：“噢，您得知道，这些都是马克思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在弗洛伊德看来，除非在幻想中的未来，社会总是一种绝对的存在，总要采取一种抽象的强制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对社会本身进行深入研究。”

当娜塔丽娅端茶进来时，谈话已趋于和缓，话题转入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托洛茨基提出一个设想，成立一个革命艺术家的国际联盟，以便与斯大林分子的同类组织相抗衡。显然他在获悉布列东即将访问墨西哥消息后就开始酝酿这个计划了。他们还提到发表宣言的事，布列东同意拟一份初稿。

往后几个星期天里，他们并没有在书房里继续会谈，而是一起出去作短途旅游，在郊外进行野餐。布列东和杰奎琳天天与里维拉和芙莉达保持联系。他们甚至还在里维拉的圣安琪寓所里住过几天。他们刚来墨西哥时则住在迭戈·里维拉的前妻瓜达卢佩·马林家里。可是，他们同托洛茨基只是会晤了八九次，并未在那里住宿。

布列东对墨西哥的访问引起了斯大林分子们强烈反响。布列东返回巴黎，在1938年11月11日，发表的演说中也提到斯大林分子的阴谋诡计。布列东来墨西哥后的第一次会议被安排在阿尔特斯贝拉宫举行。托洛茨基担心在墨西哥的一帮斯大林分子很有可能前去捣乱，因此他要我组织一些力量进行防卫。我于是同墨西哥托派团体的领导人商议，请他们派人在要道口秘密地实施警戒，结果平安无事。托洛茨基能毫不犹豫地召集一个政治团体的成员来保证布列东主持召开的

文学爱好者会议的顺利进行，我认为这件事，足以说明托洛茨基对布列东的关心程度。

一天下午，我们和布列东夫妇一起到郊外旅行，中间在小镇上歇息，顺便参观了一座教堂，那里靠近普韦布洛或是乔卢拉。当时，里维拉和芙莉达都不在。这座教堂低矮、昏暗。左首，墙上柱上挂满了墨西哥所特有的祭品。这些祭品都是些金属制成的小盘，间或也有用些旧罐头制成的盘子。民间艺术家们在圆盘上画着各种记载着重大历史事件的戏剧性场面。据说，捐赠这些盘子的信徒将得以消灾免祸，终身受到上帝的保佑。这些祭品挂在那里也表明人们对上帝的感谢。这些供品日积月累，数量可观，其中有些供品年代悠久，最早的已有80多年历史。我认为这些作品最具墨西哥民间艺术的特色，布列东对它们更是赞不绝口、视若珍宝，以致斗胆取下五六个画盘偷偷塞进自己的上衣。他大概以为这里反正是教堂，无需多少顾忌，或许还认为他的这种行为是反教权主义的合法表现。

我从托洛茨基的脸部表情立即看出，托洛茨基对此行为极为反感。这决不是他所倡导的反教权主义，而且这种局面对于他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在墨西哥，教堂的全部财产都是国有财产。如果当局发现供品被窃，那就会引出丑闻。这样，那些一心想叫托洛茨基离开墨西哥的斯大林分子势必抓住不放。他们将利用墨西哥人爱国主义感情，对托洛茨基及其朋友提出诉讼，指控他们破坏墨西哥的历史文物，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托洛茨基闷声不响地走出教堂。我必须承认，在这种场合，他表现了强大的自制能力。

几天后，托洛茨基开始催促布列东把宣言赶快写出来。托洛茨基紧贴在他的身后，布列东感到周身发麻，很不自在，结

果一个字也没写成,这种场面是可想而知的。“您还有什么吩咐?”托洛茨基本是想问他什么时候两人再碰头。随着情况的发展,托洛茨基在这个不听话的不能按时交作业的小学生面前充当起老师的角色了。布列东常被弄得十分尴尬,可是局面依然如故。一天在迭戈·里维拉家里的花园里,布列东把我拉在一边问我:“为什么你不起草这份宣言呢?”我不想自找麻烦,所以拒绝了他的建议。

6月间,我们到瓜达拉哈拉作了一次旅游。迭戈·里维拉先生去那里作画,并约定我们在那儿同他会合。我们一行,驾驶两辆汽车,前面一辆,由乔·汉森驾驶,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坐在后座,布列东则坐在司机旁边。托洛茨基要他一起去旅游,以便在路上他们可以继续交谈。我在后面一辆车上跟杰奎琳或是芙莉达一起,司机是一位美国人或是墨西哥人。整个旅程要化8个小时,车开了两小时光景,前面那辆车突然停下。我们这辆车在相距50码的地方也只好停了下来,我下车赶到前面那辆车想知道出了什么事,乔走过来对我说:“老头子叫你呢!”这时布列东从车上下来走向后面那辆车。当我们照面时,他做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动作,我就进了前面那辆车,车子又开动了。托洛茨基仍僵硬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没有向我说明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当车子抵达瓜达拉哈拉时,我们进了一家旅馆,也没跟后面那辆车上的人打招呼。我被弄得莫名其妙。由于乔不懂法语,托洛茨基和布列东的谈话他听不懂,所以他对我无可奉告。娜塔丽娅对此事也有些稀里糊涂。我们下榻后托洛茨基要我做的第一件事是他打算会晤当时住在瓜达拉哈拉的奥罗斯科,让我先去作些安排。里维拉和奥罗斯科都是当今赫赫有名的墨西哥画家。虽然两人并非仇敌,但他们在个性、爱好、生活

方式、艺术风格上迥然相异。奥罗斯科的内向型性格让人不快，正如里维拉的外向型性格有时也会让人难以接受。在一个国家里竟有两位绘画大师，单是这一点也势必会在他们之间形成争雄的局面。他们之间很少交往。托洛茨基要我作这样的安排，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想同里维拉、布列东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先去寻访奥罗斯科，他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接待了我，我们商定了托洛茨基与他会晤的具体日期。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托洛茨基、娜塔丽娅和我一起去登门拜访。这次交谈令人愉快，但气氛当然不像与里维拉交谈时那样活跃和亲切。告别后托洛茨基对娜塔丽娅和我说：“他很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天，里维拉和布列东在瓜达拉哈拉街头漫步，他们寻觅着美术作品和古物。

托洛茨基没有再跟布列东见面，我们就独自返回了墨西哥城。原来托洛茨基在去瓜达拉哈拉的路上生气是因为布列东一再推迟宣言的起草。但很显然托洛茨基恢复了自制能力，不想同他们绝交。旅行回来后，彼此的关系又慢慢恢复正常了。布列东没有把车上所发生的详情告诉我，我也不去问他。

7月初，我们决定到米却肯州的帕茨夸罗去小住几天。布列东、杰奎琳和我先动身。我得为托洛茨基找到合适的旅馆，而布列东和杰奎琳是想去欣赏一下乡村景色。迭戈·里维拉已在圣安琪住宅里收藏了一大批产自丘皮夸罗的哥伦比亚的雕塑品。这些艺术品是他从瓜那华托州的农民手里陆续买下的。这些陶瓷制成的雕塑约有3英尺高，雕塑的是裸体女子，形象十分妩媚，裸女的一双杏眼和乳房都是另外用陶土黏上去的。布列东十分欣赏这些丘皮夸罗女郎。汽车快到莫雷利

亚时，布列东要我绕道到附近村庄去搜寻一些雕塑品。由于我们事先没有掌握确切的情报，所以只好见机行事，但我们决心冒险去闯一下。当时适逢雨季，道路泥泞不堪，结果车轮陷入泥坑，我们只好请几个当地农民帮忙。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车子推出泥坑，使我们摆脱了尴尬的局面。我们只好放弃寻觅丘皮夸罗女郎的计划，转程直往帕茨夸罗，在回程的路上，布列东对我说：“要是我一个人的话，我会丢下一切，抬起双脚继续前进的。”我听了感到新奇，在这茫茫的田野上，你一个人往哪儿走呢？

在帕茨夸罗的一天傍晚，我们乘坐一艘小船在湖面上荡漾。后来又在雅尼齐小岛上野餐，大家品尝着阿根廷的白葡萄酒。当时帕茨夸罗是个十分恬静、优美的小城镇。人们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上漫步，走过宁静的广场，仿佛使自己置身于17世纪年代。我们下榻的那个旅馆是一幢古老的房子，有10来间房间，还有一座花木茂盛的花园。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后，托洛茨基带着娜塔丽娅和两个美国人来了，其中一个乔·汉森。迭戈·里维拉和芙莉达也随后到达。我们订了一个计划，打算白天游览观光，晚上大家聚在一起讨论艺术与政治，甚至还准备公开发表这次讨论的内容，题目就叫“布列东、里维拉和托洛茨基在帕茨夸罗的讨论”。第一天晚上，托洛茨基讲得最多，他谈的主题是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艺术将会融化在日常生活中。那时将不再有专业的舞蹈家，人人都会翩翩起舞，将来也不会有一幅幅画，而是所有的建筑物上都绘上壁画，房屋的墙面装饰得五彩缤纷。后来决定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推迟到第二天晚上再继续进行，于是托洛茨基按照他的老习惯就早退了。我同布列东在花园闲谈，他问我：“我想将来总有人喜欢在一小块画布上作画，你说是不是？”

第二天讨论没有进行,因为布列东病了,患了失语症。杰奎琳悉心照看他,我们都很焦虑,可她告诉我们,布列东患这个病不是第一次,以前也犯过。

7月10日,附近村庄的一群教师听说托洛茨基在帕茨夸罗访问便来同他会晤。那次座谈的话题主要是乡村教师的任务和面临的问题。托洛茨基把墨西哥与俄国作了对比。在座谈快结束时,他拿起铅笔在笔记本上用俄文写了一篇短文,要我把它译成西班牙文,并把文章交给这些客人以便刊登在米却肯州教师办的小报《生活》上。两天后,杰奎琳留下来照顾布列东,其余的人返回科约阿坎。

几天后,布列东和杰奎琳又露面了。布列东看来身体复原得很快。起草宣言的事总算找到了摆脱僵局的办法,我记得还是布列东采取了主动。他把写得密密麻麻的几页稿纸交给托洛茨基,然后托洛茨基用俄语向我口授了几页文字,与布列东的文稿拼合起来,我把托洛茨基的文字译成法文给布列东过目。经过讨论,托洛茨基又对全部文稿作了进一步的删节和增补,并把有关资料剪贴在卷宗里。我把托洛茨基的文章译成法文,并与布列东的体例保持一致,最后用打字机把定稿打出来,这就是他们最后达成协议的文章。谁读了这篇宣言,都能从语言风格上准确地辨认出哪些出自托洛茨基手笔,哪些是布列东的手笔,托洛茨基写的文字占全文一半不到,布列东写的占一半多一点。而这份宣言是以布列东和里维拉的名义公诸于众的,并寄送给各国的艺术家们。发表宣言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革命艺术家国际联盟(I.F.I.R.A)。该宣言后来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地。

在布列东返回法国前夕,托洛茨基与布列东作了最后的一次会面,双方显得热情友好,依依不舍。当时战争已迫在眉

睫，估计布列东回国后很可能被征入伍。这次告别就在1938年7月底。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洒满蓝屋的凉台，周围栽种着仙人掌、橘子树、九重葛等植物。托洛茨基从书房里取出他们两人共同起草的宣言手稿交给布列东。布列东颇为激动。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的确是不寻常的举动。在我跟随他一起生活的全部岁月中，我再也没有看到他第二次做这样的事情。我相信，这份手稿至今还会保存在布列东的文件集里。

正如我们所担心的那样，布列东一回国就被征召入伍，但入伍的时间只有几个星期。1938年11月11日，他发表了一次精彩的演说，详细叙述了他的墨西哥之行。布列东在演说中谈到我的时候，无意间说出了我的贫困处境。老实说，我追随托洛茨基并不指望过豪华生活，因为我知道托洛茨基手头没有多少钱。我在他那里工作从来没有领取过什么薪水，个人微薄的开支全仗娜塔丽娅照料。当我把布列东讲的打印稿拿到托洛茨基的书房让他看时，真有点担心，怕他误以为布列东的这番话是由于我的什么牢骚而引起的。他看了讲稿没说什么，我也无话可说，我们之间并没有为这件事产生任何误解。不过，布列东的话可以说明超现实主义者和托洛茨基主义者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

布列东的来访并未中断托洛茨基的革命活动，第四国际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一直在进行着。7月18日我们获悉负责国际书记处日常工作的鲁道夫·克勒门特突然失踪。几天后人们在塞纳河上发现了他的尸首。显然，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通过祖博罗夫斯基掌握了克勒门特的活动情况，当获知成立第四国际的计划正在实施之中，他们就决心下毒手把他干掉。但是成立大会还是于九月初在巴黎郊区如期召开了。

马克思的某些信徒发表一些不合老师心意的言论，所以

马克思曾经声明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托洛茨基也仿效马克思，曾多次声称他不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事实上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只是要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个词，那就是他始终不渝地关注着世界各地托洛茨基派团体的内部问题。在大部分时间里，每个托派团体都曾分裂为两三个派别。团体内部的派系斗争，或这一团体与那一团体之间的斗争，它们彼此结成联盟或者实行分裂，这一切都牵动着托洛茨基的心。他给这些团体贡献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和耐心。

托洛茨基对这些托派团体最大的不满意是它们的社会成分：知识分子太多、工人太少。“小资产阶级”成了他在文章上用以谴责某些个人或某些团体的常用词。我亲耳听到他夸赞过的托派组织只有两个：一个是比利时的沙勒罗瓦市由煤矿工人组成的团体；一个是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由卡车司机组成的托派团体。

要全面说清楚世界各国托派组织内部斗争的情况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只有经过详尽的实际的调查研究才能弄清当时所处的特殊环境，才能对托洛茨基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作出评判。倘若根据表面现象作判断，那是很容易的。从表面上看，托洛茨基为解决组织问题所付出的巨大努力收效甚微。比如说，托洛茨基对西班牙问题曾接二连三地写了许多篇充满革命激情的文章，但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巴塞罗那托派团体的成员，一共不超过 12 人，而且这些成员年纪轻轻，经验也不丰富。在托洛茨基去世时，各地的托派团体从规模上讲，同他刚离开俄国时各国党内反对派的人数相差无几。期间也有极少数著名人物宣称自己是托洛茨基主义者，但不久又退出了托派组织。托派人数稀少的原因之一确实是由于当年

所面临的险恶处境。对于那些不了解当年情况的人们来说，现今要使他们领悟 30 年代的情景是困难的。当年，斯大林分子的诽谤和迫害到处可见，经费短缺的程度令当代人难以想象。由于没有钱，我们常常弄得手足无措，寸步难行。

的确，托洛茨基把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发展法国托派势力上。他到土耳其以后几个月里，浏览了从 1929 年创刊号到 1931 年的全部《真理》周报。为了解决雷蒙·莫利尼尔、皮埃尔·弗朗克和阿尔弗雷德·罗斯麦 3 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占去了他的大量时间。从 1935 年起一直到他去世，他同雷蒙·莫利尼尔的争吵愈演愈烈，最后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936 年 6 月工潮期间，他还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文章《法国革命已经开始》。然而不久，法国工人运动遭到失败，他本人也移居墨西哥。于是托洛茨基开始从远处观察法国托派所存在的问题。虽然他仍然注视着法国政治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以及法国托派团体的动态，但已没有先前那种强烈的义务感了。

在科约阿坎，关于法国托派团体的内部动态，尤其是领导人之间派别斗争的情报，主要是让·鲁向我们提供的。他定期写信给我们，虽然主要是写给托洛茨基，但收信人的名字却是我的。鲁的字写得不好，托洛茨基读他的信感到头痛。于是我把鲁的来信用打字机重新誊写一遍，再拿给托洛茨基看。一天，大约是在 1939 年六七月间，让·鲁来了一封信，我先把信的摘要送给托洛茨基看，并说：“我马上把信打印出来。”托洛茨基说：“这样做不值得，您还有别的事要做呢！”他的这种态度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一位美国教授休伯特·赫伦来墨西哥办讲习班，每年一至两次，他带领着 30 多人来科约阿坎，请托洛茨基给这些学员讲课一二小时并回答学员们的提问。这作为讲习班教学计划

的一部分。交换条件是赫伦教授把他在塔斯科的一幢住宅提供给托洛茨基使用。我们每隔两三个月就到那里去住上个把礼拜。第一次去塔斯科是在杜威委员会调查活动结束后不久。1938年,有一次我们到塔斯科寓所休闲,我们租了几匹马准备到小镇附近的山野去散散心。随同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位美国的托派朋友,其中有几位妇女。他们是来墨西哥旅游,顺便也想拜访一下托洛茨基。这样总共有10几个人。开始时,大家骑着马,像散步那样慢慢悠悠,似乎不想走远。突然托洛茨基扬起马鞭,一声吆喝,便向远方奔驰。虽然我远不是一个骑马能手,但我不敢大意,不能让托洛茨基单独远去,因此我就立刻打马扬鞭,紧紧跟上,这时马鞍上不知什么东西把我的枪绊了一下,险些出事,我所以没有摔倒,是因为坐骑上有安全装置。过了一会,托洛茨基和我都发现我们已走到大路上了,于是我们继续疾驰,直到镇上才罢手。其实托洛茨基很少做这种心血来潮的事情。

万灵节在墨西哥是个群众性的节日。在30年代,人们的庆祝活动比今天还热闹。那一天,穿着盛装的男男女女涌向街头,拿着鞭炮和硬纸糊的骷髅,小孩嘴里嚼着奇形怪状的甜食,如用糖做的头盖骨和古笛。1938年11月2日,万灵节的午后,迭戈·里维拉来科约阿坎做客,他看上去像一个喜欢恶作剧的顽皮的艺校学生。他送给托洛茨基一个很大的用纯糖做的头盖骨,并在前额上用白糖雕写着“斯大林”的字样。托洛茨基没说什么,装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当里维拉告辞,他就立即命我把那玩意儿毁掉。

迭戈·里维拉具有某些良好的素质,他那丰富的想象力使他能对人作出深刻的评析。但是他对待人的态度又恰好表现了他的性格中奇特的一面,在观察判断一个人的时候,他往

往只注意其某一个方面,因而在短短的几天里,他对某人的评判,常会得出先后矛盾的结论。所以他同别人的关系往往反复无常。一天早晨,我在圣安琪里维拉家里同主人们共进早餐,邮递员送来了一位美国作家的来信。里维拉只是瞅了一眼寄信人的姓名,没拆就把信撕了,随即扔到室外,并且大声嚷嚷:“这个无赖!在法庭上不敢讲真话!”可是几天后,我上里维拉家里,发现他正在同那位寄信人进行着友好的交谈。那人曾经特地写信告知他来访的打算。在私人关系中这种突然的转折,对里维拉来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墨西哥托派团体只有二三十个成员。尽管人数稀少,但还是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为代表,一派以加利西亚为核心。里维拉大部分时间严守中立。他又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成员,因为其他成员都是些收入微薄的青年教师和青年工人。里维拉则是一位全国闻名的大人物,他的绘画作品使他大发其财,他为该团体提供大量经费。因此团体每做一件事,比如印传单、召开群众集会,往往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如果他赞成该项计划,他就会慷慨解囊,大力支持;若是他不喜欢该计划,他就会加以抵制,这势必在团体内部造成紧张关系。假如他不参与团体的日常活动,只是作为一个乐善好施的赞助者,那么情况也许会好得多,而他偏偏不是这样,他就是喜欢干预这个组织的内部事务。

托洛茨基身居墨西哥并未使情况有所改善。墨西哥托派团体所有的骨干分子,不管属于哪一派都得轮流到科约阿坎住宅参加保卫值班,每晚两至三人,值到第二天早上回去。托洛茨基往往乘他们值班的机会找他们谈话,提出一些忠告。因此会员们不断地感受到来自托洛茨基进行干预的压力。由于该组织的内部局势十分糟糕,国际书记处和不久召开的第四

国际成立大会不能不对墨西哥支部的内部问题作出决议。成立大会的决议要求墨西哥支部进行改组。就迭戈·里维拉而言,会议决定“鉴于过去这位同志在墨西哥支部内部关系方面所引起的种种困难,他不得参加重建的组织,但是他为第四国际进行的工作和活动仍将置于国际秘书处的直接监督之下”。显然,里维拉并不是一个唯命是从的人,他不会欣然接受这个来自远方的,他本人并未出席的会议所作出的决议。这件事所造成的气氛反而使冲突成为不可避免,并且日益加剧。

托洛茨基经常跟里维拉谈论墨西哥托派团体的活动。托洛茨基对他的忠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1938年秋天,托洛茨基也许已经得出结论,里维拉必须脱离该团体的日常事务。但我不知道托洛茨基究竟对他说了什么,因为我是故意不去打听他们的这类谈话的。但这种忠告只能激起里维拉的恼怒,因为他想充当一名政治强人。

里维拉对托洛茨基主义的信仰也是相对的。我同他日常交往中,他常说:“我告诉你,在我身上你可以嗅到一股无政府主义者的气味。”他对我讲了他在俄国时听到的一些故事,内容涉及到共产国际早期活动的一些幕后新闻。这些故事总的意思是说,即使在列宁领导下,那里也发生了许多丑闻。但是他从不向托洛茨基说起这些事情,而是表现了另一副嘴脸。1938年他写了几篇评论拉美国家的文章,分析了那里的形势和他所谓的“亚资产阶级”所起的作用,确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

托洛茨基对里维拉的私人感情究竟如何呢?我对此只能作出局部的回答。在挪威政府施加淫威以后,托洛茨基十分感谢里维拉在申请墨西哥签证一事上作了大力协助。里维拉抱病奔走,长途跋涉前往墨西哥,与当时的政府首脑卡德纳斯直接交涉。托洛茨基也十分感激他所给予的慷慨和友好的接

待。里维拉把科约阿坎的蓝屋让给托洛茨基居住，当然值得感谢之处还不止这些。在1932年至1939年期间，在我所认识的与托洛茨基密切交往的人中间，里维拉是托洛茨基能够与之欢畅而随便交谈的一个。虽然在交谈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可逾越的界限，但他同里维拉的会晤确实有一种自由自在的信任气氛，这在托洛茨基与其他人会晤中我是从未见到过的。当然托洛茨基也非常欢迎这位世界闻名的艺术家加入第四国际。有一天，我的话也许暴露了我对里维拉政治态度的某些怀疑，托洛茨基稍带责备的口吻对我说：“您得知道，迭戈是个革命者！”其实，托洛茨基说这话也许正是在试图消除他自己对里维拉的疑虑。

1938年10月，即布列东返回法国后不久，由于政治和私人方面的因素，托洛茨基和里维拉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除了别的原因以外，那件事看来也是造成隔阂的原因之一。那就是托洛茨基把里维拉的大名放进了他未参与起草的所谓《布列东—里维拉宣言》文件里，虽然事先征得里维拉的同意。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人们思想上所发生的变化。另一个不快的原因是，茉莉达应布列东和杰奎琳的邀请前往法国，在那里住了几个月，里维拉不能不感到他的生活失去了平衡。

在往后的一段日子里，里维拉的政治态度摇摆不定，今天他说要担任墨西哥托派团体的书记，不过他是作为世界名人的身分担任书记的，明天他又声称要退出托派团体，甚至退出第四国际，以便全力以赴搞美术创作。12月中旬，托洛茨基到圣安琪去看望他。会晤结束时，里维拉答应以后不再提辞退一事。宾主双方显然是在友好气氛中告别的。

引起风波的起因是12月底里维拉给布列东的一封信。当里维拉需要用法文写信时，总要来请我帮忙。他向我口述信的

内容,然后我用打字机打成文稿。这一回,他打电话叫我去圣安琪他家里,帮他给布列东写信。他开始口授,不久他在信中批评起托洛茨基的“工作方式”。于是,我的笔就停下来了,里维拉催促说:“写下去!写下去!回头我会把这封信亲自拿给L.D.看的。”我只好遵命。要是别人,我会断然拒绝。可是托洛茨基与里维拉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只有里维拉可以不经过事先安排自由出入这座宅子,托洛茨基则始终予以热情接待。其他人来访时,一般总有第三者在场,多数由我参加。在接待里维拉时,托洛茨基与我之间的紧密联系似乎可以松弛一下。里维拉有时对我在场感到不快,所以我就故意找些借口避免参与他们的谈话。正如我前面提到,托洛茨基有一次责备我说:“你总是把我当成一件物品。”这样里维拉与托洛茨基之间形成了一种不受规章制度约束的特殊关系,于是我听信了里维拉的话,相信他会向托洛茨基当面作出解释,此事不用我插手。

里维拉口述完毕,在我临走时他又一次对我说,他将亲自把信交给托洛茨基过目:“我会当面向他解释清楚的。”我回到科约阿坎,用打字机把信打出来,完了把一份复印稿放在书桌上。通常在托洛茨基睡午觉时,娜塔丽娅常到我的寝室来看看托洛茨基向我口述的和已打印好的信件。不管我是否在房间里,她总要进来翻翻看看。这一天,她进来刚好发现里维拉给布列东那封信的复印稿,她看了信稿就把它交给托洛茨基,于是出了乱子。

正如信中所说明的那样,里维拉对托洛茨基“工作方式”不满主要是近日所发生的两件小事情上。由布列东一里维拉签署的宣言发表以后,一个小团体“独立的革命作家国际联盟”在墨西哥成立,并着手出版一份杂志《关键》。在杂志编辑部的一次会议上,一位墨西哥青年何塞·费雷尔被任命为书记。

里维拉本人也出席了会议并未提出反对，但他在给布列东的信里把这个任命说成是托洛茨基发动的一次“友好而温和”的政变。第二件事是，有人决定把里维拉写的一篇文章作为给编辑部的信刊登出去，此事托洛茨基并不知道，而里维拉把此事归咎于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对里维拉的信所作的反应是，通过我要求他再写一封信给布列东来纠正以上两个错误的说法。里维拉表示同意，并约我再配合他写这封信。但临了他取消了这个约会，后来他又约了一次，又再一次取消。显然他的感情正在经受着一次强烈的冲撞。他在给布列东的信中所用的“友好而温和”之词表明他对托洛茨基仍怀有依恋之情。

由于里维拉拒绝再次写信给布列东，这一分歧就变得尖锐了。由于一系列的波折，托洛茨基与里维拉的关系急剧破裂，从亲密导致敌对，此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第四国际泛美局驻墨西哥的代表查尔斯·柯蒂斯和我成了他们的中介人。1月12日，托洛茨基写信给在巴黎的芙莉达向她说明与里维拉决裂的原因。当然，芙莉达是站在里维拉一边的。

里维拉感到在政治上再也无法同托洛茨基和平共处了，于是他参予了形形色色对托洛茨基主义多少有些敌意的工人团体的秘密活动，托洛茨基对此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这样一来，所有沟通友谊的桥梁都拆毁了。

此时正值墨西哥大选。按墨西哥宪法，卡德纳斯不能连任总统，他甚至无法让他的政党接受他所提名的候选人，而军界和商界却迫使他接受阿维拉·卡马乔作为总统候选人（后来当选了）。卡德纳斯的亲密助手和知友穆希卡决定参加竞选，他对卡马乔来说，是左翼反对派提出的候选人。第三位候选

人是阿尔马桑将军，他属于在野党，以右翼反对派的候选人资格参予竞选。形势确实错综复杂。由于卡马乔是卡德纳斯被迫接受的，因此，许多亲卡德纳斯的人就宁可投阿尔马桑的票。在2月间，里维拉积极参予穆希卡的竞选活动，托洛茨基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政治上的背叛。后来穆希卡退出竞选时，据说，里维拉又转向了阿尔马桑。可那时，我们同里维拉已不再有任何交往了。

托洛茨基同里维拉决裂后，就不能继续住在科约阿坎那幢蓝屋里了，但要马上找到一所房租不贵，设备比较齐全的房屋谈何容易。早在1月底，托洛茨基就通过我向里维拉提议，在他寻觅新居期间，他将向这位房东支付房租，里维拉先是拒绝，后来同意，最终还是拒绝。在决裂的最后阶段，这一切无疑是火上添油。到了3月开春，我终于物色到了一处新屋。地点也在科约阿坎，且房租低廉，但住房条件比较差。这幢房子坐落在维也纳街上，离开原先住的地方很近。实际上，这所房子常常是空关着的，房主图拉蒂是在墨西哥城里开店的小业主，这房屋是作为他家夏天避暑用的，他们很愿意出租，即使租给托洛茨基这样的人物也不在乎。这房子有许多优点：房间多，院子大，围墙高，能看到周围的景色，因为四周没有多少房屋。但是这所房子需要修缮，好些房间的地板都已经塌陷了，同时房屋的门窗墙面也需要装饰一下。这项工作由一位年轻的墨西哥托洛茨基主义者梅尔基亚德斯负责，还有其他人配合。直到5月1日，房屋修缮完毕，我们总算能搬家了：从隆德雷斯街搬到了维也纳街。托洛茨基5月5日才迁入新居。当他即将离开蓝屋时，他把里维拉和芙莉达原先送给他的两三件小礼物放在刚刚撤空的书桌上，尤其是芙莉达送给他的那枝用了很长时间的钢笔他也给留下了。

托洛茨基搬到新居后感到轻松自在。房子经过一番装修焕然一新，看上去挺气派，同时也显得宽敞。所有房间都作了安排，除了作为生活起居之用外，还留出一部分用于其他目的。他和娜塔丽娅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托洛茨基喜欢栽培仙人掌，他甚至还建造了兔棚，每天下午亲自给兔子喂食。

有人常常问我，托洛茨基和美莉达之间在 1937 年发生的风流韵事，对这次决裂起了什么作用。许多询问者的那种神秘目光使我明白，在他们心目中，那件事才是导致决裂的真正原因。但我应该说，从当时情况看，这次决裂同那件事确实没有牵连。理由之一是，美莉达曾对我说过，里维拉丝毫不知道托洛茨基同她所发生的私情。一个间接的证据是：如果托洛茨基与美莉达先前的暧昧关系对这次决裂起了作用的话，那么决裂的方式就会大不一样，因为里维拉怀有病态的妒忌心理。根据现象判断，里维拉对他俩的关系并未产生什么怀疑。当然，托洛茨基那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也常常引起他的不快，可这么一点敌意并非由于他已知晓托洛茨基与美莉达的隐秘，或者由于对此有所怀疑而引起的。

托洛茨基与里维拉绝交几年后，并且在托洛茨基死后很久，里维拉和美莉达闹起了离婚，可几个月后他们又复了婚。促使婚姻发生危机的原因，可能是由于里维拉通过某种渠道知道了那件往事。他的忌妒是极端强烈的，尽管他自己常有欺骗美莉达的行为。这一情况还可说明里维拉的政治态度为何那样反常。里维拉与托洛茨基决裂期间，他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倾向先后涂上过无政府主义色彩和自由主义色彩，但决没有斯大林主义色彩。事实上里维拉当时还指责托洛茨基染上了斯大林主义毒菌。但是在他跟托洛茨基决裂很久以后，

他却转向了斯大林主义^①，这可能是由于他获悉托洛茨基与美莉达之间隐情后在狂怒之下所作的决定。显然这些全是我的主观臆断，因为那时我早已离开了墨西哥。可是我的猜测所依据的是与我以往所知内情相符合的许多众所周知的事实。

1939年6~7月间，托洛茨基要我到墨西哥城国立图书馆去寻找资料，查阅有关16世纪宗教战争和罗马帝国灭亡的文献著作。他认为，这两个历史阶段可以同我们当今时代作比较。我至今还能回忆起当年在他书房里与他一起讨论的情景。我说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认为宗教战争异常残酷，许多人从高塔上被抛下来，守候在下面的士兵们用长矛当场把人戳死。他以罕见的忧郁的目光向我一瞥，并对我说：“这种事情你以后还会看到。”后来，这残暴的一幕我们终于看到了。

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中，我发现塔西陀的一段语录，他把尼禄皇帝雇用的杀人凶手罗库斯塔叫做“皇帝手中的工具”，托洛茨基就把这顶桂冠套在雅戈达头上，说他是苏维埃政府手中的工具。托洛茨基的这些想法在他同美国托派论战中写的几篇文章中可以找到一些痕迹。他的文章提到了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专制主义这样的问题。可我的印象是他的思想比他当时已经发表的东西又进了一步。

托洛茨基在平时谈话中，甚至在文章中经常提出这样一个告诫：不要轻信“老家伙”，而要大胆依靠年轻人。他在1934年3月27日写的关于拉柯夫斯基投降的第二篇文章中说：“应该让3个20岁的年轻人顶替一个60岁的老战士！”大约在1937年7月，一天中午，托洛茨基提议做一种游戏：看看有多少同我们分道扬镳的“老家伙”，他扳着指头数个，每报一个

^① 迭戈·里维拉原是墨西哥共产党党员，1928年被开除，1936年加入托派组织，后与托洛茨基决裂。几年后，他又重新加入了墨西哥共产党。——译者

名字，他就伸出一个指头。我们就一个接一个地报出了许多名字，特伦特、拉柯夫斯基、范·奥韦斯特拉登，等等。后来，我想说出一个人的名字时有几分胆怯，因为我不知道他会作出什么反应，说：“罗斯麦算吗？”“对！罗斯麦！”他提高嗓门喊了一声，并伸出了一个指头。

1939年8月8日，罗斯麦夫妇带着谢瓦^①从法国来到墨西哥。这是他们自1929年在普林吉坡岛分别以来第一次会晤。早在1930年，托洛茨基和罗斯麦之间就发生了政治分歧。当时托洛茨基决定支持雷蒙·莫利尼尔，托洛茨基和娜塔丽娅在侨居法国期间（1933年至1935年），他们同罗斯麦夫妇没有任何接触，可是这次罗斯麦夫妇受到了热情款待，他们被安排在科约阿坎的新屋里住宿，并邀请他们一起用餐。在交谈中，托洛茨基与罗斯麦往往谈及政治问题，不过只是一般性的议论，双方似乎有一条心照不宣的不可逾越的界线，那就是不提往事，不涉及法国托派团体的内部事务。

我记得8月底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托洛茨基打算成立一个第四国际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是一个具有荣誉性质的组织，由参加第四国际托派团体的，甚至包括托派外围组织的知名人物所组成。托洛茨基提到像陈独秀那样的人就有资格成为该委员会的委员。陈是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人，他虽然加入托派，却从不参与中国托派团体内的派别斗争。不过托洛茨基的这个计划不很明确，我不知道是否有书面的东西。一天下午，托洛茨基把我叫进书房告诉我，他想成立一个委员会，并且说：“你能否去征求一下罗斯麦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参加这个委员会？”我对此感到惊讶，因为这实在是反常的做法，托洛茨基和罗斯麦每天要碰头好几次，所以根本不需要第三者

^① 谢瓦是托洛茨基的外孙。——译者

插手。再说他们又是同辈人，有着共同的资历，而我则属于年轻的一代。而且罗斯麦不会不想到我是受了托洛茨基的委托才来征求意见的，托洛茨基当然也料到罗斯麦会明白这一点。最后还得我去把成立委员会计划转告给罗斯麦，结果罗斯麦表示同意参加，但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后来这个计划并未实现。

1939年9月爆发了战争。我和托洛茨基一起从收音机里获悉：一艘英国船只遭到德国鱼雷艇的袭击。这是一种让人造成错觉的假象，于是一场“假戏真做的战争”开始了。我感到在托洛茨基身上存在着一种厌倦心理，他目睹他在1914年经历过的灾难再次重演，然而他仍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战争将会导致社会主义革命。

10月，有一次托洛茨基和我交谈中提到阿伯特·爱因斯坦的名字。他说爱因斯坦“本质上是个数学家”。当然这个评价是不正确的。因为从气质上看，爱因斯坦十足是个物理学家。他所运用的任何一种数学工具在数学家们的著作中都已详细阐明。托洛茨基的观点反映了1922年苏联讨论爱因斯坦理论所造成的印象，当时他们竭力想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决不能动摇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因为它仅仅是某种数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10月份我决定去一次美国。我伴随托洛茨基那么多年，也确实需要使自己放松一下，换换环境。原来打算在美国呆几个月，然后再回来。

11月5日清晨，我告别了科约阿坎住宅。动身前夕，托洛茨基和我作了最后的一次交谈。我们谈到了美国托派团体的情况。他们正在经受一场危机，该团体内部存在着两个派别：一派是以坎农为首的多数派，另一派是以沙赫曼和伯纳姆

为代表的少数派。托洛茨基在政治上是站在多数派一边的，但他担心坎农运用组织措施来代替政见分歧的讨论，匆匆忙忙地把少数派开除出去。他对我说：“坎农在组织措施方面必须采取克制的态度，在思想水平上应当再提高一步。”这话有于类似于 1933 年 8 月他要我向雷蒙·莫利尼尔转达的忠告。在这最后一次谈话中，托洛茨基并没有给我下达什么“指示”，因为在纽约，我新来乍到，不可能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他只是说明他对形势的看法，告诉我应该量力而为、见机行事。然而当时，事情的发展已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估计。我到达纽约时，分裂已成为一个无可挽回的事实。

我离开科约阿坎到托洛茨基被害，中间只相隔几个月。关于这段时间的情形，报上已作了详细的披露，人们早已知道，所以我没有多少东西需要补充。在那段时间里，我和托洛茨基保持着正常的通讯联系，向他提供我所掌握的关于美国托派团体分裂后的情况。那位未来的凶手拉蒙·梅尔卡德遵照格伯乌的指示，在巴黎向一位年轻的美国托洛茨基主义者西尔维娅·阿盖洛夫求爱，结果拉蒙成了她的情人。这对格伯乌来说，西尔维娅是一个很理想的对象。因为她有一个姐姐鲁丝·阿盖洛夫很受托洛茨基的青睐。杜威委员会在墨西哥进行听证调查期间，鲁丝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翻译、打字、查资料等等。鲁丝不住在托洛茨基寓所，但有一段时间她几乎天天来同我们一起奋战，托洛茨基对她印象极好，所以她妹妹也受到托洛茨基夫妇的热情接待。

把这个凶手引进托洛茨基书房的第二个契机是罗斯麦夫妇提供的。阿道夫·萨莫拉^① 1940 年时常去科约阿坎宅院拜访。他在 1972 年告诉我，罗斯麦夫妇，尤其是玛格丽特·

^① 阿道夫·萨莫拉——墨西哥托派成员“关键”杂志编辑之一。——译者

罗斯麦非常喜欢拉蒙·梅尔卡德。他们经常差他做事，而他总是有求必应。墨西哥城市区和郊区，交通都不方便，梅尔卡德就驾驶自己的汽车随时听候罗斯麦夫妇的支配调度，东奔西跑。他们还请他一起到郊外作短途旅行，顺便也带上西尔维娅。由于罗斯麦的妻子和娜塔丽娅很亲近，而梅尔卡德同罗斯麦夫妇关系那么亲密，这就使他获得娜塔丽娅的、随即又获得托洛茨基的信赖。

不过有一件事一直使我感到困惑：梅尔卡德说话的口音为什么没有引起罗斯麦的怀疑？梅尔卡德自称是比利时人，但从保存在墨西哥法院的案卷材料中表明，他讲的法语带着西班牙人的腔调，而比利时人讲的法语跟西班牙人讲的法语是显然不同的。罗斯麦作为一个法国人，他精通法语，文笔优美，那么为什么他不能察觉梅尔卡德说话中的纰漏呢？

1940年8月，我在巴尔的摩安身，在那里教法语。21日早晨，我在街上散步，只见人行道上堆放着一大叠《纽约时报》，报上有一行大字恰好映入我的眼帘，这行字刊登在头版中间：“托洛茨基在私寓被‘友人’击伤，据称生命垂危。”我顿感困惑，于是在街头徘徊，等待着电台的播音，终于听到了一位播音员的声音：“列夫·托洛茨基于今日死于墨西哥城。”黑暗终于降临了。

跋

托洛茨基去世后的7年里，我仍然积极参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直至1948年，我越来越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作用及其政治能力的思想同现实不符。其次，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斯大林集中营的种种内幕被充分揭露，至少被那些不愿意闭目塞听、充耳不闻的人所知道。面对这些真相和事实，我开始反思过去，提出怀疑，布尔什维克们依靠建立一个不可逆转的警察统治和扼杀公众舆论的方法恰好培育了这样一块土壤：在这块土壤上长出了一个巨大的极毒的斯大林主义蘑菇。难道情况不正是这样吗？我对自己的怀疑进行了深思，并通过数年来对数学的研究使我保持了内心的平衡。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对我来说已成了明日黄花，我得重新建立新的生活。

托洛茨基之死

1940年春天的形势对托洛茨基来说是更为严峻了。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似乎已经下了决心，再也不允许这位政治流亡者的生命继续延持下去，一项秘密的行动计划正在付诸实行。

墨西哥共产党开始掀起一个反托洛茨基运动，他们指控托洛茨基甘心为美国石油垄断财团效劳，阴谋反对卡德纳斯总统，企图在墨西哥发动总罢工，甚至企图发动政变。5月1日，2万名身穿统一服装的墨共党员在首都举行游行示威，标语牌上写着“驱逐托洛茨基！”的口号。

托洛茨基深感处境的危险，于是加强了住宅的防卫：加固门窗，安装铁丝网，装置自动警报器，在要道口架设机枪，增派警察加强住宅周围的值勤，另有四五个保安人员在值班室待命。这些保安人员大部分来自美国的托派青年学生，未受过专门的警卫训练。由于警卫任务单调乏味，容易使人产生厌倦和松懈的情绪，所以经常需要换人。

由于政治原因和健康原因，托洛茨基先后在是年的2月27日和3月3日立下了遗嘱，这说明他对自己的厄运似乎已有某种预感。

5月23日(示威游行的3星期以后)托洛茨基住所遭到了第一次袭击。那天,托洛茨基睡得很晚,服了安眠药才入睡。大约凌晨4点,一阵猛烈的机枪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起先还以为是墨西哥市民放鞭炮,以庆贺他们的传统节日,但枪声越来越猛,并且硝烟弥漫,闻到了强烈的火药味,这才意识到“敌人打来了”。这时娜塔丽娅也已惊醒,她机灵地从床上跃起,并立即把托洛茨基猛地拉下床,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丈夫,随后又钻进床底下,两人静默无声,纹丝不动地趴在那里。暴徒们连续向卧室射击。突然从邻室传来一声尖厉的喊声“爷爷!”他们一听就明白那是小外孙谢瓦的喊声。两位老人的心一下子被揪得更紧了,顿时感到毛骨悚然,然后却是一片静寂。托洛茨基喃喃自语:“他们把孩子抓走了。”娜塔丽娅在黑暗中凭着燃烧弹的火花,仿佛看见一个头戴钢盔,身穿警服的大汉站在谢瓦的卧室门口,查看室内是否还有活人。那歹徒虽然未发现什么,却还是向床上打了一梭子弹,随后就走开了。枪声停止了,又恢复了平静,但静得可怕。突然,又出现了孩子的声音,那是从院子里传来的,谢瓦在喊着罗斯麦夫妇^①的名字:“阿尔——弗雷德!玛——格——丽特”噢,谢天谢地,小外孙总算还活着,原来他也是钻在床下才幸免于难的。当时,他以为外公外婆死了,才赤着双脚奔到院子寻找罗斯麦爷爷奶奶。

不多一会,家里人都聚集在院子里,发现无一人死亡,也没有人受重伤。托洛茨基忙到宅子外面察看,发现有几个卫兵被歹徒捆绑着。松绑后,他们报告说,凌晨4点左右,有20来个穿警察制服和军装的人向他们突然袭击,结果被袭击者

^① 阿尔弗雷德·罗斯麦是法国托派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当时他在托洛茨基家中作客。——译者

缴了械。接着这伙暴徒在一位“少校”模样的人率领下走向大门。当天值班警卫是罗伯特·谢尔顿·哈特（此人是美国青年，看上去像个文弱书生），暴徒中有一人上前与他搭话。不多会儿，大门开了。暴徒们顺利地进入院子，他们似乎熟门熟路，先收拾其余几个保安人员，然后在院子的树丛后架起机枪，瞄准托洛茨基家人的卧室猛烈射击。还扔了几颗手榴弹。整个袭击持续了20分钟，在确信托洛茨基全家无一幸免后，歹徒们才匆忙撤离，临走时还劫走了两辆轿车。警卫员哈特也被他们架走了。

这次未成功的袭击引起了人们一系列的疑问：为什么歹徒们对住宅内的布局那么清楚？为什么哈特不加抵抗就开了大门？为什么他们还要绑架他？那个与哈特搭话的人是谁？半小时以后，墨西哥保安警察头子萨拉查上校亲临现场侦破。他询问了穿着睡衣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神情异常平静，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过，很平淡地叙述着遭袭击的经过。萨拉查感到纳闷，“这么多暴徒，那么多武器，甚至还用了炸弹，可是一个人没死，真是奇迹！”他多次这么说。上校最后问托洛茨基：“您怀疑谁是这次袭击的主谋？”托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不用怀疑，我清楚是谁，您跟我来。”他用右臂挽住上校的肩头，慢慢地走向兔笼……他停住脚步，瞧瞧四周，确信周围无人时使用右手遮住嘴边，故作神秘地说：“主谋肯定是约瑟夫·斯大林，他是借助格伯乌下的毒手。”但是萨拉查起先却怀疑这场戏的导演是托洛茨基本人，以为托洛茨基企图用这一手来诋毁斯大林和墨西哥共产党的名声。于是这位上校首先逮捕了托洛茨基的两个秘书，和3个佣人，但另一方面，上校也怀疑警卫员哈特很可能是该案的同谋犯，而托洛茨基却认为哈特是受害者。客观地分析，上校的推断至少在这一点上是

合理的，即在托洛茨基的随从中间必定有歹徒们的合作者，否则袭击不可能如此顺利。托洛茨基对上校的行动很不满意，尤其是逮捕两名秘书。于是向墨西哥总统提出抗议，并要求当局对墨共进行调查。结果总统下令释放了被拘押的人员。

事件发生以后，外界议论纷纷，托洛茨基除了应付警方调查以外，还忙于辟谣、保护同事，尤其是为哈特辩护。后来警方抓获了几名参与袭击的同案犯。据他们供认，这次袭击领头的是墨西哥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著名画家戴维·阿尔法罗·西克罗斯，此人业已潜逃。6月25日，警方又在墨西哥城郊区某农场发现一具尸体，经辨认是警卫员哈特。后来尸体被运回托洛茨基住宅，托为死者举行了葬礼，给死者的父母拍去了电报，为死者的墓碑题了词，以表其关切与哀悼之情。

几天以后，大家仍心有余悸，唯恐袭击再次降临。托洛茨基对妻子说：“我们也许是被缓期执行的囚犯。”但他仍一如既往地埋头工作。6月下旬，一些美国朋友来访，劝他暂时隐避或者移居美国。他婉言拒绝了这些好心的忠告，他表示要正大光明地面对敌人和朋友。不过，他答应进一步加强防范措施，建瞭望台，窗户装上钢制百叶窗，用钢门代替木门。托洛茨基自嘲地说：“我的家成了中世纪的堡垒”。

不久，他到墨西哥各地旅行，在途中常常沉睡，显得十分疲惫。一位朋友送给他一件防弹背心，他不愿穿。秘书建议今后对来访者一律搜身，禁止携带武器入内。对此他不赞成，而平时，他接待客人时，又不喜欢警卫人员站在旁边。

* * *

近来，托洛茨基住所经常出现一位神秘莫测的人物^①。此人年轻力壮，仪表堂堂，堪称美男子。早在1938年夏天，这位

^① 即前文提到的凶杀犯拉蒙·梅尔卡德。——译者

自称杰奎斯·莫纳德的青年在法国巴黎主动结识一位美国女大学生西尔维娅·阿盖洛夫。她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与心理学，会俄文、法文、西班牙文，是美国托派组织的一名成员。她的一个姐姐与托洛茨基有密切交往，常常义务为托做些秘书工作。那时，西尔维娅去巴黎是为了出席第四国际成立大会。莫纳德就有意亲近她，并向她求爱。这位相貌并不出众的女大学生经不起英俊男子的进攻，很快落入了情网。但她对男友的行为举止也略有疑惑。这位自称受过高等教育的外交官儿子对政治却丝毫不感兴趣；对自己的家庭背景和所从事的职业总是含糊其辞，让人难以捉摸，一会说是法国人，一会又说是比利时人，后来又说是法国长大的比利时人；今天说他从事商业，明天又说他是新闻记者，常常前后矛盾。同时发现他对吃喝玩乐很在行，花钱大手大脚，满不在乎。1939年2月，西尔维娅回纽约，莫纳德曾答应她将以记者的身分前往美国，结果到9月份，莫纳德却改名为“弗兰克·杰克逊”，使用加拿大护照进入美国。据他自己解释，他这样做是为了逃避征兵。他谎他从未到过纽约，可是他对纽约的街道却非常熟悉。不久，他告诉西尔维娅，他将去墨西哥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当经理。他要求西尔维娅也设法去墨西哥，她欣然同意了。前者是在10月上旬抵达墨西哥，后者是在翌年1月到达。西尔维娅来到墨西哥城第一件事就是朝圣托洛茨基，并向他汇报美国托派组织的情况。不久，她就为托洛茨基做些秘书工作，这位杰克逊自然成了她的义务接送员，经常驾驶着豪华型轿车在大门口等候。时间长了，门卫也认识了他并与他攀谈起来，尤其是哈特成了他的知交。开始时他还是循规蹈矩，从不闯入内宅。不久他又结识了罗斯麦夫妇。他经常邀请两位法国客人到餐馆用餐。去近郊观光游览。这样就

取得了罗斯麦夫妇的欢心，夸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青年”。西尔维娅处事还比较谨慎，她没带自己的男友进入内宅。当她3月份返回纽约时还要杰克逊作出保证不再去托洛茨基住所。可是杰克逊并未遵守诺言。由于罗斯麦生病，他就主动帮助把病员送往墨西哥城的一家法国医院，然后又把病人送回家，还替病人到城里买药。这样一来，他就成了托洛茨基家的常客，并为接近托洛茨基本人创造了条件。

5月28日（袭击后的第四天）这个未来的杀手第一次与托洛茨基面对面地打交道。那次邂逅也许并非偶然。5月底，杰克逊获悉罗斯麦准备去维拉克鲁斯乘船返回法国，就说他刚好要去维拉克鲁斯办点商务，可以顺便送他们上船。于是在5月28日一大早，他就驾车来到维也纳大街托的寓所，把车子开进院子等候。这时托洛茨基正在院子里喂兔，看到杰克逊走来，他友好地伸出了手，但并未停下手中的活。这位客人并未受宠若惊，死盯住这位大人物，而是很有礼貌地寒暄几句，就识相地走开了。他向谢瓦的房门走去，把一架玩具飞机送到小孩的手里，并教他如何开动。这时娜塔丽娅根据托洛茨基的暗示，便邀请这位“西尔维娅的丈夫”和罗斯麦夫妇共进早餐。

从维拉克鲁斯回来后，杰克逊有两个星期没去维也纳街。6月12日，他来过一次只呆了几分钟，说是要到纽约去，想把轿车寄放在这里，住宅主人需要的话随时可以使用。1个月以后他返回墨西哥，但又有3个星期未露面。7月29日，他和西尔维娅被邀来到托洛茨基家做客，同饮茶点。这是杰克逊会见托洛茨基最长的一次，会晤持续了1个多小时。据警卫员的记录，从5月28日至8月20日，杰克逊总共来过10次，与托会面也不过两三次，可这就足以使他熟悉环境，仔细

端详谋害对象的身材特征,使之心中有数。他来访时总不忘带一束鲜花或者一盒糖果,他的一举一动尽可能给人以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印象。他在托洛茨基夫妇面前更显得似新教徒那样的虔诚,并带着几分腼腆。当时美国托派组织内部发生分裂,西尔维娅站在伯纳姆和沙赫曼一边,这与托洛茨基的态度不一致,但她仍是受欢迎的客人。每当他们聚集在一起时常会引起一场热烈的争辩。杰克逊可从不参预,但他总是让别人知道他是站在托洛茨基一边的,他拥护托的观点:苏联毕竟是工人阶级国家,应该无条件地保卫她。可是他在秘书、警卫人员面前就不那么拘束了。总的来说,杰克逊的举止还比较得体,没有任何过分的表现。

然而,随着最后行动时刻的临近,杰克逊变得有些失常了。他变得消瘦,神情有点呆滞,脸色灰白,有时手指发颤,言谈举止也不如先前那样谨慎了。有一次,他在托洛茨基面前竟夸赞他的公司老板如何精明,如何善于赚钱,他又如何在交易所搞投机买卖为第四国际筹措资金,等等。托洛茨基听了很不是滋味,事后,他对娜塔丽娅说:以后最好不要接待这种人。

8月17日,杰克逊又来了。他写了一篇批判伯纳姆和沙赫曼的文章,想请托洛茨基给予指导。托对此并不热心,但又不便推辞,只好请他进书房讨论他的稿子。只过了10分钟光景,托洛茨基就感到很不高兴。恼火的原因倒不是文章而是杰克逊的举动:托洛茨基坐在写字桌前看稿,杰克逊却坐在写字桌上居高临下,并一直戴着帽子,手里挎着外套,就这样坐到谈话结束。托洛茨基觉得自己上了当,眼前的人很可能是个骗子。后来他对娜塔丽娅说:“他的举止完全不像法国人,他到底是什么人?该去查一查。他为什么要隐瞒国籍?他会不

会还有别的什么瞒着我们？两天后（8月19日），托洛茨基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他的警卫兼秘书汉森，想证实一下其他人是否也有类似的疑点。但杀人犯的行动比托洛茨基的反应更快，第二天谋刺者就下了毒手。

* * *

8月20日，星期二，天气晴朗，阳光灿烂。托洛茨基早晨起来对娜塔丽娅说：“我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浑身舒展，这大概是药物的作用吧！”妻子说：“可不，晚上睡足了，自然会感到舒服。”托洛茨基盼望今天能好好地干点工作。他很快穿好衣服就上院子里喂兔。早餐时他说，趁这两天身体好，很想把斯大林评传一书写完，前一段时间由于警方的调查被耽搁了，而现在调查已告一段落。关于那次袭击住宅的事件，该说的他都说了，所以他不希望再有人去打扰他了。

上午，托洛茨基收到哈佛大学图书馆的电函，通知他，寄去的一批档案材料已如数收到。他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在邮寄途中曾遇到了一些麻烦。前几天他还指示美国律师托派成员阿尔伯特·戈德曼，如果美国联邦调查局窃取他的档案情报，就向司法部门提出控告。他在信中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但我的通信集里涉及到许多第三者。”数月以前，托洛茨基把他手中保存的一批档案资料以10000美金的代价卖给哈佛大学图书馆，条件是其中17500封未发表的信件必须到1980年以后才能启封。这件事总算办妥所以心里很高兴。

这天上午他先是给美国的几位托派朋友写信，一封是给一位曾来墨西哥短期担任秘书的同志致以问候；一封是向一位友人表示感谢，因为对方给他寄了一部美国俚语辞典。他说他要努力学好美国的俚语以便同来自美国的警卫人员亲切

交谈。另外他还向两位因罢工被捕的同志去信慰问。写完信以后，他用口述录音机录下了他最后一篇文章的初稿。原先，他一直坚持列宁的观点，为革命的失败主义辩护，经常告诫欧美各国工人阶级，在当前的世界大战中，他们的任务不是保卫各自的祖国，不论它是民主国家还是法西斯国家，而是要把战争引向革命。但是现在的情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所不同，纳粹分子实际上已经征服了欧洲大陆，而现在英美工人阶级已奋起反抗。因此他感到再搬出老一套的公式是行不通的。“目前的战争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是上次大战的继续，但继续不是重复，而是一种发展、深化。”同样，列宁主义的政策也必须发展深化。列宁的革命的失败主义曾使布尔什维克避免陷入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泥潭，但它没有赢得群众。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获得人民的支持，并不是因为它拒绝保卫资产阶级祖国，而是由于群众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承认这一点。因此托洛茨基不赞赏沙赫曼集团和某些和平主义者反对美国当局征兵的立场。而事实上，当时的民意测验结果表明，70%的美国工人拥护征兵，希望战胜法西斯侵略者。

下午1时，他在墨西哥的特邀律师里加特来访，告诉他，最近托列达诺^①的《人民报》攻击托洛茨基，指责其诋毁墨西哥工会名声，劝他立即予以反击。托洛茨基本不想同当地的斯大林分子进行乏味的论战，但最后还是同意写文章回敬一下，只得把论革命的失败主义文章搁一搁。他对娜塔丽娅说：“我要写文章回击，指责他们对我进行无聊诽谤。”当天，他的情绪始终很好。工作间歇时，娜塔丽娅见他光着头站在院子中间，就急忙从屋里取出一顶白色遮阳帽给他戴上。她总是

^① 隆巴多·托列达诺是墨西哥工农总联合会领导人。——译者

轻手轻脚,在他工作时尽可能不去打扰他,她常常踮着脚尖在门后深情地凝视着丈夫的背影,只见丈夫弯腰屈背、伏案疾书,专心致志地工作着。

过了5点,他又来到兔笼,给他心爱的兔子喂食。少顷,娜塔丽娅站在阳台上发现有一个“陌生人”站在托的身边。此人脱下帽子,走了过来,她才看清原来是“杰克逊”。“他又来了。”“为什么他最近来得那么勤?”这个疑问掠过她脑海,她似乎觉得此人的出现是个不祥之兆。瞧他,脸色灰白,模样古怪,一件防雨大衣紧贴着身体。突然她记起他曾夸口说即使冬天他也不戴帽子,不披大衣,于是她便随口问他:“天这么热,干吗还戴着帽子和大衣?”他回答说:“可能要下雨,”接着他又说:“口干得要命!”要求给他一杯冷开水喝。可娜塔丽娅端给他一份茶点,杰克逊忙说:“不!不!我才吃了午饭,吃不下了。”还指着喉咙,意思是这儿已经卡住了。当娜塔丽娅知道杰克逊是来讨论上次那篇文章时就陪同他走向兔笼。托洛茨基用俄语对娜塔丽娅说,“杰克逊说西尔维娅过会儿要来告别,他俩明天动身去纽约,你是否好好款待他们一下。”娜塔丽娅回答说:“杰克逊刚才连点心都不想吃,说身体不太舒服。”托洛茨基打量了他一下,似乎带点责备的口吻说:“怎么,身体欠佳吗?看上去气色是不太好,小伙子!要是把身子搞垮了,可不好啊!”静默了片刻,杰克逊手里捏着稿子等待着。托洛茨基心想,既然要他重写,总得看看他改得如何。其实他对这篇文章毫无兴趣,出于礼貌他只好说:“好吧,让我们进去看看您的文章罢。”他慢悠悠关好笼门,脱下工作手套,掸掸身上的灰尘,慢慢地走向屋子。随后两人一起进了书房。

托洛茨基坐在书桌前,埋头阅读这份打印稿。刚看完第一页,一记沉重的打击突然袭来。据杰克逊后来的供词说:“我

把雨衣放在一个柜子上,悄悄取出那把冰镐,我紧闭双眼,使足全力向他头部砸下去。”他原来估计,这么一下,老头必然会无声无息地倒下,一命呜呼,他就可以悄悄地逃遁。哪里知道,这老头发出一声恐怖的刺耳的惨叫!虽然脑壳开裂,血流满面,可受害者竟然还能奋起反抗,拿起桌上的书籍、墨水瓶,甚至录音机疯狂地向对方投掷,最后像猛虎似地扑了上去,与凶手格斗,他还咬对方的手,夺对方手里的冰镐。刺客这时却慌了手脚,竟不知所措,既没有用冰镐再砸,也没有用身藏的手枪或者匕首还击。大约经过三四分钟的扭打,托洛茨基已力不从心,站立不稳了。但他不肯在敌人面前倒下,就摇晃地退到门边。这时娜塔丽娅闻声赶到,发现丈夫站在门边,身子紧倚着门框。她原以为是从天花板上掉下什么东西砸了脑袋(因为当天下午屋面上正在安装警报器)。她问:“是怎么回事?”托却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是杰克逊干的。”他似乎还想说:“那件事终于发生了。”然后,他在娜塔丽娅的搀扶下,缓缓地躺倒在一条席子上。

“娜塔莎,我爱你!”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而且说得那么庄重、严肃,但很微弱。娜塔丽娅此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说:“以后不经检查,任何人都不准进来!”稍后,她小心翼翼地在他的头底下塞进一块垫子,在伤处放上冰块,并给他擦去脸上的血。托洛茨基关照说“现在不要让小孩进来。”意思是不让小外孙看到这一切。他说话很吃力,语音已变得含混不清:“听我说,一进去(他眼睛朝书房瞥了一下),我就知道他想干什么……他想……再一次……把我……但是我没有放过他。”托洛茨基平静地、温和地说着,似乎很得意地重复着“我没有放过他。”娜塔丽娅和汉森在他身旁抽噎着,随后托洛茨基又用英语对汉森说:“这就是结局。”他要求把事情真相调查清楚。

他还说杰克逊是用手枪谋害了他。当汉森告诉他凶手用的是冰镐,伤着了表层,他不信。“不,不,不。”指着自己的心脏说:“我心里有数,这回他们终于成功了。”当亲人们对他说你的伤势不会有生命危险时,他苦笑了一下,表明他知道,这只是聊以自慰,故意轻描淡写罢了。他好多次把娜塔丽娅的手贴在自己的嘴唇上。他继续对汉森说:“你们要照顾好娜塔丽娅,她跟我过了这么多年。”汉森说:“我们一定会照顾好的,您放心!”托洛茨基紧紧握着他俩的手,淌下了眼泪。此时,娜塔丽娅心如刀绞,泣不成声,她俯下身子吻着丈夫淌着血的额头。

与此同时,警卫员们已赶到现场,他们用枪托猛击谋刺者,里外都能听到刺客的哀嚎和哭喊。托洛茨基听到此声立即嘱咐:“告诉小伙子们别打死他。不能让他死,要想办法让他说出真相!”不一会凶手被制服了。杰克逊说:“这是他们逼我干的,他们把我母亲关起来了……这事与西尔维娅毫无关系。”当人们问他“谁把你母亲关押了,是不是格伯乌?”他一口否认,说此事与格伯乌无关。

当医生来时,托洛茨基的左臂和左腿已经麻木,不一会,担架员和警方人员也赶到了。娜塔丽娅害怕得缩成一团,因为她想到儿子廖瓦也是在医院里死的,所以她不愿意丈夫住院,托洛茨基自己也不想离开。后来汉森说:“有警卫员陪着不会有问题的。”托洛茨基才说:“好吧,你们看着办吧!”他似乎开始意识到由他发号施令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躺在担架上时,他还喃喃地说:“我所有的一切都归属娜塔丽娅,你们一定要好好照顾她!”

家人担心再次遭到意外,所以坚持要求警方首长亲临现场负责护送,才肯让伤员抬走。娜塔丽娅用一块方巾盖在丈夫身上,两手扶着丈夫的头,不停地啜泣。托洛茨基沉默无

语,也不呻吟,旁人看来似乎病员已经死去,其实还在不停地呼吸。担架被放进救护车,两旁坐着警察和家人。当这辆救护车准备出发时,另一辆运送受伤罪犯的救护车也赶到现场。

救护车穿过闹市区。繁华的街头熙熙攘攘,人来车往,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在夜空中闪烁。救护车不断地发出刺耳的警报声,在狭窄的马路上急驶而过,两旁还有警方的摩托车护送,其阵势颇为令人瞩目。托洛茨基在车上仍有知觉;他的右手比划着,在毯子上摸索着,娜塔丽娅俯身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说“现在很好。”接着叫汉森过来,低声地关照着什么:“他(指杰克逊)是个政治谋杀犯……是一名格伯乌特务……或者是一个法西斯党徒,但更可能是格伯乌派来的特务……”

几乎与此同时,在另一辆救护车上,那个行刺者把事先写好的一封信交给了警方。在信中他声称自己原是托洛茨基主义忠实的信徒,甘愿为托洛茨基赴汤蹈火、尽力效劳。他是根据第四国际的指示来到墨西哥,会见托洛茨基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但是来到墨西哥以后,他感到大失所望。他痛苦地发现这位工人阶级的领袖竟是一个阴险狡诈的反革命。他指控托洛茨基曾指使他潜入俄国去进行暗杀活动。行刺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斯大林。托洛茨基还暗中勾结帝国主义分子,阴谋颠复苏联和墨西哥现政权;甚至还唆使他抛弃爱妻西尔维娅。这一切使他看清了托洛茨基的真面目,于是决心除掉这个无产阶级叛徒,云云。这种杜撰其实并不高明,但毕竟尚能模糊一般民众的视线。

这时已有一大批人聚在医院门口看热闹。娜塔丽娅担心人群中是否会有坏人混在里面,所以要求严加防范。几分钟后,托洛茨基被安置在病床上,接受大夫们检查。随后一名女

护士给他剃发。他还记得昨天娜塔丽娅想请理发师给他理发，结果没来。此时他向妻子眨眨眼睛幽默地说：“你……瞧，理发师不是来了吗！”接着他眯着眼睛问汉森：“你……带了……笔记本吗？”他开始用英语口语述着，声音低得难以听清：“由于凶手的行刺，我已接近死亡……他是在我书房里下的毒手，我同他进行了搏斗……我们……谈到法国的统计资料……他突然猛击了我一下……请告诉我们的朋友……我深信……第四国际一定能胜利……奋勇前进！”这就是汉森尽力记下的这些断断续续、不连贯的话。起先，托洛茨基也许想详细叙述遇刺的经过。可是突然他感到自己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他就赶紧转了话题，对他的门徒们作最后的勉励。

为了进行手术，护士们开始替他脱衣服，她们用剪刀剪下了他上衣、衬衫、背心，解下表带，当准备脱下最后一件内衣时，他很严肃地对娜塔丽娅说：“我不要她们动手，我要你替我脱。”这是娜塔丽娅听到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当脱完衣服后，她弯下身子吻他的嘴唇，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接吻，这是他们最后的告别。

随后，5个外科医师给托洛茨基做了脑外科手术。伤口有两处，右侧的颅骨已被击碎，碎片嵌入脑髓，脑膜严重损伤，部分脑组织彻底毁坏。他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了手术的痛苦。当晚7时30分，托洛茨基进入昏迷状态，他与死神作了20多个小时的拼搏，娜塔丽娅则彻夜不眠守候在病榻旁，盼望亲人的苏醒。但命运已无可挽回。

1940年8月21日下午7时25分，托洛茨基与世长辞了。8月22日，按照墨西哥的习俗举行了送葬仪式。长长的送葬行列尾随着灵柩在市区主要街道缓缓行进。人行道上挤满了群众，他们默默地注视着这一悲哀的场面。美国的托洛

茨基主义者企图将遗体运往美国,但国务院拒绝给予签证。后来,遗体在住宅陈列了5天,大约有30万人前去瞻仰。8月27日,遗体被火化,骨灰就安葬在科约阿坎的住宅院子里。在墓上树起了一块长方形的石碑,上面还插着一面红旗,迎风招展。

* * *

凶手被捕以后,始终坚持原有的供述,拒绝供出幕后指使者。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罪犯的陈述是虚假的,但始终打不开缺口,最后于1941年4月16日,墨西哥第六刑事法庭宣布,被告杰奎斯·莫纳德·范登瑞斯加因犯有谋杀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判决书中写道:“莫纳德从一开始去墨西哥直到他成功地与托洛茨基建立关系,他的言行都是虚假的,是一种阴谋。法庭必须声明弗兰克·杰克逊或杰奎斯·莫纳德去墨西哥的唯一目的就是谋杀托洛茨基。”后查明,杰奎斯·莫纳德的真名叫拉蒙·梅尔卡德,是西班牙人。此人已于1976年10月死于古巴哈瓦那。

人名索引

埃尔温·阿克内希特	42	詹姆斯·伯纳姆	100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89	阿维拉·卡马乔	131
赖莎·季莫菲耶夫娜·阿 德勒	89	詹姆斯·坎农	136
鲁丝·阿盖洛夫	137	拉扎罗·卡德纳斯	99
西尔维娅·阿盖洛夫	137	赫苏斯·卡萨斯	106
阿尔马桑	132	路易·塞利纳	48
奥默·艾凡提	20	肖当	30
阿历克西·巴尔丹	70	陈独秀	135
约翰·巴尔丹(布瓦泰尔)	70	温斯顿·丘吉尔	5
维奥利特·巴尔丹	70	安东·西里加	38
洛朗·博	69	伊凡·克雷博	72
皮埃特罗·布拉斯科	55	马塞尔·居罗多	53
莱昂·布鲁姆	77	查尔斯·柯蒂斯	131
雅科夫·布鲁姆金	17	爱德华·达拉第	15
博霍克斯	102	雅克·德卡特	49
加布里埃尔·布劳什(佳比)	55	阿纳托里·德芒齐	30
安德烈·布列东	15	约翰·杜威	103
杰奎琳·布列东	116	莫里斯·多蒙热	69
亚历山德拉·利沃芙娜· 勃朗施坦	38	费奥多·米海洛维奇·陀 思妥也夫斯基	120
		加斯东·杜梅尔格	61

雅克·杜克洛	111	哈罗德·罗伯特·伊萨克	100
阿尔贝特·爱因斯坦	136	萨拉·雅各布(韦伯)	41
奥克塔维奥·费尔南德斯	109	茉莉达·卡洛	101
何塞·费雷尔	130	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 涅夫	78
B.J.费尔德(真名古尔德)	27	帕夏·穆斯塔法·凯末尔	19
埃丝特·费尔德	27	哈拉兰波斯	10
鲁特·费舍	58	哈林	90
雅各布·弗朗克(格拉也 夫)	22	谢尔盖·米洛诺维奇·基 洛夫	71
皮埃尔·弗朗克	2	鲁道夫·克勒门特	42
华尔多·弗朗克	103	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 克拉辛	41
扬·弗兰克尔	4	克里维茨基	38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16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 娜·克鲁普斯卡娅	91
加涅	64	苏珊娜·拉·福列特	103
卢西亚诺·加利西亚	127	薇拉·拉尼斯	27
加辛	42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列宁	11
马克斯·加文斯基	59	罗曼·瓦茨拉沃维奇· 马林诺夫斯基	97
安德烈·纪德	81	安德烈·马尔罗	48
马克西姆·高尔基	38	瓜达卢佩·马林	117
J·古比尔	53	让娜·德·巴利埃·马丹 (莫利尼尔之妻)	4
格·古罗夫(托洛茨基笔名)	37	阿卡迪·马斯洛夫	58
约瑟夫·汉森	109	卡尔·马克思	116
华尔特·海尔德(海因 茨·埃普)	73	让·迈希勒	54
休伯特·赫伦	125	让·梅耶	79
爱德华·埃里奥	30	梅尔尼昌斯基	79
安东尼奥·伊达尔戈	101		
保罗·冯·兴登堡	35		
阿道夫·希特勒	2		
阿道夫·阿勃拉莫维奇· 越飞	26		

梅尔基亚德斯	132	罗伯特·兰茨	22
拉蒙·梅尔卡德	137	伊格纳兹·雷斯	111
明仁斯基	42	莉达·雅可夫列芙娜·	97
亨利·莫利尼尔	24	迭戈·里维拉	101
雷蒙·莫利尼尔	1	朱尔·罗曼	18
法朗西斯科·穆希卡	102	富兰克林·罗斯福	15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穆 拉洛夫	101	热拉尔·罗森塔尔	2
皮埃尔·纳维尔	2	阿尔弗雷德·罗斯麦	22
列昂尼德·瓦西列维奇· 尼古拉也夫	71	玛格丽特·罗斯麦	22
鲍里斯·尼古拉也夫斯基	56	让·鲁	72
萨尔瓦多·诺沃	111	达维德·鲁塞	77
保罗·奥孔(奥平、密尔)	91	奥托·吕勒	52
瓦连廷·奥尔贝格	94	路易·索夫里尼翁	52
克里门特·奥罗斯科	119	奥拉夫·舍夫罗	76
克耶尔·奥特森	76	维利·施拉姆	58
阿尔贝特·乌斯特里	23	奥托·许斯勒	4
莫里斯·帕里雅宁(唐泽 尔)	13	特鲁德·许斯勒	59
莫里斯·帕兹	6	列夫·利沃维奇·谢多夫 (廖瓦)	6
卡洛斯·佩利塞	111	谢尔盖·利沃维奇·谢多 夫	6
彼什科夫	39	娜塔丽娅·伊万诺夫娜· 谢多娃	4
玛丽雅·伊利尼什娜·彼 夫斯涅尔	7	奥斯卡·赛波尔	70
尤里·列昂尼多维奇·皮 达可夫	101	维克托·谢尔盖	38
马尔索·皮韦尔	72	皮埃尔·塞马尔	3
卡尔·拉狄克	101	马克斯·沙赫曼	12
克里斯蒂安·格奥尔基也 维奇·拉柯夫斯基	28	克拉尔·谢里丹	5
		西蒙娜·韦伊	58
		伊格纳齐奥·西洛内	45
		乔治·西蒙农	43

戴维·阿尔法罗·西克罗 斯	24	卡洛·特雷斯卡	103
西斯托	106	图拉蒂	132
亨利克·斯内夫利特	49	范·奥韦斯特拉登	135
亚伯拉罕·索伯列维奇 (谢宁)	89	乔治·魏雷根	66
鲁文·索伯列维奇(罗曼· 威尔)	89	维特	94
格里哥利·雅可夫列维奇 ·索科尔尼科夫	101	普拉东·沃尔科夫	33
亨利·斯巴克	66	弗谢沃罗德·普拉东诺维 奇·沃尔科夫(谢瓦)	7
拉厄·施皮格尔	114	齐娜伊达·利沃夫娜·沃 尔科娃(齐娜)	7
约瑟夫·斯大林	2	瓦茨拉夫·沃罗夫斯基	41
弗里茨·斯滕贝格	51	埃尔温·沃尔夫	77
雅可夫·米海洛维奇· 斯维尔德洛夫	16	伯纳德·沃尔夫	103
阿恩·斯沃贝克	12	亨利希·雅戈达	134
阿尔温·塔罗夫	38	阿道夫·萨莫拉	137
安德烈·蒂里翁	80	弗朗西斯科·萨莫拉	103
温德林·托马斯	103	马克·祖博罗夫斯基	87
阿尔伯特·特伦特	135	弗雷德·泽勒	77
		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 ·季诺维也夫	11
		埃米尔·左拉	118